

#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OCT. 1988. NO.

65

胡平：

致中共領導的公開信

行逆風船·闖價格關

魏京生在青海

澳洲成立「民主中國」

警棍下的拉薩

焦慮+疲勞+危機=準備頭破血流

軍隊幹部大鬧司令部

10月號

總

65

期

# 「民主中國」致「中國民聯」的一封信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經過長期的醞釀，「民主中國」在堪培拉誕生了，它標誌着澳洲的中國留學生爭取人權和民主的鬥爭由地下轉入了公開。

早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國使館工作人員在學生會議上宣讀了留學生管理「細則」。四月十三日「CANBERRA TIMES」登載了以「STUDY RESTRICTIONS LED TO ASYLUM REQUEST」為題的報導，表明了中國留學生對「細則」的不滿和揭露，兩位沒有暴露真實名字，被記者採訪的同學現是我們「民主中國」的主要成員之一。四月中下旬，堪培拉地區中國留學生選出了一位學生代表參加「留學生回國參觀團」，但因使館的無理否決，這個代表名額作廢。七月中旬，當人民日報登出四十九名留學生代表回國參觀的新聞（唯獨缺一名堪培拉地區代表），幾個留學生出於義憤，起草了「致教委的公開信」，以彌補失去和中央領導人直接通過學生代表對話的機會。此信在中國學生中廣為傳閱，受到熱烈響應，但最後敢於在信上正式簽名的學生，仍是這幾位起草信件的同学。至此，我們再也按捺不住了，經過多次討論，我們產生了要成立一個組織的想法。有組織就有力量，學生的基本權利要靠我們團結在一起去爭取。

「民主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是完善了致教委的公開信，並按許多同學的建議，將此信改為「致李鵬總理的公開信」，這封信清楚地指出了留學生政策中的許多條例直接踐踏了「國際人權和政治權利法」中所規定的人的基本權利，其結果是打擊了留學生的積極性，對留學生的前途和對國家都帶來了巨大損失。

「CANBERRA TIMES」對此信作了詳細報導。中國駐澳使館教育參贊謝其網迫不急待地跳了出來，在「CANBERRA TIMES」上大肆說謊，抵賴。同時在使館召集部分中國留學生開會，企圖進行圍攻及恐嚇。此人水平不「凡」，到今天為止還堅持講「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從來沒停止過」，當學生建議國家應允許留學生自由進出時，他立刻說「那不百分之百的都跑了」。這樣的人當教育參贊，在堪培拉地區一手遮天，不僅掌有延長學生護照大權，甚至可以干涉中國學生去其他國家的簽證。（但聽說此人最近有所轉變，主要是怕「鼓勵」更多的人參加「民主中國」。）

「民主中國」的宗旨，不僅僅在於批評中國共產黨所制訂的日趨倒退的留學生政策，更為重要的使命是抨擊當今中國一黨專政，不承認人權和踐踏人權的種種做法，為爭取中國的民主和人權而吶喊。「民主中國」還將提供一個「自由論壇」讓更多的同學參加對中國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討論。「民主中國」認為多黨制是中國政治改革的必由之路。「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是目前唯一的對共產黨起到真正監督作用的政治勢力及團體，是中國實現「多黨制」的萌芽和希望所在。「民主中國」堅決支持「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行動。

作為一個新成立的組織，我們目前的鬥爭很艱巨。中國使館的高級官員直接散佈謠言，攻擊和誹謗我們，企圖在中國人和澳洲人中孤立我們，我們希望得到「中國民聯」在各方面的支持，借鑒你們的經驗，來發展和壯大在澳洲爭取民主和自由運動的力量。

最後，讓一切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力量聯合起來，為爭取中國人民應享有的人權，為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而奮鬥！

「民主中國」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於堪培拉

# 請記住：

## “形式重於內容”

### 路邊

站穩了腳跟，立即反手將轟轟烈烈的北京之春民主運動鎮壓下去，其理由和今天一樣冠冕堂皇：中國的經濟調整到了關鍵時刻，改革需要在安定團結的環境下進行。然後，隨之而來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使社會上的民主呼聲壓抑了四年之久。

無獨有偶，一九八六年冬學生運動高潮被鎮壓的時候，堂皇的理由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如出一轍，甚者，要求民主自由的學生們甚至被扣上反對改革的帽子。

馬克思說過，歷史的事件常常驚人的相似，它們第一次出現時往往以悲劇形式而第二次則常常以喜劇的形式出現。可是不幸的是，在中國，這種驚人的相似事件往往總是以悲劇的形式出現。其悲劇在於中共每一次對民主的鎮壓都是以妨礙其「幹好事」為理由，同時每一次中國人民都以「顧全大局」的心理默默地忍受了。

開北戴河會議結束，趙紫陽再次獲勝，不禁喜憂參半。喜為保守勢力已無力阻止中國市場化的進程；憂則是中共一再強調價格改革的「風險」，強調安定團結，要求人民群眾理解並配合中央的改革措施。這不禁令人想起了北京之春運動失敗的背景。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這段期間，是共產黨執政史上最民主的時期。（所謂民主是指形式而言，並非指人民提出的觀點的具體內容。）當時中共的改革派和社會民主力量曾經結成了統一戰綫。民主牆、大學生競選熱潮和遍及全國的民間出版物把中國的民主運動會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然而，一旦中共改革派

中國人，其中甚至包括相當部分的知識分子，都自命是重內容而不重形式的人。在他們眼裡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既然民主的形式最終是為了保證人民得到好的領導人，那麼，每當已經出現他們認為的好的領導人時，他們就不再強調那套「迂腐」的民主形式了。於是，他們會設身處地地體諒這些開明領導人的苦衷，為他們辦好事提供方便，為了盡可能發揮這些開明領導的「積極作用」，他們甚至會解開捆住他們手脚的制度上的束縛，無限地增加其權力，以便他們能把「好事」幹成。

可是人們沒有想到，所有的暴君都是這樣培養起來的，所有的暴政都是從開明專制開始的。人民在開明專制時期用忍讓把政權給慣壞了，以致當暴君和暴政降臨時他們便束手無策了。在中國歷史上，「大治」和「大亂」總是

循環不息，其原因很簡單，大亂前夕的暴君就是人民在大治的環境中培養出來的。

西方人就不一樣，他們重形式而輕內容。就表面而言，這似乎很迂腐，但這正是西方民主制度能建立起來的重要原因。美國人不會因為尼克松是個比較出色的總統而對水門事件手下留情，同時也不會因為卡特是個比較平庸的總統就不老實實忍受他四年，他們決不會因為特別出色和惡劣的內容而毀了形式，因此，他們的制度儘管常常綁住英明領導人的手脚，可是却能永遠地免除暴政和暴君。從兩種文化的對比中，難道我們不能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訓嗎？

人們往往總是在暴政當頭時才想起民主制度的必要，可是這時已太晚了，不要說建立民主，僅僅是擺脫暴政他們就得付出比原來大得多的代價。他們應當明白，民主制度恰恰是在開明專制的時期才有可能建立並鞏固。換句話說，民主形式恰恰是在它看來最沒有必要的時候才有可能確立。在中國，很多人自以那種為內容不拘形式的原則表現了政治上的成熟，表現了靈活的謀略。可是，這恰恰體現了他們天真幼稚之處，如果不在領導人還想幹好事的時候就連他可能幹壞事的手脚一塊捆住，一旦他們真的幹起壞事來就晚了。避免暴政的代價就是別怕給想幹好事的人製造一點麻煩。

出於這種考慮，在中共開價格關的時候，有必要提醒一下善良的中國人民：千萬要吸取歷史的教訓。改革當然是必要的，但絕不允許中共打着掩護改革的旗號取消人民表達自己願望的權利。要把人們表達自己願望的形式和經濟改革的具體內容區分開來。

為了避免暴政，一點麻煩是值得的。請記住以下原則：形式重於內容。■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驅孫中山先生墨跡

#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八年十月號總六十五期目錄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出版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ER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 ● 觀察家 ●

3 ■ 請記住「形式重於內容」

路邊

## ● 讀者 ● 作者 ● 編者

6 ■ 對「幾點質疑」一文的回應

于大海等

## ● 國內參考 ●

8 ■ 楊尚昆論軍內個別現象

李遠

9 ■ 北京軍區起風波，軍隊幹部大鬧司令部

黎音

10 ■ 警棍下的拉薩

文峰

11 ■ 在新聞被封鎖的背後

農騰

12 ■ 焦慮十疲勞十危機——準備頭破血流

沐雨

13 ■ 街頭巷語

無名草

14 ■ 致中共領導人的一封公開信

胡平

## ● 改革論壇 ●

17 ■ 評十三大的政治改革方案

周其仁

李三元

22 ■ 農村衝擊城市，改革欲罷不能

唐欣

馮磊整理

26 ■ 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戰略

張少傑

馮磊整理

28 ■ 所有制問題是改革的關鍵

黎安友

31 ■ 中俄政經改革，起點不同迥異

王慕基

## ● 人權論壇 ●

31 ■ 為中國的傳教士徐永澤祈禱

魏京生在青海

楊先智

33 ■ 大赦國際關注朱建斌

關於我太太出國的前前後後

民聯西德聯絡站

34 ■ 致成都市公安局外事科的一封信

祝楊堯生日快樂

林東 郁易敏

## 編者的話

編者的話：

八月十八日結束的中共北戴河會議以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勝利告終。會議上通過了物價及工資改革的五年工作計劃。從各方面的消息和迹象看來，中共已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寧可在改革中碰得頭破血流也要硬闖物價改革的鬼門關。他們會成功嗎？胡平的「致中共領導人的一封信」及房志遠的「行逆風船，闖物價關」一文對此進行了精辟深入的分析，和幾種可能的結果進行了預測。

中國大陸參與實際改革的學者周其仁、唐欣和張少傑七月下旬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揭示了近年來改革的問題和困難。

中國旅美學界經濟學會和政治學會年會於今年夏天分別在舊金山和紐約舉行。本期對此進行了報導，並刊登了李三元同學在政治學會上的書面發言。由於篇幅有限，下期我們將陸續刊登趙德生、徐邦泰和程玉的書面發言，以饜讀者。

近年來，大陸的物價一漲再漲，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物價騰飛，書生窘迫」一文披露了近年來衣食住行方面物價飛漲的詳細情況。

本刊在六十三期刊登了遲來先生「致中春的一封信」之後，我們收到許多讀者的來稿來信，要求和遲來先生商榷一些觀點。本期登出的先先生的文章，則是較有代表性的。本刊希望更多的讀者和我們討論各方面的問題，把本刊辦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園地。

針對中共對人權問題的一再踐踏，本期發表了「為中國的傳教士徐永澤祈禱」、「魏京生在青海」、「警棍下的拉薩」、「公安人員無故致死人命」、「楊先智太太出國前後」等一系列文章和消息，孰是孰非，請廣大讀者自己去評價。

### ● 經濟問題 ●

- 36 ■ 行逆風船，闖物價關  
40 ■ 物價騰飛，書生窘迫

### ● 海峽兩岸 ●

- 44 ■ 還是「自由民主統一中國」好  
46 ■ 初談中國海峽兩岸兩部憲法的比較  
49 ■ 中共動武，台灣獨立

### ● 特別報導 ●

- 45 ■ 中國民聯致民主中國的回信  
48 ■ 經濟學會、政治學會各路精英再聚  
55 ■ 是真話又不是真話  
56 ■ 訪問羅大衛

###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

### 縱橫談

### ● 爭鳴園地 ●

- 59 ■ 制度與人生  
61 ■ 對「我的看法的幾點看法」  
64 ■ 波蘭地下活動組織的發展

### ● 文藝園地 ●

- 71 ■ 想想孩子  
13 ■ 無題  
33 ■ 我的橫笛  
60 ■ 春天的夢  
71 ■ 春雨  
72 ■ X海陵——北京人系列速寫之四

### ● 封二 民主中國致中國民聯的一封信

房志遠

毛涇

胡平

林樵清

于大海

柯平

丁楚

馮磊

鍾芝

肖昆珠

王炳章

先到

倫納德

蒲魯塔

說不明白

奪華

野鳴

流螢

艾菲

張潤



### 對「幾點質疑」一文的回應

一原先生在中春第六十三期，針對我認為「中國最需要發展的，不是最尖端的東西，而是台灣丟下不要做的東西，譬如鞋這些項目：」的論點，提出反駁，認為「鞋類、服裝、玩具和家用電器仍是台灣現在出口工業的主要產品，並無『丟下不要做』一說」。為答覆一原先生的質疑，最近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有一段關於台灣出口產品結構變化的資料，可作為對這一問題的答覆，現把這段文字抄錄於下：「在產品結構方面，傳統性的出口產品如鞋類、雨傘、玩具、聖誕燈飾等已逐漸喪失競爭力，代之而起的是電視機、電話機、電腦遊艇、傳真機等高檔產品。」又據報載，在雨傘玩具方面，中國大陸的產品已在增多，漸有超過台灣之勢。

·于大海·

### 「透明度」與檔案

提到「透明度」，許多大陸同胞首先聯想到中共的人事檔案制度，因為一個人應當最知情權的莫過於他本人，但是在大陸的人事檔案對當事人本人來說是最不透明的。除了自己歷年所填的「履歷表」（文革前每年填一次，因為政治運動頻繁，家庭成員及社會關係的政治地位常有變化）、所寫的「檢查」、「交待」、「思想彙報」之外，一個人對其檔案中還有什麼材料就一無所知了。經歷過文革的人可能還記得當年「銷毀黑材料」的故事。其實，文革初期的「工作組」搜集整理每個人的「政治表現」并塞入檔案，不過是襲用歷次政治運動的慣例。在「文革」中，為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曾搜集和整理了大批黑材料，直到文革結束後，才下令把這批「黑材料」銷毀。事實上，諸如此類的由「組織」搜集整理的材料，以及旁人的「揭發」、「檢舉」，和取自其他「單位」的調查旁證材料，大量充斥於檔案之中，當事人可能完全不知情。由於中共各級組織把檔案作為控制、管理和使用職工和幹部的主要依據，檔案很容易被人用作「整人」的工具，比起「莫須有」「三字要」更有效和更詭秘。幾十年來，中共的人事檔案制度為摧殘人才、製造冤獄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主要弊病之一就在於不透明。

那麼，一個透明的政體應當是怎樣的呢？本文僅舉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為例。該省的法律規定：除了調查犯罪活動之外，任何政府機關不得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收集該人的有關資料；沒有本人書面許可，不得從第三者處收

集該人的資料；在收集個人資料時必須說明用意，所收集的材料不得用於其它用途；公民有權查閱政府機關關於其本人的記錄，如果發現記錄不準確有權要求改正。

兩種制度涇渭分明。中共提倡法治經年，也制定了相當一批法律，但是還沒有一個法律是限制政府濫用職權侵犯人民合法權益的。中共政權如有誠意改善透明度，就從這裡做起吧。

·鍾禮文·

### 花兒為什麼遲了開

——讀遲來先生公開信有感

記得在某次關於中國政治制度的辯論中，對手指斥我為「中國之春」之餘，加了一句：「我認為中華民族很偉大，我可不像你那樣，將我們的政府說得一團漆黑！」可是，不到一分鐘之後，他却認為，我們這個「偉大民族」還不配享有民主制度，「因為政府太腐敗，人比民太落後了。」

這聽起來像是一則笑話，然而不幸的是，這樣想的人決不止一兩個，他們對專制政權有意見，但又覺得無力去改變。人家批評暴政，他們反而滿肚子意見。遲來先生大概是他們之中比較「激動」的一位，因為他連欣賞「中國之春」那幾幅漫畫的幽默感也不具備。

我們這個民族有種奇怪的心態；對自己身邊的同僚或直接的頂頭上司，總是牢騷滿腹。而對於一個無能的政府，昏庸的皇上，却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寬容。前有梁山好漢「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後有「遲來」們，一邊抱怨物價飛漲，評級調查不公……；一邊又指責現政權的批評者「不客觀」、「謾罵中央領導」、

「給改革派抹黑」……幾乎來不及給統治者們塗脂抹粉擦屁股。

更深一層看，有些人由於生活在中國這樣一個過分強調群體主義的集權國家中，在其心理上已經不認為自己對國家負有統治和批評的責任，而把批評的權力拱手出讓給清官們了。說得難聽一點，就是做慣奴才了。一個奴才，聽到別人指責他的主人，會馬上舉出主人各種各樣的好處去反駁人家，以證明自己有個好主人。

我想，這樣的奴才思想和持奴才思想的人，正是為什麼中國民主的春天「遲來」，自由的花兒遲了開的原因吧？

·艾天·

### 看中共的「人民代表」構成

人民代表，顧名思義是人民的代表。在美國相當於國會議員。由人民代表組成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對執政黨起着監督作用。有資格當選為人民代表的人，應該是能夠反映人民的意願，受過一定教育，具有相當法律知識的政治活動家。但中共的人民代表，除了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外，便是各行各業的優秀分子和少數知名人士。更可笑的是，這些代表幾乎全部由中共自上而下內定。

那些領導手中掌握一定權力，高高在上，他們是中共集權專制的中堅，只能代表中共自身，不能代表人民。各行各業的優秀分子和知名人士，在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中不愧為先進人物。但作為人民代表，不過是中共的「順民」

。中共把人民代表授予這些人實際是一種獎勵。像排球名將郎平；歌唱家于淑珍；原子彈之父錢學森；紡織能手王玉霞……一經成為人民代表，即成了中共的宣傳工具。這種作法在民主的國度很難找到。在美國從來沒聽說過某些優秀運動員，或是著名「影星」被總統任命為國會議員。但在中國這種事司空見慣。

中共選舉人民代表不過是走走過場，候選人由中共內定，選民如果超出候選人的圈子，去選舉自己喜愛的人，不但不能成功，還會鬧出許多麻煩。請看：王希哲因競選被中共投入監獄，李淑賢——方勵之太太，是人民喜愛的敢言之士，是真正有資格的人選，但被中共以種種手段排斥在人民代表行列之外。

說穿了中共的人民代表實際是中共的代言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際是中共控制下的傀儡表決機器。

·駿天·

### 關於在海外各大學 建立民聯代表的建議

目前各種迹象顯示，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由於政治體系的落後正陷於嚴重的困境。趙紫陽處境險惡，在中國正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當前人們的政治熱情正在高漲，這正是民聯擴大實力、擴大影響的時刻。而留學生則正是民聯擴大其影響、散佈其主張的群眾基礎。最近，由於我出面主持王炳章的演講，而公開了民聯成員的身份，其後覺得處境大不相同。許多中國同學（包括香港及台灣同學）主動與我接近做朋友，更多的人在公開相聚的場合關心

及詢問有關民聯的情況。也有人為個人現實問題找我。所以公開民聯成員身份，有助於消除人們對民聯的神秘感，有利於從正面宣傳我盟民主、自由的主張，有效地擴大聲勢及影響。雖然我們希望大家都加入「民聯」這一政治團體，但從長遠來看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趙京·

### 來信更正

中春各位編輯先生大鑒：

中春八月號（總六十三期）三十七頁第二欄：再看另一邊，蔣前總統雖說：「不是敵人，便是同志。」這句話與毛的話可說是（「不謀而合」）。原文是（「恰恰相反」）。毛說：不是同志，便是敵人。蔣說：不是敵人，便是同志。以上兩句話，那能是「不謀而合」呢？像這樣違反原意的修改作風，是要不得的。希望予以盡速更正。

祝編安！

鄭保羅

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鄭保羅先生：

由於近幾個月月中春經費緊張，許多工作全靠打義工維持，因此，在編、排、打、校諸方面，難免有疏漏之處，謝謝您及時來信更正。並向您致以由衷的謙意。

大安

中春編輯部

# 楊尚昆論 「軍內個別現象」

李遠

鄧小平在一次接見解放軍代表時強調：「軍內重大問題要擺開來，講清楚。重大情況，一定要傳達，要進行軍內輿論監督。套個時髦詞，增加透明度嘛。三中全會以來，政府的透明度增加了，軍隊的透明度也可以增加嘛。」

根據鄧小平增加透明度的指示，趙紫陽命軍委辦公室發了一份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內部講話。其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要正確看待「穩定」方針，跟上改革形勢，所有的軍隊領導幹部，不管是高層的、基層的，都要有這個共識。幾年來，因為精簡整編，幹部年輕化需要，幹部調整面比較大，這是特定情況下採取的必要措施，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中××同志提出××軍區有××名正師職以上幹部、××軍又有××名副軍職幹部因跟不上形勢相繼自殺；××同志又提出××軍區××名正軍職幹部預謀叛逃，我們千萬不要把個別的、背離形勢的事件，看成普遍現象，捕風捉影，盲目糾纏，亂了軍心。」

——現在有些人對「穩定」的方針，軍官服

役條例有關服役年齡與任職年限的規定、軍銜的核定，議論很多，流言蜚語滿天飛，甚至惡意中傷中央領導同志，高級幹部應該以身作則，但總有個別人，拿軍齡、戰功爭名利，鬧地位，在軍銜問題上，亂搞攀比，還公開揚言比不上××就拉了槍桿上山打游擊，這已在軍內外造成極壞的影響；還有基層幹部擔心今後「上又上不了，走又走不了」，思想不穩定，事業心不強，這些現象令人擔憂，不提高警惕，就會造成嚴重的危害。」

「要正確看待所謂「後路」問題，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不同，大多數有着一個轉業的問題，同志們在這方面有些考慮是可以理解的，地方上有些不合理的個別現象也是確實存在的，像×××同志提出五五軍善後辦公室至今還有五百多名因戰傷殘幹部等待安置，××同志提出上海、杭州等市地方部門以小汽車作為接收團營職幹部的交換條件……我們一定要嚴肅處理。地方職缺有限，幾十萬幹部的安置不是小問題，這樣那樣的困難，是不可避免的。×××同志提出，地方降兩級安置團、營轉業幹



中共軍委第二副主席楊尚昆

部的情况，一時還難以全面解決，這一點老幹部都能顧全大局，體會中央的苦心，反倒有些軍隊幹部不識大體，不理解狀況就隨便發表演論，難道解放軍廣大指戰員真是「打仗是最可愛的人，搶救災難是最需要的人，平時是最可憐的人，轉業是最不受人歡迎的人」，不要長他人威風，自毀形象！這反映了有些同志不認真學習黨的政策，組織紀律性很差。在黨內，在討論的時候，准許爭論，准許發表不同的意見，就是增加「透明度」，但是不要在公開場合同黨唱反調，揭瘡疤。七屆人大會議是受全黨全國、全世界矚目的，有一些同志在上面講同中央方針政策不一致的意見！這個不好，軍隊的代表抱着瞭解情況、研究問題的態度參加會議，是可以的，但是發言一定要謹慎，如果講錯了話，那個影響就很大，是絕不容許的。」

從楊尚昆的講話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共軍隊內部的情緒。這些迹象表明，軍隊將是中國今後政局的一個不穩定因素。不過，軍隊內幕情況的外露也確實說明了中國政治的透明度增加了，這一點上鄧小平確實值得表揚。■



# 北京軍區起風波 軍隊幹部大鬧司令部

眼下中共的難題確實是一樁接着一樁，真好比按下葫蘆起來瓢。在四面不穩，八面冒煙的情勢下，一向表面看來比較安定的軍界，如今也水翻浪滾地開了鍋。

不久以前，在中南海鼻子底下的北京軍區，竟也出現了老軍人大鬧司令部的的事件，這可真夠中共上層執政者傷心的了。

## 離休軍幹不滿意安置

中共實行裁軍以來，大批軍中幹部的安置工作始終進行得不怎麼順利。極少數過去聲勢重的軍隊大幹部，即使離休或退居二線，仍然保有優越的待遇和各種特權，問題還不大；下級無權無勢的小軍官，人微言輕，只有忍氣吞聲聽擺佈，出點小麻煩中共不放在眼裡。只有那些級別不高不低，年齡不大不小，有資歷沒水平，有苦勞無特長，以往為中共「拉磨」有功，平時耀武揚威，一呼百諾慣了的官兒們，欲往地方上安置吧，找不到合適的「坑」，請他們離退休吧，他們又不甘寂寞，賞個「顧問」之類的虛銜吧，他們又覺得不實惠，所以不上不，下不下地卡在那裡，動不動便找岔鬧

點豎扭。

中共關於「授予軍隊離休幹部軍功勳榮譽章的規定」、「軍官軍銜條例」和確認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間授予的軍官軍銜的決定尚未正式出台，就在這些早已牢騷滿腹的「軍爺」心中點起了一把火。他們認為什麼「軍功勳榮譽章」啊，什麼「確認軍銜」啊，不過全如給死人立牌坊，虛名而已。「人走茶涼，戴個斗大的功勳章，不如指揮百十條槍，有啥用？娘的！」這是某退居二線的一位團長的肺腑之音。

據來自北京的一位高幹子弟反映：現在北京軍區許多退居二線的團級以上幹部，常常聚在一起罵大街。他們在軍人食堂故意和工作人員吵架，橫挑鼻子豎挑眼，動輒摔盤子砸碗的鬧一番，搞得上下下下都沒辦法。

## 群起鬧事靜坐抗議

今年五月初，幾位退居二線的軍隊老幹部一起來到北京軍區司令部的門前靜坐，抗議物價上漲，要求提高待遇。為此，他們與軍區的執勤軍官發生爭執，一名原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的部長，竟動手打了執勤軍官兩記耳光。這位

黎音

老軍人指着執勤軍官激動地罵道：「老子當兵扛槍那年月，你小子還沒出世，今天也想教訓爺爺？鄧小平算老幾，沒有我們這些老七老八給他扛槍，他也能當上軍委主席?!」其他靜坐的人也都七言八語嚷個沒完，當時氣氛甚是火爆，在北京軍區引起很大反響。

第二天下午，軍區大約近二百名已離退的以及現任「顧問」職務的老幹部，在軍區二號小禮堂集會。當場有十幾名與會者脫掉軍裝，僅穿着背心、褲叉，以示抗議。有人喊道：「數數老子身上的彈疤槍孔，看看該授給幾道橫幾個花！」

這次抗議集會者，一致要求秦基偉接見。秦基偉推說沒有時間，指派軍區司令部的周副政委出面「聽取意見」，可是這些正在火頭上的老幹部不滿意，痛斥秦的「架子大，目中無人」；原軍區裝甲兵一名副司令員指着軍區周副政委的鼻子說道：「你也配和我們談?!叫秦基偉來！」

## 惹惱了鄧小平

據北京軍區內部知情者透露：上述事件引起了中央軍委辦公會議的高度重視，鄧小平得悉報告後十分惱怒。他批評說：「對老幹部的的工作要做，但不能過份姑息遷就。不論過去職務多大，級別多高，如果有意製造事端、製造麻煩的也要按黨紀軍法處置。」鄧小平的有關批示，已由軍委辦公會議作為正式文件下發。瞭解中共軍中動態的人士分析：中共軍隊潛在的矛盾，絕非一紙文件或鄧小平說幾句話所能解決得了的。既然已經有人開了頭，可能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面。

# 在新聞被封鎖的背後

農廳

## 北大大字報號召聲援房山農民暴動

綜合來自北京的消息說：最近在北京發生的房山縣農民暴動問題，已引起北京市委和中央上層高度不安。房山縣和昌平縣歷來是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抓的典型。房山縣委書記，今年初調任北京市委擔任市委宣傳部長。事件發生後，北京武裝警察部隊連日抽調近千名指導員，荷槍實彈進駐房山一中、二中學校。據說中央命令北京市委控制局勢，決不能使事態擴大。地處北京市平谷縣北京合成纖維廠四周的農民也發生小規模的騷動，市公安局逮捕了帶頭鬧事的四人，其中包括一名原公社黨委書記和一名現任村黨支部書記，另外兩名農民群眾三天後被公安局用車送回村裡。村民被告之說，兩個書記將受到嚴勵處理。房山、平谷農民鬧事後，通往房山縣城的公路被封鎖，來往車輛嚴格檢查。中央指示市委，決不能讓大學生和農民搞到一起。因此，凡是進入房山縣的車輛都要檢查身份證和工作證。最近，北京大學校園發現兩張大字報，號召大學生們聲援房山農民，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 公安人員無故致死人命

爲了鎮壓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維護所謂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近期北京市等地警車橫

行。據來自北京內部消息說，今年上半年被捕的人員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二，市公安局又先後開辟了石景山、密雲縣和延慶縣四處臨時收容所。公安人員無故致死人命事件經常發生。北京清河毛紡廠二名男女青年因談戀愛在景山公園深夜未歸，被巡夜民警以流氓罪抓到公安局。在無理審訊中，男青工（二十七歲）于宏偉被四名警察用警棒活活打死；女青工被迫無理被檢查下身。事件發生後，于宏偉的姑夫是北京駐軍某機械化師政委聞訊，帶領荷槍實彈警衛排，找到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和市公安局長，秦基偉聞訊也過問了此事。四名打人民警才被收容，問題仍在處理中。但知情的市委幹部私下說：于宏偉的姑夫要不是師政委，帶槍找市長，公安局打死一百個人也沒人過問。

## 一份引人痛思的答卷

最近，北京八中高一（三班）兩名中學生在班裡搞了個小型民意測驗。全班五十八名學生中百分之八十在「請問：你最痛恨什麼人？」一欄中填寫「警察」、「警狗」、「警匪」；百分之八十的學生在「請問：您目前最嚮往什麼？」一欄中填寫「出國留學」；近一半的學生在「請問：您最崇拜的當代大人物？」一欄中填寫的是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

切爾夫人，其他一半學生有的填寫劉曉慶、鄧麗君，有的填寫胡耀邦，只有兩名學生填寫的是鄧小平。

北京××報原來準備發表這個民意測驗的消息，同時配發社論：「一份引人痛思的答卷」，結果不但被市委宣傳部制止，報社領導人還受到內部嚴勵批評。

## 三輛運輸汽車在津京公路上被搶

國內民衆對日益上漲的物價，越來越感到憤怒。據來自新華社的消息說，今年四月份以來，在河北省保定市、津京公路等地已發生多起暴民哄搶國家物資惡性事件，五月七日，在天津廊房地區與北京通縣地區交叉地段津京公路上，三輛運輸水產品的卡車被十八名群眾攔截，三名司機被捆綁推進沿路廁所，百分之八十的物資被數百名過往群眾哄搶。據事後調查，在哄搶人群中，不但有工人、農民、機關幹部，還有休班民警。廊房地區公安局二名幹部事後被傳訊時，只回答說：我們見好多人上車去拿，以爲沒有人要，所以也拿了幾條魚。通縣縣人大常委會一名副科長事後被追問哄搶的帶魚去向時，他回答說：以三元錢一斤的價格，轉賣給了他做個體小商販的堂弟，七十五斤帶魚賣了二百多元錢。人民日報原來準備刊登這條消息，由於中央擔心引起不良後果，此消息只作內部通報了。

# 警棍下的拉薩

## — 流血的三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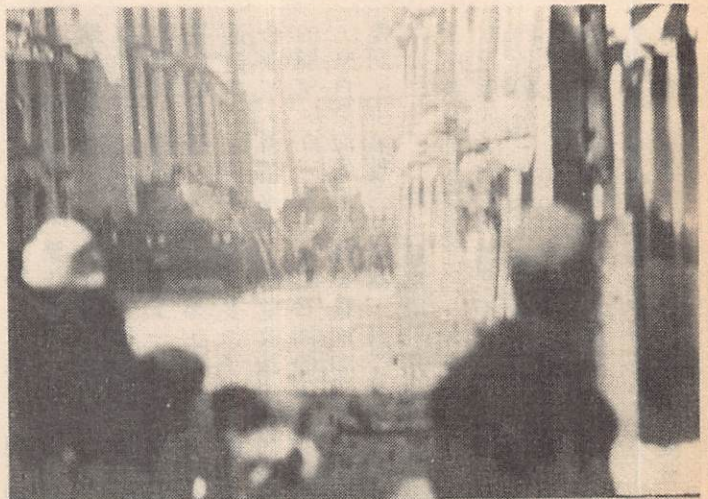
文峰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最新消息和調查報告，三月五日是在拉薩的一個重要宗教集會的最後一天。在警方和群眾的衝突中，有卅人在拉薩死於警方的鎮壓。

在死亡的卅人中間，有十二名喇嘛在寺院被警方打死，其中包括一名十三歲還沒發願的預修喇嘛。剩下的十八名遇難者不是被打死在寺院中，就是被打死在秘密警察公署。

三月五日，在一場示威者和警察的衝突之後，警察衝進并清洗了寺院，帶有釘子的警棍無情地打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死者的屍體隨後被扔上卡車運走。軍隊也加入了這場鎮壓。

中國警方僅僅承認在這場鎮壓中只有五人死亡，其中還包括一名警方的「烈士」。三月五日之後，有不計其數的示威者和無



大批軍警衝向手無寸鐵的群眾

辜者陸續被警方拘捕。

四月初，官方宣佈有二百人被逮捕和拘留。但是，據國際特赦的消息和有關方面的調查，被陸續關押和逮捕的西藏群眾可能高達兩千人之多。他們在關押中遭到毒打及各種折磨。

一位拉薩的卡車司機是在拘留中被毒打致死的，他的死亡的準確日期不詳，但肯定是在三月五日到三月二十三日中間。據目擊者說，他的臉已被打得不成人樣，血肉模糊，幾乎不能辨認，一隻眼睛吊在眼眶外面，全身的骨頭幾乎全部被打斷。

現在國際特赦組織正在通過有關方面向中國政府交涉，要求中國政府必須對所有的被關押者給予人道主義的待遇，其中包括允許親人正常的去探親並提供律師。



拉薩的憤怒之火

# 焦慮 + 疲勞 + 危機 =

## 準備頭破血流

沐雨

鄧小平說：

不改革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中國改革的出路在哪裡？這個問題不僅在中共的核心層引起內部激烈爭論，也在國內省市一級以至地縣一級引起爭論。

據來自北京新華社內參部的消息說，爲了進一步了解和掌握下面情況，中共中央書記處下半年以來，已先後召開三次地、縣一級黨委書記座談會（其中包括鞍山鋼鐵公司、湖北汽車製造廠等大型工礦企業黨委書記座談會）。據能接近和了解這三次座談會的新華社記者認爲，參加座談會的地委、縣委書記們普遍對當前的改革缺乏信心，特別是西北等內地省份的書記們，在座談會上公開抱怨中央對他們採取：「一輕、二甩、三緊」政策（一輕：輕視；二甩：甩包袱；三緊：要求內地省份大幅度壓縮經費開支）。來自寧夏回族自治區的一名縣委書記和甘肅省的三名縣委書記，借開座談會的機會，聯名向中央寫了一封信，最後參加座談會的十七名縣委書記都在這封信上簽了名。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表達了內地黨員群眾關心改革，希望改革，盼望改革給他們帶來實惠的願望。在六月十九日召開的第二次座談會上，來自沿海省份的縣委書記和內地省份的縣委書記產生嚴重對立情緒，甚至發生激烈爭吵。六月二十三日晚上趙紫陽利用兩個小時和第二次座談會的代表見了面。趙紫陽說：「我聽啓立說形成了兩大陣營？不好。中央對你們（指內地省份）從來沒有半點偏心，你們都是縣委書記，你們的思想不通，怎麼能去帶領黨員群眾？」趙紫陽還說：「我們過去搞的一套，如果還不下決心大刀闊斧的去改，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風險很大。我們面臨的困難比大家談

到的還要多的多。鄧小平同志最近講道：「不改革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改革下去，也許會碰得頭破血流，即使碰得頭破血流也比亡黨亡國強上一萬倍！」

趙紫陽最近顯得十分疲勞

爲了推行改革路線，深化改革，發展改革成果，改革派的頭領人物趙紫陽自人大會議以來，幾乎每週都要約見一、二名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開展「談心活動」，苦口婆心地爲他的下屬打氣。據能了解到中共上層動態的人民日報記者反映說：「總書記趙紫陽最近顯得十分疲勞，他的保健醫生已多次要求他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睡眠時間。」



準備破釜沉舟的鄧小平、趙紫陽

## 胡耀邦重返政壇的可能性日趨加大

趙紫陽、萬里六月初一起會見了鄧小平，共同表達了他們希望胡耀邦重新工作。萬里半開玩笑地對鄧小平說：「耀邦同志最近很閒哪，忙的忙，閒的閒也不公平呵。」據說鄧小平聽了他們的談話後表示說：「你們去找胡耀邦談一談嘛。」據說趙紫陽、萬里事後又一起正式去找胡耀邦。胡耀邦對此表示了三點意見：一，八六年年初的事情可以放一放，暫時不去爭論；二，必須堅持我過去提出的政治改革的方向；三，工作可以，但必須做一點真正能起作用的實際工作。據說趙、萬二人表示贊同胡的意見，下一步關鍵仍要取決於鄧小平。

隨着中國政局的發展，越來越清楚地顯示出，去年開展的反自由化、撤銷胡耀邦總書記的職務，也可能是鄧小平晚年犯下的最重的一次大錯誤。目前，不僅仍居高位，仍掌握實權的團派為胡復出奔走游說，不少過去思想趨於僵化的保守派人物也醒悟了「倒胡失利」。據說，陸定一、習仲勛都在最近中央召開的一些內部會議上表示：「現在看，對胡耀邦的問題處理過重了，不能不承認這個問題。」在最近召開的幾次中顧委常會和其它會議上，一些中顧委委員也不斷表示出類似的看法。于光遠最近在給趙紫陽的一封信中表示，胡耀邦同志的問題不解決，黨心不順，民心不順。趙已指示把于光遠的信在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成員以及軍委常委中間傳閱。

從現在各種迹象顯露出，胡耀邦重返中國政壇的可能性日趨加大，甚至連薄一波也似乎看出大勢已定，在最近幾次內部談到胡耀邦問題時，口氣也有了明顯改變。

## 黨政高層的秘書正在接受審查

由於最近一個時期，海外報刊雜誌不斷披露中共核心內層，以及核心人物的內幕問題，已引起中共中央調查部、公安部、安全部和軍委保衛部等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據可靠消息，中央正在調整大官們的秘書層，趙紫陽的秘書和一名文件機要秘書已撤換。這次調整先從政治局、書記處和軍委常委的秘書開始。

## 「街頭巷語」無名草

- (一) 共產黨的幹部房子愈住愈大，汽車愈坐愈小；
- (二) 人民幣的票額愈來愈大，買回來的東西愈來愈少。
- (三) 高幹子弟隨意揮霍，普通百姓無法生活，物價自然天天漲，人心當然時時落。
- (四) 工人拚命幹三天，剛夠買包進口煙；職工每人多十元，回家分攤一除三。
- (五) 「公安」抓人償無限，工人超產獎有錢。國家貸款收不回，命令債人撞拐騙。
- (六) 眼看要離休，後事考慮周；子女安排妥，撈把票子溜、溜、溜。
- (七) 個體吃集體，集體吃國營，國營吃國家，國家吃大家。
- (八) 中央文件如洋蔥，由上到下層層剝，輪到百姓手，全是空壳壳。
- (九) 賺錢賺錢，吃完穿完；不存銀行，不再投產。「運動」一來，奈何光杆！
- (十) 想賺錢，稅逃完。行小賄，逃重稅；雙方清醒，大家無罪。

(中國黨政高層的秘書，歷來是中國上層的一個無形的、權力很大的特權階層。凡是給首長做過秘書的人，都會成爲黨政領導人的二、三梯隊。這些秘書往往只對他的頂頭人物負責，俗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們不僅可以代首長批閱文件、接待來訪者、發號施令，而且生活、政治上享有很大的特權)中共中央辦公廳協同有關保衛部門，已制定出一個規劃，利用三個月的時間逐個審查調整正部長以上的秘書層。

## 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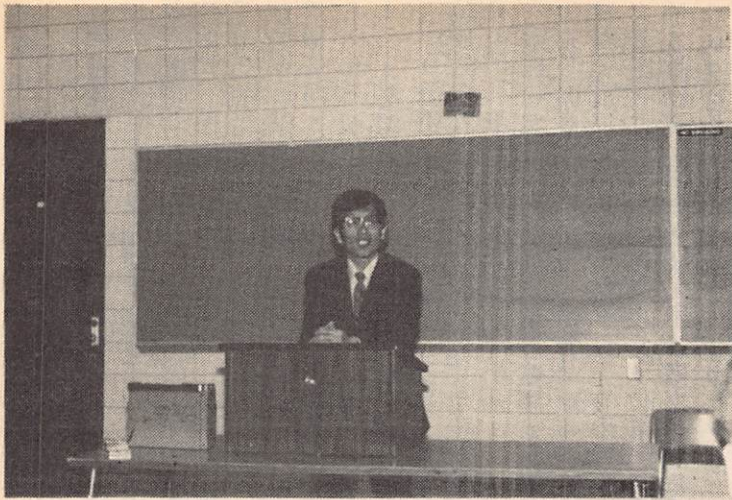


韋華

是誰的車  
在黑暗中駛向——  
永恆的惡  
沒有司機  
也沒有乘客  
只有拴在車後狂奔的狗  
無法休息  
無法逃脫  
扔掉你的墨鏡  
朋友  
莫把這機會錯過  
是十字  
還是心  
在那狗的頸圈上閃爍

# 胡平：

## 致中共領導的公開信



中共中央領導人：

你們好。我寫這封信，是爲了和你們平心靜氣地討論一下我們都十分關切的問題。畢竟，你們也有一種嚴重的危機感。

最近，你們作出決定，要不計風險地闖物價關。這個決定看起來很好，它表明你們進一步實行經濟改革的強烈願望。但是認真思考一下，我們不能不發現事情并非像乍一看去的那麼簡單。所謂「不計風險」究竟是指什麼呢？根據過去的經驗，放開物價，一般會引起價格的普遍上升，從而使相當一部分民衆的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倘若如此，「風險」就該是指民衆的不滿和反對了。而「不計風險」則意味着對民衆的不滿和反對置之不理。可是我們知道，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能夠對民衆的普遍反對置之不理的，除非它能夠用強力壓制下這種反對的聲音不讓其公開表達出來。這就是說，爲了要「不計風險地闖物價關」，你們可能會進一步強化專政機器的壓制功能。這意味着，在今後，人民的自由（如果以前還多少有一點的話）將進一步被剝奪，輿論的批評職能將

進一步受禁止，所謂「反自由化」運動將持續深入地開展，更多的批評現實和呼籲自由民主的人士將被開除、被解職或被監禁。所謂「不計風險」，莫非就是指的這些？

當然，你們也可能未必很樂意採取上述措施。你們更希望群衆能理解你們的改革計劃，自覺地作出犧牲。但是問題在於：

第一，我們彼此都明白，事實上并不存在着一套完整的改革計劃。誰也不能令人信服地向人們證明，目前我們遭遇到的種種困難只是短暫的陣痛而不是長期的、持續增長的痛苦。迄今爲止，還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然渡過「物價關」的。那些物質基礎比我們好得多、幹部素質比我們高得多、經濟改革起步比我們早得多的社會主義國家眼下也都還處於嚴峻的困擾之中難以自拔。既然如此，我們如何能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一味樂觀？

第二，幾十年來，中國人民作出的犧牲實在是太多了！可是到頭來，這些犧牲又換來了什麼？鑒於以往多次痛苦的經驗教訓，如今的人們怎肯輕言犧牲？

談到犧牲，我們務必要弄清楚，在什麼樣

的條件下，一個政府才有權利要求它的人民作犧牲。一般來說，只有當着強大的外敵威脅和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政府才有權要求人民作犧牲，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那個給人民帶來損害的是外部的因素、外部的力量。無論如何，一個政府沒有權利叫人民爲它自己的錯誤「交學費」，沒有權利叫人民爲它自己所造成的巨大損害作犧牲。

現在，我們都已經認識到，舊的那套經濟體制是不中用的。我們都贊成經濟改革。我們都承認，在新舊經濟體制的轉換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困難，因此我們應當作好承受一定困難的思想準備。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帳算在舊體制身上，算在毛澤東等人身上。但是，找出錯誤的責任承擔者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把錯誤本身弄透徹。

無庸諱言，世界性的社會主義經濟試驗已經遭到了決定性的失敗。這裡的主要過錯，倒不在於一些領導人一時相信了一套錯誤的經濟學理論，因為有許多經濟學理論都包含有錯誤，而人們一時相信一套錯誤的理論也確屬難免。這類錯誤不僅過去會犯，今後也仍然會犯。重要的問題在於，人們把一套理論絕對化、神聖化；以及更重要的是，人們決心用強制的方法、用專制的方法去推行他們自以爲是的主張。人類爲了前進，總要進行各種探索和試驗。如果這些探索和試驗是自願自發的，那麼它們就既是必要的，又是有益的。可是，強制性的試驗就不同了。由於強制性的試驗剝奪了被試驗者的人權和自由，這本身便是一大罪過，倘若它所依據的理論不幸又充滿着謬誤，其後果自然就會是災難性的了。

今天，你們已經放棄了過去多年奉爲圭臬的經濟模式，轉而尋求建立一種更爲重視市場

功能的或多或少較爲自由的經濟體制。這無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你們改變了你們的觀點，却沒有改變你們的思路；你們改變了你們的目標，却沒有改變你們的方法。簡言之，你們仍舊熱衷於用強力、用專制的手段去實現你們的改革計劃——毛病恰恰就在這裡，危險恰恰就埋伏在這裡，我們堅決反對的一點也恰恰就在這裡。

「改革」這個詞現在已經用得很多（像當年的「革命」一詞一樣），而「反對改革」這頂帽子也像當年的「反對革命」一樣，成了一個很方便的整人借口。最近，一些大學生倡導自由民主的活動和一些報刊發表批評黨風的文字就被你們扣上了「反對改革」的罪名，更不用說中國之春了。近些年來，許多人極力鼓吹改革，只因為他們提出的改革方案和你們的一樣，有的只不過是提得比你們略早一些，就被你們批判處分直至監禁（這就叫「反對改革」）。一旦「反對改革」變成了當權者打擊一切不合己意的棍子，這樣的「改革」焉有不變質之理？

即使在純粹經濟的領域裡，目前提出的這套物價改革方案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不錯，從理論上講，自由的價格能發揮配置資源、傳遞供求信息和刺激生產的作用。但這些作用唯有在那種私有制的市場經濟中才會發生。否則它只會破壞已有的生產力。這就涉及到所有制改革的問題了。國內外的專家們都已經提出過不少有價值的分析和建議，相信你們之中一些人對此也不是沒有考慮。我這裡要強調的是，僅僅是在經濟領域內進行所有制的改革還是無濟於事的，因爲今日中國的（事實上也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問題都不純粹是經濟問題，在更深刻的意義上，它們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

題。

細心觀察中國這些年來的經濟改革，人們普遍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中央提出的不少措施，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似乎都是很正確的，但一付諸實施却常常引出事與願違的尷尬效果。譬如說在農村實行分山到戶，本意是在調動農民愛護和合理使用森林資源的積極性，殊不料農民得到山林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拚命砍伐，盡量把木材用掉或賣掉，反而加速了森林資源的濫用和破壞。這種殺雞取蛋式的短期行爲，正是目前各種經濟部門的不約而同的共同行爲方式。它反映出人們對產權前景缺乏信心。依我們之見，這一點就構成了經濟改革失敗的基本原因。畢竟，一種經濟制度的正常運行離不開一個大的背景。和傳統的指令性經濟不同，市場經濟有賴於人們對產權前景抱有信心，抱有良性預期。人們的預期要是不一樣，行爲就會不一樣，經濟前景也就不一樣。大家都知道，對市場經濟而言，重要的是確立規則，政府必要的調節也多半是間接性的。而間接的東西要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必須適合人們的願望和期待。當人們的願望和期待以一種反常的、扭曲的面目出現時，經濟領域中的「不虞作用」就發生了：你發出A信號，原本預期得到效果A，殊不料却引出了效果B；等你再改用B信號時，結果又引出了效果C。正打不能正着，歪打也不能正着。在一個存在嚴重惡性預期的地方作決策，好比在一個坑坑窪窪的桌面上打台球，在這裡，手的靈巧、計算的精確，幾乎都沒有多大的意義。歷史上許多失敗的經濟改革或財政改革，並不都是由於主事者的惡意或愚蠢，而是因爲他們沒有或無力去改變那個大背景。

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既然你們憑借着一

個無限的權力，極其粗暴地搞了幾十年的「共產」；既然你們直到現在還不肯放下「共產」的旗號；尤其是，既然你們一直要堅持那個以反對自由化爲己任的無限權力，總是把決定人民命運的權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肯交還人民自己手裡，人民對產權前景就不可能有信心，從而市場經濟基本上就無從談起。你們屢次表白現行的改革政策幾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這是沒有用的。在人們需要自信的時候，你們却要求人們「他信」，而在這裡，自信和他信剛好是互相反對的；你們希望人們相信你們，這本身就表明你們不希望人們相信自己，不希望人民自己享有不可侵犯的權利，不希望人民自己能有權選擇他們認爲合適的政策和政府。在拒絕政治民主的前提下搞經濟改革，好比在死命踩住刹車的情況下加大油門——汽車本身難以前進，只是徒然地加速燃料的消耗和機器的損壞而已。

「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這句話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但它却完全適合於今日之中國大陸。沒有最基本的自由民主，經濟改革必然走彎路、走岔路，必然變樣變質。沒有獨立的輿論，沒有真正民間的組織和活動，權勢者們就一定會把改革帶來的沉重負擔壓在普通老百姓身上，同時也一定會把本來就少得可憐的財富抓在自己手裡。無怪乎一般民衆對經濟改革越來越消極、越來越不賣帳了。如果你們繼續這樣下去，把經濟改革作爲壓制自由民主的口實，你們怎麼還能指望它能得人民大眾的支持？如果沿着目前這套方法搞下去，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經濟形勢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困難，通貨膨脹將持續發展，自然資源將日見破壞，貪污腐化將變本加厲，政府與人民的矛盾將日益加深，消極怠工、偷工減料的

現象將蔓延全國，另外，還會產生非工業化的危險趨勢。到了二〇〇〇年，中國不但不能超英趕美（像毛澤東當年所說的那樣），不但不能成爲四個現代化的強國（像周恩來當年所說的那樣），甚至也不可能達到小康水平（像鄧小平所說的那樣）。那時的中國，將被現在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用在後面，退入「第四世界」。比單純的經濟落後更嚴重的是，到了那時，各種社會矛盾將無法克服，政府與人民的對立將不可調和，人心的離散將不可收拾，國土的分裂將不可避免，整個民族的素質將空前墮落，任何高壓也不足以防止衝突的爆發，一切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歷史上，成功的改革很少，成功的革命或政變却比較多。原因之一是統治者往往缺乏必要的明智，在應該妥協的時候一味拒絕妥協。在一種高度集權的社會結構之中，廣大人民的意願很難得到充分明確的表達，這就更容易使統治者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當他們自認爲有力量時候，他們拒絕放棄應當放棄的那部分權力；而當他們意識到非讓步不可的時候，讓步則往往已經來不及了。這就導致了歷史上的許多轉變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我們知道，在現實政治中，清明的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唯有靠着這一點清明的理性，我們才能把一個國家的政治引上正軌。

中國的改革已經進行了十年，它一度在人們心中燃起了希望，但現在它正遭遇到嚴重的危機。我們並不是說，有了民主，一切困難就會自然消失，但我們堅信，唯有實行民主，一切困難才有解決的可能。

我是在一九八七年一月離開中國的。在一九八六年下半年的全國性政治改革討論熱潮中，我深深地感到，中國人民、尤其是那些政治

上最活躍的人們，自由民主幾乎已經成了大家共同的認識。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已經聚集成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很難相信，在絕大部分人們的思想已經傾向於自由民主的時候，這個社會還可能長期地維持舊有的專制。在中國，由於高壓造成的恐懼感和消沉感的慣性作用，贏得自由民主還是困難的，但是，在業已喪失了廣大人民的自覺支持的情況下，繼續維持專制則更難。二十世紀是一個變化迅速的世紀。這一點，以你們的年齡和閱歷，想來比我體會更深。多少觀念，在昨天看來還是天經地義，在今天看來就成了荒謬不堪；多少事情，在昨天看來還是不可想象，在今天看來就成了不可避免；多少措施，在昨天看來似乎還爲時太早，在今天看來恐怕就已經是爲時過晚。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現在你們所從事的改革，正是對你們過去所做事情的一種否定。這就提醒人們：要承認自己認識的局限性，要承認自己力量的局限性，要承認別人的基本的自由權利。在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流血震盪後，中國人民需要和解，需要相互容忍。任何有背於此的做法都會造成不可彌補的後果。

中國處於嚴峻的危機之中。但是，我們對於未來仍然充滿着信心，因爲歷史站在我們一邊。

在這樣的時刻，我給你們寫下這封信。我相信，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會對未來、對我們的子孫後代產生深遠的影響。面對歷史，我們應當有一種深刻的責任感。

敬禮

此致

中國聯席主席 胡平

一九八八年八月廿四日於紐約



# 評「十三大政治改革方案」

李三元

我在十三大剛結束時，寫了一篇評趙紫陽政治報告的文章，在中報上發表。我的主要觀點是趙紫陽的政治報告象徵着一個政治統治一切的時代的結束。中國的政治將走上一個在舊的枷鎖中掙扎，努力探尋新的出路的階段。趙的報告便是這種探尋的一個嘗試。他所提出的主要方法：建立人民與黨和政府對話的渠道，實行黨政分工等到底能不能行得通？要落實這些設想必須先解決哪些問題？本文在這幾個方面進行了一些討論。

十三大已經開過近一年了。在中國僵化的政治體制與發展經濟的矛盾越來越暴露，但報告中強調的政治體制改革却不再被官方強調，甚至已很少被提起。這種現象證實了本文對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分析的結論，即在一個虛架子下面缺少具體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受冷落一方面是證明了它的困難性，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它的重要性。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在一定階段之

後便只能導致更多的混亂和腐敗。

本文在會發表的那篇文章的基礎上略有修改。趙紫陽的政治報告可能已被很多人遺忘，但他在報告中所提出的問題如黨政分工，建立政府與人民對話渠道却是不應該被忘却的。認真分析十三大的改革方案，對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今天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是有所裨益的。

## 一、集權政治與「左」的積習的關係

社會與政治間關係的任何一種改變都要面臨兩個最重大的問題：(1)政治權力的合法性；(2)社會積累的發展和延續。

在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中，一套總統班子如果沒有將經濟搞好，它便不能獲得選票以繼續當權。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國家是投資者，政權本身掌握着經濟的命脈。獨裁者可以在較長一個時期裡，不考慮經濟效應，全力去推行一種與經濟發展相違背的政治路線。國家政權所能承受的經濟和社會壓力較資本主義民主國

家的大得多。各種宣傳工具都由國家政權直接控制，經濟問題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為宣傳所掩蓋。

毛澤東時期處理經濟停滯、社會不滿的另一個方法就是抓階級鬥爭。抓出一些人來說他們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狠批狠鬥，將一切過失都歸罪於他們。這樣一來，真正的問題根源被掩蓋了，絕大多數人被搞得人人自危，覺得自己尚未被抓出來或已被放過已是十分慶幸的事了，哪還敢再抱怨不滿。社會上老百姓的疾苦，一般不能被反映到共產黨的高級官員那裡去，從文學藝術，到社會科學，人們所能聽到的只是一片讚歌聲。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社會的矛盾在不斷地積累，它們得不到有效的反映和處理，趙紫陽所說的阻礙改革開放的「僵化體制」便是毛澤東時期全能政治的遺產。

趙紫陽在文中說：「在初級階段，特別在當前時期，由於長期形成的僵化體制嚴重束縛着生產力的發展，改革便成為迫切的歷史要求。改革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自我

完善，是推進一切工作的動力。」這段話的理論意義在於它承認在中國存在着一種長期形成的僵化體制。同時它也承認社會主義中國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存在着問題，需要自我完善。這和以前將社會主義時期的矛盾歸結於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有了許多區別。毛澤東時期的經驗教訓告訴人們，正是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領域中的嚴重問題，才使得上千萬的中國老百姓餓死於六十年代初期，而當生產責任制將扭曲了的農業生產關係糾正過來後，農村經濟、農民生活很快就發生了重大變化，取得了很大進步。承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領域中的問題的存在，是中國共產黨將實踐已證明了的問題第一次在理論層次上加以承認。這是將理論的服務對象由宣傳掩蓋轉向討論實際存在的問題。這種轉變在中國理論界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 二、中國現代化的道路

趙紫陽在文章中指出了在中國「左」的積習很深，改革開放的主要障礙來自於這種積習。他僅僅是指出了問題，沒有作進一步的分析。人們會問這種「左」的積習是怎樣形成的，它和毛澤東時代的鬭爭、專政理論有沒有什麼內在的關係？它與共產黨中存在的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的關係又是什麼呢？這些問題都是一些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不將它們討論清楚，改革和開放就沒有一個政治綱領和理論指導。

有人會問：「四個堅持」不就是改革開放的政治綱領嗎？也有人會說：「改革開放並不需要什麼政治綱領，只是腳踏實地地幹，摸着石頭過河就對了。」這兩種說法是有很大漏洞的。人們知道四項基本原則是毛澤東時期的政

治綱領，它與毛澤東的鬭爭、專政理論是一回事。如果說「左」的積習就是在鬭爭專政的政治環境中產生的，那麼人們怎麼可能期待用四個堅持去反對「左」的積習呢？從前有個人，抓住了一隻他所憎恨的野兔子，為了給它以最嚴厲的懲罰，將它扔進了布滿荊棘的灌木叢。用四個堅持去反對「左」的積習與將野兔子放進灌木叢是同樣的事情。

儘量將四個堅持掛起來，努力搞經濟抓生產，「摸着石頭過河」，這是趙紫陽給中國問題開的處方。我稱這種方法為「經濟單軌法」。所謂單軌並不意味着政治之軌不存在，它是存在的，只是不配套，不諧調。關於「經濟單軌法」我想有兩個問題是需要研究的，一個是實行這種方法的過程，另一個則是其結果。

第一個問題是：毛澤東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思想意識先行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政治鬭爭展開的一般模式是：發難於一個關於文化或歷史問題的討論，然後是這些問題所影射的政治鬭爭本身的展開，繼之以全面的社會經濟運動。這種模式的例子是：批判本海瑞罷官、揪劉少奇、文化大革命在各個領域的全面展開。在毛澤東死後，這種政治先行的慣例並沒有中斷。在八三年的反精神污染中和去年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關於文化和社會問題的爭論實質上是由潛在的政治鬭爭引起的，這種潛在的政治鬭爭很快就有了公開化和擴大化的苗頭，扣帽子、打棍子那一套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如果這種苗頭沒有被很快刹住，那從一場全社會的，涉及各個領域的運動必然會是隨之而來的。改革派勢力的優勢，和他們所做的妥協讓步，避免了毛澤東時期政治鬭爭模式的重演。改革派雖然最終取得了優勢，但他們付出的代價是非常高的。如最活躍最有貢獻的改革理

論家幾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和壓制，其中一些人的職務和黨籍丟掉了。蘇紹智是社會主義初期理論的提出者，現在是「理論被用人被黜」。這種作法有些過河拆橋的味道。問題是改革派今後要遇到的困難還多着呢，早就把這些改革理論家當作對保守派的抵押品扔下了，今後的日子怎麼會好過。他們必將面臨的問題是「經濟單軌法」能不能克服那「左」的積習和僵化的體制。趙紫陽選定發展經濟的道路無疑是正確的，但不清除道路上的障礙如何走通道路？

第二個關於「經濟單軌法」的問題是現代化的定義應如何下。假如趙紫陽的經濟計劃一帆風順，中國在下世紀中期達到了目前中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消費水平，那麼中國就實現現代化了嗎？物質消費只是現代化社會中人的諸種要求之一。除它之外，人們還有屬於精神生活領域的政治文化要求。前者表現為人們要以投票、競選、結社等方式參與國家和地方的政治；後者表現為對各種風格、內容的文化藝術作品的欣賞與創作的自由。塞謬·杭亭頓 (SAMUEL HUNTINGTON) 對政治現代化的定義是：以市俗的國家政權代替血族、宗教、種族基礎上建立的政權；政府各級官員的委任應基於他們的能力和業績，而不是基於一些與他們在職位上的表現無關的因素；基於整個社會多元利益之上有組織的對政治的有效參與。這種對政治現代化定義的核心是多元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參與。對文化現代化的衡量主要來自人們對文化自由程度及豐富程度的感受，它較強調人們的心理狀態。缺乏政治、文化現代化的物質生活現代化不一定會給人們帶來幸福感。就好比中國現在有些礦山裡的人，錢是有的，物質消費水平也不低，可生活

仍然是很乏味的。

趙紫陽避開「全面現代化」而只談經濟現代化是有着他的歷史原因的。在十三大報告中他講道：「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後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這段話給人的印象是生產力的落後決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漫長性。實際上人們決不應忽略了政治體制的作。趙紫陽提到「僵化體制」。造成這種僵化體制的原可以說是在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換句話說問題出在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趙紫陽的確是提到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自我完善。」「完善」一詞可以包含兩個意思：一是本已很好，但有餘地再讓它好一些；另一個意思是本來很糟，現在需要把它弄好。從趙紫陽對四個堅持的肯定和他對於政治、文化的現代化的迴避來看，他用的是「完善」這詞的第一個意思，即社會主義中國的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本已是很好了，但尚可以變得更好。但如果人們看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給社會生產力帶來的嚴重破壞，看看目前封建殘餘、官僚主義及其它各種極「左」的積習的嚴重程度，人們便會認為中國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絕非是已經很好。「四個堅持」是共產黨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這個上層建築對於生產力的發展被證明不是很好，而是很糟，那麼為什麼還要將它視為神聖保持發揚呢？趙紫陽在報告中提到了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兩條：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在社會主義後面加了一個修飾語「初級階段」；在提到馬克思主義時他強調了「……必然要拋棄前人困於歷史條件仍帶有空想因素的個別論斷，必然要破除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

的理解和附加到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對這條基本原則的後半部分——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趙紫陽僅附帶了一筆：「……向全黨提出在實踐中學習和豐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任務，……」

對於四項基本原則的另外兩條趙紫陽提的很少，在黨的領導方面他主要談了黨政分工，他講道：「黨政不分使黨處在直接執行者的地位，難以避免官僚主義的產生……」對於人民民主專政，趙紫陽只提了一句：「人民民主專政不能削弱。」這句話跟它的前後文毫無呼應，一看就是硬插進去以減輕保守派的不滿。

四項基本原則單拿出來任何一項討論，都有許多與發展生產力不大諧調的地方。趙紫陽不是想辦法儘量少提——如對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得煞費苦心地潤飾修改一番——如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說正是他的求實精神才使得他在分項討論四個堅持時顯得如此躊躇。人們會發現，在趙紫陽的報告中當四項基本原則作爲一個整體出現時，它的份量要大大超過每一項單一原則加在一起的和，也就是說：

四項原則大於第一項十第二項十第三項十第四項，這種有趣的現象說明這四項基本原則的具體內容不一定適應趙紫陽改革開放的方案，但是作爲一個整體概念它却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趙紫陽將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目前）的基本路線定爲：「……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兩件充滿矛盾的事物必須同時並存。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爲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正是趙紫陽政權的兩個基礎。鄧小平、趙紫陽接了毛澤東留下的一個爛攤子，政治上幹部和人民的士氣低落、經濟上瀕於崩潰。鄧小平要想得到充分的支持，將權力穩固下來，他

就得大搞經濟。趙紫陽也是如此，不大搞經濟，他跟別的領導人也就沒有什麼不同了，他就沒有資本坐在第一把手的位子上。所以說大搞經濟是鄧小平、趙紫陽的一個權力基礎。

鄧小平和趙紫陽權力的另一個基礎便是對於毛澤東權力的延續性。毛澤東時期留下了一大批與四個堅持認同的共產黨幹部，他們的權力與利益是要靠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保證的，而他們的支持與合作是鄧小平、趙紫陽不可缺少的。在改革中，鄧、趙要儘量保護既得利益集團，因爲他們自己便是這個利益集團中的。中國既得利益集團中許多人的思想方法、行爲方式與發展生產力是不合拍的，但趙紫陽對這問題只能謹慎從事。

權力、職位是能夠繼承的，但個人威信卻隨着一個人的離去而消失。當年毛澤東靠統一中國，平息戰亂使他成爲最有威信的黨的領導人。今天趙紫陽在黨的最高領導位子上，則要靠他發展經濟的成果和對各種力量的有效平衡來鞏固他自己的地位。由於這種政治環境的限制，趙紫陽選走一條中間道路，這條道路一邊的標界是四個堅持，而另一邊的標界是改革開放。隨着時間的推移，四個堅持與改革開放之間的矛盾和差距也將越拉越大，這是因爲它們是取向不同的兩條軌道。如果要想保持與任意一條軌道的等距，就得與另一條軌道越來越背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改革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 三、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一些問題

爲了克服「左」的積習，趙紫陽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他講道：「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黨中央

認為，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全黨日程的時機已經成熟。「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的問題是：權力過分集中，嚴重的官僚主義和封建主義，要達到的效果是：提高效率，增強活力，調動積極性，從而完成經濟體制的改革、發展生產力。黨政分開主要是趙紫陽首先要談的問題，他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

黨政分開主要是指黨的領導幹部如何對社會活動，經濟活動進行領導的問題。黨的幹部分高級、中級和下級。對於高級領導的黨政分開是很難討論清楚的。趙紫陽最近在黨的職務和政府職務上的各種跨越兼任便是這個問題的複雜性的最好說明。

中下層領導崗位上的黨政分開問題也絕非易事，它關係到幾百萬黨員幹部的飯碗。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下層黨組織的幹部都起着傳遞和執行的任務。抓思想路線教育，抓階級鬥爭，全靠他們來推行。由於在中國長期以來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都是各項工作的首位，所以各級黨的領導一直都很忙，他們的權力最大，地位最舉足輕重。趙紫陽在報告中提到在「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下，以階級鬥爭為綱，經濟發展遭挫折。他指的是從五十年代後期到鄧小平上台。當人們認識到階級鬥爭與政治運動對於生產力的破壞，當生產力的發展被提到黨的工作重點之後，基層黨組織幹部的作用就遭到了懷疑。按照以前那樣抓政治不合時宜了，但改抓生產又不是他們其中許多人的特長。在抽象的層次上可以講他們應該保證基層單位大方向的正確，對於業務和生產起到監督和促進的作用。但對於實際工作中他們能具體幹些什麼，應如何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時，誰也沒有提出一個系統的、邏輯嚴密的理論。

趙紫陽在這方面也沒有什麼創見，他在報告中只提了黨政分開的好處、不分的壞處，但沒有提出一套使黨政真正能夠分開的辦法。他沒有講黨的基層組織中幹部的權力的縮減或轉讓問題，也沒有講他們運用手中的權力具體去做什麼事，所以說他並沒有講清楚如何去進行黨政分開。

黨的基層幹部的職能由於他們所在單位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在中國廣大的農村，生產的知識性、專業性程度不高，很多黨的基層幹部同時也是生產幹部，他們在管理行政和組織生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於這種原因，在農村搞黨政分開時，黨的基層幹部挑選他們認為是最有實權的職位幹，一般來講，他們還是留在黨的職位上。形式上的黨政分開進行以後，黨的基層幹部仍然掌握着生產大權。

城市的企、事業單位的業務，生產的知識性專業性較強，黨的基層幹部與業務幹部基本上一直是兩套人馬，他們之間的相互調換一般來講是不大方便的。在實行黨政分開的過程中，這些黨員幹部的壓力較大。這是因為他們以前的主要任務——抓政治運動、階級鬥爭，已經隨着形勢的變化成爲無足輕重的事了，而他們又很難轉到搞生產方面來。他們這些人目前的主要功能是分福利待遇：如分配住房、評定工資級別等。他們與業務幹部的關係如果處得好是互敬互讓；處得不好時則相互挖牆角，搞小動作。一般來講這兩套人馬的關係是不容易處得融洽的。這是因爲政治運動一來，如八三年的反精神污染，今年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黨的基層幹部便有事幹了，比平時要活躍得多；而在強調發展生產力，搞黨政分開時，業務幹部便會要求有更多的實權，能夠「掄開膀子幹」。在權力重新調整，制度化過程

尚未完成時，基層黨組織的幹部與業務幹部的關係是不可能穩定諧調的。

在報告中，趙紫陽提出的另一個克服「僵化體制」的辦法是「建立社會協商和對話制度」。他講道：「正確處理和協調各種不同的社會利益和矛盾，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一個重大課題。」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新的提法，它意味着共產黨不再將自己視爲能夠代表社會上的一切利益（除敵人外）的政黨。我們知道，共產黨官僚階層的利益在很多情況下是與人民的利益相衝突的，大城市一般民房非常擁擠，他們看着黨的很多幹部的優裕的住房條件感到很不滿意。這就是利益衝突的一個例子。在中國，各種不同的利益的確是需要進行協調的，這種協調的成功與否依賴於各個階層，各種利益能否有效地使他們的利益得到反映和代表。通暢的社會對話渠道是不同利益集團能夠有機維護自己利益的基本條件。在毛澤東時期，黨控制、把持一切領域。社會結構非常單一，上面是一個具有一切權力，高度組織化的政黨，下面是沒有什麼權利，像散沙一樣存在着的個人。個人與黨之間沒有傳遞信息、代表利益的中間層。黨對個人是控制領導；個人對黨則是服從聽命。

有人會問：那麼政協、各民主黨、群眾組織如婦聯、共青團的作用呢？政協委員的名稱基本上是共產黨給黨外知名且聽話人士的一種待遇。各民主黨派、群眾團體所發揮的作用在很多情況下相當於共產黨的特別支部，他們拿共產黨發的工資，執行共產黨制定的政策，受共產黨的控制管理。在成員的人數、類別、組織活動的內容形式方面都要得到共產黨的批准。由於這種依附關係，這些組織往往是只敢比共產黨再略「左」一些，很少能提出什麼新見解。

。在改革開始後，這些組織的功能有些改善，但離肩負起代表和傳遞各種不同社會利益的任務還相距甚遠。

在講建立對話制度時，趙紫陽說：「要利用各種現代化的新聞宣傳工具，增加對政務和黨務活動的報告，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大家知道，在中國宣傳工具掌握在黨手中，黨想報導的才能被報導出來，這樣一來人民能夠知道的消息就很有有限了。對於不知道，但又認為肯定存在的東西，如黨內派別鬭爭，就只能猜測了。派別鬭爭及其它許多事情的不公開，使得人民很難對於領導人的活動進行瞭解和監督。共產黨在過去的派別鬭爭中，只是等已成爲了你死我活的時候，才將它公開化。

在中國有兩種輿論，分別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第一種是官方利用宣傳工具製造的；還有一種是小道消息，人們私下聚會時的議論。第一種輿論既然多是由官方製造的，自然並不構成老百姓對他們的監督。這種輿論被用來進行派系鬭爭。所以它在中國是不可以被人民所利用的。

第二種輿論是小道消息及非正式的私下議論。這種輿論的確是產生於民間的，但它要起到對共產黨高級幹部監督的作用是非常之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下面三條：(1)人民沒有多少關於在職共產黨高級幹部思想生活情況的信息，因爲這種信息多是高度保密的。(2)小道消息及民間各種非正式的議論沒有什麼記錄形式，很難被準確地捕捉。而且在有些時期，關於高級幹部的議論是要受到懲罰的。(3)小道消息缺乏向上傳遞的渠道。被傳上去的小道消息很可能是不真實或被歪曲了的。從上面的分析看，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就很難有代表人民意志的輿論，社會協商對話的渠道就很難建立起來。

趙紫陽在報告中沒有談到文化和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和地位。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可能迴避的關鍵問題。在什麼樣一種政治環境中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才能得到調動和發揮？在改革、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是否只是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工具？文學家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是什麼？趙紫陽對這些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迴避使人感到他的報告的理論框架太鬆散空虛。這還使人們猜想是否有一種極其不穩定的因素在十三大上暫時被掩蓋起來了。可能正是由於這種不穩定因素，才有在十三大即將召開時罷黜改革理論家的事件。

### 結束語

無論如何，趙紫陽的報告打開了中國政治的一個新時期。它第一次客觀地講明了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說明了決定生產力發展的一些重要因素的運行規律。它擺脫了共產黨以前報告中常有的盲目幻想，歪曲或誇大事實以爲政治目的服務的習慣。可以說，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從七八年到目前的這段時期是政績最好、爲人民做事最多的一段時間。但趙紫陽的報告也是暴露、討論弊病最多的一篇黨的第一把手的文章。這反映了他的實事求是和實幹精神。

作者此文提出了一些趙紫陽在報告中沒有說到或沒有講清楚的問題。其中一些是處於他的位置不能講的，另一些則是尚未找到答案的。討論問題分兩個層次，一種是在實際中的可行性，另一種是理論上的完整性與合理性。本文中的一些討論是屬於後一種的。但我相信，在理論上加深認識這本身便具有重要意義。

## 回執單

中國之春編輯部：

- 我願 1. 成爲中國之春特別榮譽訂戶，現寄上 \_\_\_\_\_ 元。
2. 購買自創刊號至六十五期全套「中國之春」雜誌，現寄上 \_\_\_\_\_ 元。
3. 購買「中國之春」 \_\_\_\_\_ 期，現寄上 \_\_\_\_\_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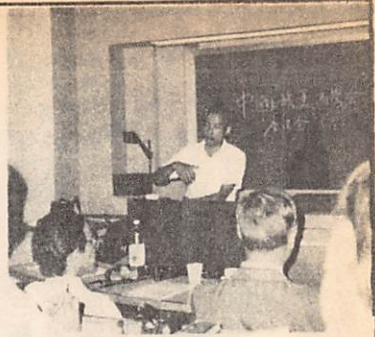
我的地址爲  
致

禮

簽名

# 農村衝擊城市 改革欲罷不能

周其仁在哥大演講



## 中國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 周其仁在哥大的講演

馮磊整理

中國的經濟改革，說到底就是要發展商品經濟。而就目前情況看，中國發展的還是個有限度的商品經濟。因為從其市場構成來說，絕大多數的人口是農民，也就是說，我們把佔比例最高的勞動力放在了一個效率最低的生產部門，這也可以解釋我們的人均收入為什麼現在還這麼低。這種情況的形成有它歷史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國家都是農業人口佔人口絕大多數，但是經過十幾二十年，它們的農業人口比例很快就降低了，其工業化發展也很快。可是只有中國，一方面高速地推行工業化，一方面仍舊大量保留農業人口。中國所以採取這個戰略，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作的一種體制的選擇。

我們建國的時候要搞工業化，可是沒有資金。如果考慮外部條件，當時能夠在資金上支持中國的只有蘇聯。而蘇聯的援助也很有限。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援助了一百五十六個項目，而這對於一個大國來說，顯然是遠遠不夠的，這就需要從其它方面籌集資金。

當時籌集資金，無非有兩種辦法：

一種是日本的辦法。明治維新後，國家從地租中征收較高的土地稅，通過這種手段，把農業的資源集中並轉化為城市工業的資源。日本的工商業發展很少靠外部資源，而主要靠內部積累，然後用這套方法把一個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

但是中國的工業化很難用這種辦法。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主要靠農民打下的。共產黨得了政權後，如果馬上搞很高的地租地稅，會得罪農民，所以這在政治上沒有可能性。

另一種方法是蘇聯的方法，也就是搞剪刀差的辦法。一方面由國家統一農產品收購，同時對工商業活動進行壟斷。以較低的價格獲取

農產品，然後以較高的價格出賣工業品。國家得到的廉價農產品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給城鎮工人，換取低工資。中國工人在幾十年內能把工資壓得這麼低，在世界上是沒有先例的，條件就是政府保證了他們初步的食品供應。第二部分農產品構成了工業原料，而低價的工資和低價的原料維持了工業的低成本。同時，中國的工業品又在國家壟斷的商業中賣很高的價格，這就形成了工業的超額利潤，最後流入了財政。中國可以在人均收入幾十美元的低水平上使積累率達到百分之三十，靠的就是這套辦法，而這在發展中國家中是絕無僅有的。

以上辦法儘管創造了高積累率，為中國的工業化打下了基礎，但同時也為社會帶來了很多弊端和代價。關鍵在於，這樣一套積累戰略，需要很多政策配合。毛澤東研究了一輩子的農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農民就是農民」。（笑聲）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農民比較實際，不會為抽象的東西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共產黨領着農民贏得了和平，推翻了地主，就這兩點來說，農民當時在政治上擁護這個政權。但在經濟上，如果農民可以在市場上賣三毛錢的米，你兩毛錢拿走，農民就會不滿。因此以統一價格收購農產品這件事情並不容易，儘管共產黨與農民當時有非常好的關係，但只要你以低於市價的價格拿走他們的产品，他們不會答應。那怎麼辦呢？這就需要在體制上進行配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市場關閉了，不准某些農產品在市場上賣。這樣一來，三毛錢的大米就沒有了，價格只剩下一個，就是兩毛錢的官價。沒有這個措施，要想拿走農產品是不可能的。但這種措施，犧牲了商品經濟，對我國的人口素質的提高和資源安排的效益起了不良作用。

第二點，你若想以低於市場價拿走農產品，除了要取消三毛錢市價的參照系外，還不能低於農業生產的成本。如果收購價不足以補償農民花的代價和成本，即使沒有市場，農民也不會同意。因此就必須把農業生產投入要素的價格也壓得很低。農業投入要素無非是土地、勞動和資金，還有些農用的器械。從前的體制對這幾個基本要素都進行了控制。例如，勞動力不准流動，因為一讓他們流動，勞動力就有了機會成本，其它產業收入高於農業，農業勞動力的價格就會上漲，農產品的低價格就維持不住。為了防止勞動力流動，國家採取種種措施，一個工分制度，一個口糧制度，一個戶口制度，完全把中國主要勞動力禁錮在他們出生的地方，這一點為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帶來極其不利的影響。

一九八三年，我們在江西作過一個計量研究，瞭解農民富裕的程度到底與什麼因素有關。原來我們以為和教育與文化水平有關，可是經過對問卷數據分析，最後發現和流動有關。問卷上的問題是：你到過縣城沒有；到過鄰縣縣城沒有；到過省城沒有；到過外省省城沒有；然後把結果進行分析，最後發現一個農民家庭的富裕程度和這個變量相關性最大。這說明流動能使農民看到外部世界的生活，並對自己的現狀產生不滿。這種不滿足是推動他變革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這也是人類進步的重要動力。而我國的制度禁錮了勞動力的流動，很大程度上就把這一動力給扼殺了。所以中國農民的愚昧並不是他們天生智商低下，而是和這個體制有關。如果一個人生於斯，長於斯，永遠沒有接觸過外部世界，那他各方面都很難開化。我國這種禁錮勞動力的體制比蘇聯東歐做的還過份。蘇聯還允許勞

非）現代化的關係漫延開來，如宗法關係、裙帶關係。這些造成人際之間關係的負擔沉重，誰都不滿意，誰都沒辦法。如果不能流動，一個人工作在那裡，他的子女也在那裡，子女又娶了親，造成一大群親戚關係，以致中國人誰也沒辦法按原則辦事情，沒辦法過渡到以契約方式組成社會交往方式。所以禁錮勞動力流動的體制對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帶來非常深遠的不利影響。而這個體制又輔之以對農用工業品的價格壟斷和控制，對農用資金的壟斷和控制，以維持農產品的低收購價格。

第三點，國家取走廉價農產品的一個重要方式是農業稅，而這種農業稅不是貨幣稅而是實物稅。如果採取貨幣稅，種多少地，交多少錢，至於我種什麼誰也管不着。可是採用實物稅形式，種糧食有糧食稅，種棉花有棉花稅，收稅客觀上要公平。湖南農民種糧食，而廣東農民不種，可是不種糧食誰替你交糧食稅呢？因此國家就要用計劃來控制全國的農業生產，這樣就把各地農業資源的比較利益給犧牲掉了。同樣一畝地，若在福建和廣東種甘蔗，畝產五噸至七噸，可種糧食相對收入不如種甘蔗。可是廣東的農民非要種一部分糧食，否則沒人替他交含在糧食裡的稅。山東農民種棉花效益高，可是他們也要種糧食，而江西的農民被要求一定要種一點棉花，否則棉花的實物稅就完不成。這樣一來，我們就犧牲了資源的合理配置。

農產品是個初級產品，它們的生產佈局對其以後的運輸、加工、銷售有初始的影響。初級產品的佈局定了以後，相應的倉庫、相應的運輸、相應的加工就跟着佈上局。而現在這種佈局錯位非常嚴重。我們去四川就可以看到，

它目前糖產量最高的是攀枝花市附近的西康地區，但原來的糖料基地是在成都平原，糖廠也就建在成都平原。可現在成都平原的糖廠沒有原料了，而西康地區的蔗糖成堆爛掉沒能力收購。這種不按市場規律調整的佈局錯位可能對國民經濟下一步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成堆爛掉的白菜

最後一個代價是城市。我們的城市企業在統購統銷的制度下喪失了成本意識。生產要素價格長期不變，並不反映資源稀缺程度，也不反映產品的需求程度。所以儘管我們搞了一個門類齊全的龐大工業體系，可是其效率却非常低，既不追逐利潤，也沒有成本意識。

概括起來看，過去我國能夠做到高積累，儘管不容易，但它並沒有帶來高效益。這是中國經濟在戰後幾十年沒有充分發展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們必須對這種體制進行根本改革的一個理由。但是這種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

以農村改革來看，它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改革比較容易，因為它主要解決一個生產隊內部吃大鍋飯的問題。過去我們把農民綁住，只能用人民公社這種半軍事化的體制去組織農民，否則很難得到低價農產品。這樣很難避免社會分配的緊張和弊病。所以改革的第一步是解決生產隊內部的分配問題。過去

是平均主義，農民年終的收入和他們勞動之間的關係不是很直接的，這一條就足以使中國農民變成懶惰的農民。中國的農民在世界上一直以勤勞著稱，但是後來他們發現勤勞毫無意義，甚至誰勤勞誰倒霉，要好要滑的二流子同樣可以拿到同樣的工分，最後產生的效益是誰也不願好好幹。對大多數的中國人，不能靠標語口號來維持他們的勞動熱情，只能靠基本的物質利益刺激。因此，對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初期就解決這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是比較好的，因為過去國家並沒有把人民公社給包下來，一個生產隊和另一個生產隊的收入差別是農民能夠接受的。一個隊一個工分二元錢，而隔壁隊一個工分兩角錢也不會打架，農民認為這是命，是這塊地風水不好。可是城市就不行了，上海提工資，北京就要鬧。其實兩地毫不相干，可工人非說是全民所有制，所以地位待遇要一致。因此農村的事情相對簡單，一個系統一個系統可以分開，一個地方改而另一個地方不改也沒關係。所以農村改革初步容易成功，道理就在這裡。

另一個因素是當時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對中國的農業沒有太高的預期，誰也沒有想到會出現奇跡。預期低現在看來很重要，發展稍為快一點，人們就會滿意（笑聲）。而這幾年搞得國內外的預期越來越高了，所以人們就很不滿意。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農村預期是很低的，當時只佈置城市要改革，而農村只是「休養生息」，當時農民實在是窮得不行了，有兩億農民吃不飽飯，全國農民平均收入僅一百三十三塊錢，其中還包括一些實物收入，貨幣收入只有幾十塊錢，有的地方才二、三十塊錢。有些幹部在調查後向中央彙報講了些實話，說要不是農民長期以來和共產黨關係好，農民就要起來

打扁擔了，打扁擔就是造反（笑聲）。中國歷史上農民這個變量非常重要，他們平時是很能忍耐的，可是等到他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要改朝換代了。農民鬧事和學生鬧事可不一樣。當時的形勢是農村的政策不調整就混不下去了，於是從調整中就摸索出一套新的東西來，例如建立物質報酬、建立個人的責任，包括對自己福利和生活的責任。這些政策的實行對生產力是一個極大的解放，超出了人們的預想。我過去在黑龍江下鄉，那裡的農業條件在全國來說是很好的，人口稀少，土地肥沃，可三百斤糧豆的畝產目標年年有人吹有人喊。有個雄心勃勃的縣委書記到那裡怎麼搞也不行，後來給省委寫了封信說：「你把馬克思派來也不行，這個地方產量就是上不去。」（笑聲）可是包產到戶短短幾年，還是那些地、那些農民，中國農業產量每年增長四百至五百億斤，這種現象鼓舞了講實際的中國人，管他是什麼理論，只要有好處，他們就願接受。很多幹部思想也是看了增產的事實之後才轉過彎來的。當時有個「方向」和「增產」之爭，最後結論是只要增產，方向怎麼都可以（笑聲）。所以農村改革的第一步比較容易。過去農民不自由，



自由市場上賣豬仔的農民

現在自由了，這是實實在在的。過去地裡種什

麼，怎麼種，什麼時候做工、休息，什麼時候串親戚，全都被管住了，農業勞動和工業勞動不一樣，它不應節奏那麼緊張，也不應強調統一性，可以比較自由、悠閒。可是國家把這種優越性給取消了，可農民又不能享受現代工業化的文明，兩頭都得不到好處，農民還會幹嗎？

包產到戶首先給了農民自由。這塊地種什麼，種多少，什麼時候勞動、休息，什麼時候串親戚，都由他們自己決定。另一個更重要的自由，就是允許他們從事農業以外的生產，這對農民個人來說非常重要。過去說中國社會公平，其實非常不公平。由於不准城鄉人口流動，社會形成了兩個非常鮮明的等級。一個是「城裡人」，從小就可享受很多東西；另一個是「鄉下人」，一輩子什麼也沒有。他們中間有一個巨大的「農轉非」的鴻溝，怎麼也轉不過去。改革後，農民有了自由，可以搞工業，搞商業，也可以到城裡看看，去投資。這樣就把工業化、農業化、農村人口出路問題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統一起來了。實際上，農民得到的最大自由就是從事商品經濟的自由。有了商品經濟，就必然形成市場。儘管這還是個很初級的市場，但它的出現就要求我們必須進行更深一步的改革了。因為它使三角錢的大米顯示出來了，要求按需求、成本來進行交易的呼聲也隨之而生。而國家的收購價格很低，這就出現了三角錢大米和兩角錢大米的衝突。我們的農村改革是從農民休養生息這種非常樸素的地方入手的，可是到後來便欲罷不能了。因為國家將面臨一個選擇，是把市場封掉，繼續維持兩角錢大米呢？還是把從前一套改掉去適應農民的要求。而後一步的改革現在看來比第一步的改革困難的多，它將觸動整個國家的體制和整個



城鄉利益。

觸及到城市，這種調整就非常困難了。開始國家採用一個妥協的辦法，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而城市裡的銷售價格不變，中間的「倒掛」由財政來補貼。這形成了全世界少見的商業怪現象：國家對農產品買賤賣，然後每年在糧油上花好幾百億人民幣進行補貼，這個補貼甚至超過了教育的總投資。其結果是農業越豐收，國家財政越困難（笑聲），財政部長見了豐收就發愁，因為他要增加補貼才能收購這些增產的農產品，才能維持農民進一步生產的積極性。這種荒謬的體制看來不改是不行的。



農業越豐收，國家財政越困難，豈非咄咄怪事

可是若要改變財政倒掛，就必須鬆動城市被壓低的價格。這就牽涉到成本、工資、利潤、稅收等整個一套工業體制。從這幾年來看，這一步改革很不順利。

一動價格，城市裡馬上就有反應。別看中國城市人口只有兩億人，但嘴巴大（笑聲）。

因為他們靠近政治中心，國家所有重要的決策會議、人民代表大會、黨員代表大會沒有在鄉下開的（笑聲），都在城裡開。開會要有好的「環境」，主要就是「菜籃子」。每次都是價格剛一放開，又要管住，每次都造成財政補貼增加，而價格開放不能徹底，老在這個循環中轉不出來，這種情況已經好幾年了。現在看來已到了非徹底改革這種制度不可的時候了。如果不改，農村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城鄉關係的改善都很難實現。講到底，就是我們的城市不能把福利建立在自己的努力上，如果不能達到這一點，而是僅僅通過分配手段來滿足，例如國營企業天生就要樣樣保證，社會改革、市場機制的建立就沒有辦法進行下去。

總之，農村改革觸動了整個社會的既得利益。社會主義國家形成的既得利益與其它社會不同。英國的既得利益體現為貴族；印度的既得利益有等級；可是社會主義形成的既得利益並不那麼大，但非常平均、普遍，城裡人幾乎個個有份。改革意味着所有人的生活方式的根本變化，所以難度是很大的。

第二重困難是由於長期壓抑商品經濟，使我國的市場因素被抑制住了，形成功能退化。放開以後，人們都不知該怎麼搞了。商業發展需要培育的時間，特別人們之間的信用關係，尤其需要時間來建立。但現在不行，有些產品交換儘管已放開價格，但仍很難形成規則。據我的觀察，中國人追求錢並不困難，困難是按規則來追求錢。在美國，商業和法律是緊密聯系的。中國留學生組織的商法學會也把兩者一齊寫進名稱，可是在中國，商業和法律是兩回事。法律是一本正經的，但沒什麼太大用處，而商業呢，很多人把它看成是可以胡來的（掌聲、笑聲）。這就形成很大混亂。允許追求個

人利益但同時又沒有規則，所以國內很多經濟現象遠看就像「打擺子」一樣。有一段時期有人提出「金錢第一」。行不行？後來發現不行，因為其引發很多社會現象使人們難以承受。關鍵是要有規則，但規則的樹立確實很難，因為它不是由少數人願意遵守它就可以樹立起來的。如果社會中誰也不遵守規則，那麼誰遵守規則誰倒霉。國內的調查結果表明，合同的履約率只有百分之十八。現在國內聯鎖的信用危機非常厲害，我不還你借給我的錢，是因為他沒還我借給他的錢（笑聲）。在這種形勢下，搞大規模的商品經濟非常危險，它只能使一些妨礙社會公眾利益的短期行為迅速膨脹起來。於是，保守派就會說：你瞧，你們搞的商品經濟原來就是這麼一套玩意。他們就會反過來找出把它扳回去的理由，這也是國內改革的困難之所在。

所以，在國外學習的同學，不但要把國外追逐商業利潤、個人利益這種精神帶回去，更重要的是把如何按照規則追求這些利益的原則帶回去。

（本文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校閱）



農民的形象（油畫）曼中豆

# 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戰略

## 中國人大常委會特約研究員唐欣在哥大的講演

中國的改革是個很熱門的話題，可是到底怎麼改，按照什麼藍圖來改，無論中共領導人還是人民群眾心裡都沒有數。這裡有一個歷史的原因。

在一九五六年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後，當時中國領導人提出了一個錯誤判斷：認為只有使生產規模越來越大，才能使經濟發展得更好。當大躍進暴露出經濟上的問題時，中央領導人又一次作出錯誤判斷，他們不認為是方向錯了，而是嫌沿這個方向走得還不夠快。當然在上層中也不乏正確認識，如一九六二年的調整就是個正確認識後的決定。可是以毛澤東先生為首的主要領導人還是不懈地追求越大越公，最後導致了十年浩劫這樣一場民族的大災難。到了一九七六年，大家都清楚，中國的經濟已經處在崩潰的邊緣了。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只不過是表達了人民發展生產的願望，這就足以把人民團結起來，導致了震撼世界的「天安門事件」。

「四人幫」倒台後，人們普遍認為：這下可有了機會趕快發展生產力了。可是在這之間還經過了兩年的徘徊，原因是當時掌權的國家領導人還覺得在舊有的體制的基礎上，只要打倒了「四人幫」就可以發展生產力。結果兩年的實踐證明這只是幻想。如果不觸動現有的經濟體制，生產力是上不去的。於是就有了鄧小

平先生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中央上層一些保守派的重大鬭爭。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前者取得了多數和勝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只是表達了一種改革的願望，並沒有具體的措施。可是報告一公佈，改革馬上就開始了。人民群眾給了領導人一個參與改革的選擇，但並沒有給他們設計改革方案的時間。所以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產生了一些奇怪的現象。例如，中國領導人制定的改革政策，在一開始是和改革實踐相違背的，最明顯是農村責任制改革，一九七九年四月和九月中發文件還不允許搞包產到戶，可是農民不理會這一套，他們發展生產的願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的。結果中央採取的態度是步步後退，承認現實。到一九八二年六月，全國農村有百分之八十九點七的農戶完成了包產到戶的改革，於是中央只好在一九八二年底和一九八三年初發出一個文件，承認包產到戶是一種進步。也就是說用政策來適應實際。

第二種奇怪現象是種豆得瓜。其明顯的例子是對私人經濟的態度。瞭解當時歷史背景的人都會知道，中央當時鼓勵個體戶和私營經濟的發展，絕不是出於領導人的願望，而是城市大批知識青年待業問題嚴重，要在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安排就業，每個人要花一大筆錢。可是當時國家拿不出這樣一筆錢來，怎麼辦呢？

中央發了個文件，允許大家採取多種方式，靈活就業，只要吃飽飯就可以。結果是吃着吃着就發現不但吃飽了，而且吃得很好，正好迎合了鄧小平先生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於是就發展出一種理論，叫「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多種所有制并存」，今天它反而成為當前改革的方向。

所以我在研究改革時引用陳雲先生的一句話：中國經濟改革的戰略特點是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在學術上說似乎不大科學。我剛才開車起來會場的途中，就研究了半天地圖。如果不看地圖摸索前進就不知會摸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在決定中國前途的改革中，我們卻沒有時間把地圖看清楚。（笑聲）

在改革中研究並製做地圖的是我們的學者。可是當時的經濟學家處於什麼狀況呢？老一輩的經濟學家面臨兩種狀況：第一，他們需要自我解放。他們頭上還戴着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當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找當權派落實政策，獲得人的基本權利。第二，他們也需要思想解放，多年來共產黨為他們劃了很多禁區，很多問題多年不能碰而現在一碰就需要有一個摸索過程。這樣一來，我們就面臨這樣一種選擇，是等待這批經濟學家畫好藍圖再改革呢？還是先改了再說。可是人民沒有為領導人留下等待的時間，結果就沒有地圖，只好摸著石頭過河

那麼中青年經濟學家狀況如何呢？現在起着主力軍作用的這一大批中青年經濟學家當時還不是經濟學家；只是普通的學生或剛參加工作的職工，他們對經濟學正剛剛開始涉獵，或者已有一些研究但尚無很大影響，也沒有機會出版著作。因此，等待他們來規劃藍圖也來不

及。所以我認為摸着石頭過河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絕沒有意思為中央領導人鼓吹要「摸着石頭過河」。因為他們自己也很清楚摸着石頭過河是個很危險的動作。他們只能在一邊過河的過程中一邊總結經驗，一邊發揮老經濟學家的作用，一方面培養中青年經濟學家。

這些經濟學家是把經濟當作一種現象來研究，而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把他們這些經濟學家當作一種現象來研究（笑聲）。通過對他們的思想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這十年改革的路程是怎麼走過來的。儘管他們曾經有很多幼稚的想法，但是這是歷史的一個必然的過程。

# 所有制問題是企業改革的關鍵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微觀經濟室主任

### 張少傑在哥大的講演

關於企業改革，我講三個問題：

第一是企業改革的任務。其任務首先是要使企業獨立。要使企業的經理人員作出獨立的決策，這就關係到企業經理人員的任命。中國的經理人員與其說是企業家還不如說是政府官員，他們都有一定的行政級別，由政府任命，而且他們的工資都是和行政級別掛鈎的，所以他們與政府的官員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這樣一種體制勢必產生一個問題，政府會不會把最合適的官員派到企業的崗位上去。對政府官員的管理原則和對經理人員的管理原則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問題是這些官員的行為動機與企業經理人員的行為動機會有很大差別。政府官員關心的是他們的行政級別，怎樣才能得到提拔。所以他們只關心企業的短期效益而不關心其長遠的發展。中國的官員從廠長提拔到局長、

部長，甚至省長的情況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對他們的刺激不是來自企業的發展而是他們的行政級別的晉升，這是解釋中國企業經理不合理的決策的重要答案。

那麼在中國，由誰來決定企業的黨政官員的任命呢？一九八四年以來，國內對於經理人員的任命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包括其產生方式、刺激手段，特別是最近推行承包制，其目的之一就是讓企業經理獨立於政府官員系統。那麼如果不是由政府來選擇官員和委派權力，那麼由誰來做呢？這些選擇企業經理的人是否有足夠的動機來關心企業的發展呢？這又關係到所有權和所有制的問題。

長期以來，企業只是政府級別中的一個序列層次，類似於政府中的處、科或局，所以它的管理方式也必然是類似於行政管理方式，企業並沒有真正的法人地位。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解決所有制的

問題，要創造出一批關心企業發展的所有者。另一個是企業勞動者的地位問題。這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問題，它在蘇聯東歐都不存在。中國的勞動者從分配到退休基本都在一個企業內。職工在企業間的流動非常困難，其中有很多原因，包括我們對勞動者的行政分配和管理辦法，和勞動者的福利是連在一起的。勞動者的住房、醫療、子女的保健、就業都由企業負責。不同的企業這方面是有差別的，如果一個人從一個企業跳到另一個企業，其風險是很高的，他可能失去很多福利待遇，如住房、醫療勞保等，所以流動是難的。而且在一個企業中，親戚會形成非常複雜的關係，我們曾在一些大企業中做過調查，在同一單位有親戚的工人在全體職工中佔大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如果在邊遠地區和新建設的地區，這種現象就更嚴重了。

以上問題對於中國企業的影響在這幾年改革中已看得很清楚了。

第一，由於我們沒有一個行為合理的企業管理機構或個人來為企業選擇經理，制定目標，企業的獨立性就受到限制。

第二，由於對企業經理人員缺乏合理刺激機制，這樣一來企業經理往往只注重企業的短期經濟效果而不注重長期發展。以致企業往往靠拚設備獎金來維持短期的增產而犧牲了長期的積累。

第三，由於工人不能流動。企業只能對他們用刺激的方法而不能給予紀律處分。

最近，很多經濟學家都指出，我國的企業中工資和效益呈現剪刀差現象。勞動生產率自一九八三年以來一直在下降，而工資水平大幅上升。這種現象說明，工人不能流動，廠長就很難對他們採取嚴厲的措施。解僱在中國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想像的，包括像降級、降薪這樣的處分都很難實施，所以中國的廠長唯一能用的手段是發錢加薪。獎金在一開始是調動積極性，讓大家都幹活的刺激手段，可到今天已經變成收入的一個固定部分。工資是應該有的，獎金則成了真正的勞動報酬。這就使中國企業的紀律顯得日益鬆弛。有些現象在國內已非常嚴重，工人上班只幹三至五個小時的工作，這已成為一個大多數人的慣例，這不是你說服某些人可以解決的。在這種局面下，我們可以把企業要解決的問題歸結為三句話：資金無償佔用，工人不能流動，廠長頻繁調動（特別是和政府機構間的調動）。

除此之外，另一個問題是能夠為企業創造一個根據市場變化調整其內部結構的外部環境。以上問題不解決，中國企業的效率很難提高，也很難適應市場的競爭。

### 第二點講講企業的變化。

從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國企業的一個比較大的變化是它們有了市場的意識，懂得根據市場的需求和價格信息來製造銷售產品。第二個變化是經理人員獨立性加強，特別是八六年以來實施了承包制，很多工人、個體人員、教授、研究人員通過招標的辦法進入企業。第三個變化是在企業籌資方面，金融機構的作用已基本替代了財政系統。從一九八五年起，在企業投資中通過金融系統籌集的資金已超過財政系

統的投資。同時在金融企業以外的企業的直接投資也有了較大的增長，特別是企業之間的橫向聯合。還有些企業在金融市場上發行公司債券和股票，不過這融資方法到目前為止發展還是比較緩慢的。第四個變化是去年剛開始發生的，企業開始試圖解決勞動力流動的問題，使得工人可以進來也可以出去。在這裡中國的廠長們發明了一個辦法叫勞動組合。大家知道中國的一個原因也是中國缺乏廠長行使這方面權力的法律根據。廠長要解僱一個工人，後者常常要動刀殺人的。別說解僱，有時提工資時該提沒提的，都有向廠長動刀的。而勞動組合就可以解決這類問題，廠長招標找一批車間主任，每個車間主任再招標找一批班組長，每個班組長再招標找一批工人，那麼招標剩下的人就活該倒霉了，沒人要，對不起，自己負責。這樣一來風險就逐級分散了。

以上講的都是指國營企業。國營企業以外的企業變化更大。首先是鄉鎮企業發展很快，和國營企業不同，鄉鎮企業沒有一個無限大的大鍋飯，所以它們比國營企業更為有效。另外，近幾年來還出現了大量私營公司和集體民辦公司，它們都對國營企業產生了一個外部競爭，對於推動其改革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 第三是進一步改革的幾個問題。

首先是怎樣給企業以獨立的地位。如前所述，我國的企業至今仍舊是政府的從屬機構，中國有些經濟學家常喜歡引用日本小正一太郎教授的話：中國沒有企業。可見中國絕大多數企業都不是真正的企業。

那麼怎樣使企業變成真正的企業呢？首要一點需要公司法，所以現在國內研究企業問題的專家對公司法的制訂都很關心，因為只有

公司法才能賦予企業以獨立的法人地位。當然，僅有一部法是不夠的，還得有些實際措施。

其次是如何解決企業的資金籌措。這個問題國內有很多實驗，據統計，現在國內的股份公司已達六十多家，其中上海已開辦了股票的二級市場，現在有七家公司上市，其它地區也在朝這方面發展。可是中國股份制的發展也有它的困難，例如企業的各種籌資渠道、成本和利潤很不合理。企業的銀行貸款是稅前還貸。這實際上意味着國家財政承擔了相當一部分貸款風險，即所得稅的比率百分之五十五的風險。第二，由於我國的銀行也是個大鍋飯的銀行，企業還不了款，銀行也沒辦法，而發股票還要付紅利等，所以企業寧願去找銀行。另外我國的銀行是按地區劃分的，例如上海的工商銀行，就負責引收上海市居民的存款，然後將資金集中起來貸給企業。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這個地區的企業發行股票，就會擠了當地居民的存款，於是導致了銀行和企業爭奪居民儲蓄之爭。可是，企業要發行股票要通過中國人民銀行批准，銀行在審批過程中要考慮上述情況加以限制，而且企業的股票債券只能在本地上市，上海的企業的股票只能在上海上市而不能在北京上市，北京的民間資金也只能用於北京企業而不能流入上海，這就是銀行業務的地域分割所造成的後果。以上兩個方面的因素為企業自主籌資造成很大障礙。

然而中國的經濟學界幾乎有一個一致的意思，認為中國企業最終要改造成為股份公司式的企業，特別是國營企業。但是怎麼改法，怎樣用更快的速度推進股份化，現在還有很多分歧。

第三是怎樣使企業的經營者能夠有積極性。國內最近通過承包制使一些不是官員的人當

# 中共俄共政經改革 起點不同程度迥異

黎安友

上了企業經理，而且可以享有同樣的待遇和權力。但是他們的地位和權力是不穩定的，而且對他們的監督方式也有很大問題。小型企業可以比較容易適應這種方式，而大型企業則比較難。所以如何通過公司法來解決企業行政管理問題和監督問題，特別是怎樣從一個政府官員的管理方式過渡到完全適應市場的管理方式是今後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第四個問題是勞動制度的改革。這裡最關鍵的是如何建立職工的失業保險體系，以及職工的再培訓體系。沒有這兩點，職工的自由流動是不可想像的，現在除了經濟比較發達的地

區，如廣東之外，其它地區還根本談不上勞動力的流動。其中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的福利制度。有人會問，為什麼日本的企業也實行終身制，同時也向職工提供福利，如供給住房、發放獎金等。可為什麼日本企業效率高，中國企業效率差？實際上，中國政府是把很多社會福利事業推給了企業。企業搞福利當然是應該的，可是在日本，企業的福利是額外的，日本工人會認為他所在的企業福利好，應感謝公司。可在中國，企業福利是份內的。所以中國只有下決心改造這套福利制度，才能使職工更關心企業的發展。

蘇聯領袖戈巴契夫的改革政策最近深深引起美國興趣。雷根總統六月初在莫斯科參加美蘇高峰會返國後，對蘇聯的改革給予很高評價。雖然蘇聯的改革在經濟方面居中共之後，政治改革卻領先甚多。這種差異原因何在？

我們且先比較雙方的經濟改革。在農業方面，中共已廢除公社制度；而在蘇聯，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仍是主要的農業組織形態。蘇聯農民必須把三分之二的收成以固定價格售予政府，而大陸農民僅須把百分之十五的產品上繳。

在工業方面，中共已授予廠長更大的決策權，並降低中央計劃的角色，還解除了多種物價的管制。個體戶和私人企業在中國大陸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比蘇聯大。

蘇聯沒有類似中共「經濟特區」或「沿海發展戰略」的措施。中共允許純外資企業成立，蘇聯則限制外國人參與合資企業，外資不得超過企業資本額的百分之四十九。而且蘇聯的這類合資企業仍相當少。

蘇聯與中共的經濟成長率在實施改革後，

最後是怎樣在企業之間建立橫向溝通。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仍然涉及到我國企業和企業之間的關係。到現在為止，我們企業之間的關係是通過它們的主管部門來進行的，每一級政府權力的差別就變成了它所主管的企業的權力的差別，無論在貸款、投資，還是派人出國，進出口企業之間的差別都很大。怎樣使這類差別減少、消失，最後創造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這是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

（本文根據錄音整理，略有刪節，未經本人校閱）

也有極大差異。一九八七年，大陸的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百分之九點四，蘇聯的成長却不足百分之二。

中共在經濟改革方面雖然領先，蘇聯的政治改革却超前。最近在蘇聯境內發生的許多事情，在中國大陸仍是難以想像的，蘇聯政府容許許多城市居民進行示威，抗議當局挑選不孚眾望的候選人參加六月下旬的蘇聯共黨代表特別會議。在亞美尼亞，民衆進行多次大規模示威，極力要求將亞塞拜疆共和國一片領土劃歸亞美尼亞共和國。

蘇聯官方報紙充斥對政府政策的批評，並刊登要求改革的大膽構想。一家報紙刊出建議，主張縮減國家安全委員會秘密警察權限，並取消共產黨員的一切特權。官方報紙不但稱斯大林的政治制度為「極權主義」，還指出國家恐怖暴行的罪魁禍首是列寧。

沙卡洛夫和另外幾位重要的異議分子已分別獲釋出獄或解除軟禁。沙卡洛夫還獲准舉行記者會。政府也容忍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社團成立，讓此社團開會和提出改革建議。戈巴契

夫的若干顧問甚至主張成立一個新的政治組織（實際上等於一種反對黨，只不過他們稱之為「人民陣綫」而已），可提出政治理念和推出候選人競選，與蘇聯共產黨競爭。

當然，蘇聯的政治改革也和中共的一樣，有其限度。儘管戈巴契夫並未提出「四個堅持」，我仍然相信他無意放棄共黨的領導，正如鄧小平堅持共黨的領導一樣。不過，在這些限度內，蘇聯的政治舞台今天遠比中共生動活潑。各種意見都可在報紙上表達，改革派也願意讓共黨面對較大的競爭。

### 躊躇滿志的戈爾巴喬夫



中共與蘇聯的政經改革，發展程度何以不一？若干分析家認為，這是由於文化不同所致，因為蘇聯文化是歐洲文化，人民對自由有較大的期望。此說本人不敢苟同，據我所知，中國人與世界任一民族一樣渴望自由。

另有些人認為，蘇聯厲行改革，是因為在人權問題上，莫斯科受到的國際壓力比中共大。筆者也不能接受這種看法，因為我認為，蘇聯改革並非國際施壓的結果。

第三種說法是，蘇聯種族複雜，種族問題

遠比中國大陸嚴重。大陸人口只有百分之五是少數民族，蘇聯人口却有一半以上不是俄羅斯人，也許正因這個理由，蘇聯必須進行民主改革，以符合非俄羅斯人日益高漲的期望。但是也有一些分析家提出剛好相反的論點，認為政治開放有使蘇聯種族衝突益加惡化之虞。

第四種理論是說，蘇聯與中共改革程度不一，係因雙方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程度有異所致。蘇聯人口主要住在都市，中國大陸人民多半住在鄉村。蘇聯公民絕大多數至少受過若干中等教育。自從斯大林死後，蘇聯公民已有長期、定期參與政治運動和社區志願組織的經驗，這些活動雖無真正的政治競爭，倒也使蘇聯公民獲得相當多的政治知識。簡言之，蘇聯社會的發展程度，比較接近台灣或南韓，而不同於大陸。這種說法較為可取。

但我個人認為最合理的解釋是第五種理論，蘇聯與中共政經改革程度有異乃是由於雙方的經濟起點不同。由於毛派分子的措施在經濟上多告慘敗，結果遠不如斯大林及其繼承者的成就，所以毛澤東死後中共進行的改革就比布里茲涅夫死後蘇聯進行的改革容易成功。

雖然中國大陸在毛澤東統治下，已努力建立了其具規模的工業基礎，不過在改革時期之初，農業生產停滯，工業生產力低弱，人民生活水準也長達二十年沒有提高。中共領導人在政治上可說已獲共識，都相信必須改革，只是對改革的性質眾說紛紜而已。鄧小平只在政治上略微開放一點，就產生了足夠的政治壓力，使黨內領導人同意改革。

同時，由於改革的起點甚低，只要相當簡單的改革措施就使產能和生活水準迅速提高。這種立竿見影的效果有助於鄧小平爭取人民和幹部支持他的改革。

### 鄧小平在四川爭取農民支持他的改革



反觀蘇聯，經濟改革就不是那樣簡單，蘇聯經濟雖然衰退，其規模却高居世界第二，也是全球第二大軍事強國，蘇聯人民，尤其是白領階級和工人，亦享有相當高的生活水準。因此，戈巴契夫要取得幹部共識以進行改革，並不容易。而且蘇聯的經濟也沒有一個部門尚在低度利用階段，可以迅速成長。所以，戈巴契夫一直無法找出能在經濟上立見成效以鞏固改革勢力的辦法。

簡而言之，很多蘇聯人認為，他們老舊的經濟制度運作得相當不錯。蘇聯領袖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乃要比多數人民更激進。鄧小平的改革獲得多數人民支持，戈巴契夫却沒有這個優勢。這就是戈巴契夫無法像鄧小平那樣徹底進行經改之故，這也是戈巴契夫被迫推行較廣泛的政治自由化的理由，這樣，他才能對黨、政府機構內的保守派加強政治壓力，逼使他們同意改革。

當然，中共的經濟改革已進行十年，而蘇聯的改革才僅實施三年。由於改革是個曲折蜿蜒的過程，未來中共可能在經濟改革方面落後，却在政治改革方面超前。誰也無法意料中共的改革最後誰會走得更遠。（作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呂理牲譯）



# 為中國的傳教士

## 徐永澤祈禱

王慕基



傳道人徐永澤

在營救楊巍同學的大會上，北卡參議員赫姆斯指出：「事實上，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可能因履行其基本的宗教信仰權利而被捕。這種事在前幾個月已經在一個基督教徒身上發生。」（見中春八月號）赫姆斯所提到的這位基督教徒叫徐永澤。他於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六日下午四時在北京月壇公園被國安部警察逮捕。

中國目前大概有五種大型的宗教，傳統的儒、釋、道、伊斯蘭教及基督教（基督教又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東正教）。儒、釋、道和回教在中國有着較為悠久的歷史，而基督教則是在明末才開始正式流入中國。較大規模的傳教則是鴉片戰爭以後。到一九四九年，據官方統計，中國大陸共有三百萬天主教徒及七十萬基督教徒。

中共掌握政權後最初一年因為忙於鞏固自身，并未對宗教有多大干涉，但不久，中共就如同控制各民主黨派一樣開始設法控制宗教。因為共產黨人認為世界某日必將統一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所以一切非共產主義信仰者在共產黨眼裡只能視為同路人，隨着時間的變化，同路人則變為敵人或專政對象。衆所周知，共

產黨人為無神論者。可想而知，宗教在當代中國大陸，命運多舛則似屬必然。

中共早在一九五一年元月就成立了宗教事務處，一九五四年此事務處改名為宗教事務局，其功能就是控制宗教。按照馬克思的宗教觀，宗教是種落後的世界觀，又為反動的統治者和剝削階級所利用，成為精神鴉片。中共認為宗教就像資本主義一樣，遲早會退出歷史舞台。如果政策制定的妥當，宗教則會消亡得更快，「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最終會佔領宗教陣地。」

為了促使這一目標的實現（實現共產主義中的一環），宗教事務局授意，策劃各宗教內部親中共人士成立組織，以便中共控制。如佛教協會、道教協會，等等，相繼成立，基督教圈內則成立有天主教愛國運動委員會、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這兩個愛國運動委員會動員所有的基督教徒悉數加入。這場運動雖名義上是基督教徒自發興起，自由參加，但實質上就如同當年人民公社成立，農民如不「自願」入社，則禍事不遠也。當時有不少基督教徒和教堂認為三自委員會偏離宗教精神，信仰不純正，因而拒絕加入。不久，這些人便紛紛銜入獄。著名的人物有：倪析聲、敬奠瀛、王明道等牧師，龔品梅、鄧以明等大批神父。不加入三自愛國委員會的教堂一律關閉。因此教會數量直線下降。文革期間，幾乎所有佛寺、道觀、教堂一律封閉，殉教者無數。宗教事務局也認為完成了歷史使命，萬事大吉。

表面上看，宗教在中國已入地獄，再無蹤迹。但事實上，許多虔誠的宗教人士絕沒放棄信仰，他們因迫害而散遷到全國各個鄉村角落，他們也因此將信仰隨之遠播。有人譬喻說，宗教就像火，你想撲滅它時，它四散的火星便

四處飛揚，結果是場更大的火。以基督教為例，許多信徒在為傳播信仰積極奔走，即使在最危難時，也在為神作見證。建教堂肯定招人現眼，如是他們就以家庭為崇拜點，有時十來人，有時多達百人，他們將這樣的教會稱為家庭教會。家庭教會的特點是易聚易散，無固定教堂，本週在王家，下週或許可去李家，視具體情況而定。這樣的教會，公安局也為之頭痛不已。家庭教會以獨特的方式在大陸興起，某些地區竟是整村整村的人認罪皈依基督，信徒深受鼓舞，高呼阿利路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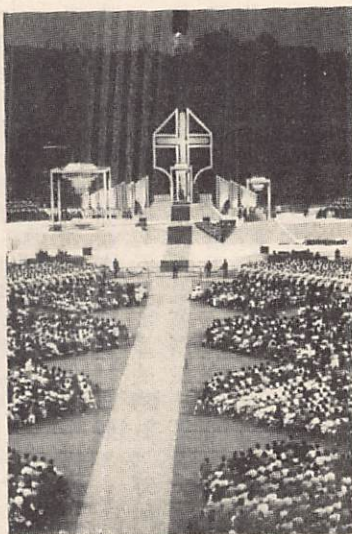
一九七九年，神州大地開始解凍。中共猛然發現宗教的生命力依然健在。於是休耕多年的宗教事務局又開張營業。寺廟、教會再次允許開放，當然，宗教政策也一如既往，所有神職人員一律得參加政府認可的組織，如基督教會和牧師必須加入三自愛國協會，否則被視為非法。

許多虔誠的基督徒，特別是家庭教會，不願依附三自愛國協會，認為此協會是政治掛帥，不以神為最後歸宿。他們仍堅持政教分離、獨立傳教。徐永澤和他領導的家庭教會就是較為鮮明的例子。

徐永澤今年四十八歲。廿年前開始傳道，那時正值文革動亂高峰，毛被塑造成神、救星。那時傳道無異於現行反革命。他以河南南部家鄉為起點，宣揚神的萬能與博愛，漸漸地他建立了一系列家庭教會（多在鄉村），並且不斷有人自願奉獻、加入徐永澤一塊傳道。他所領導的福音小組在過去幾年間共建立了三千所家庭教會，為中國家庭教會的一重要領袖。他的足跡走遍了河南許許多多的城鄉，一九八二年他率福音小組遠涉四川，又輾轉山西、陝西一帶，這中間曾有過數次大的迫害，但他們硬

是靠信心，百折不撓，為信仰獻上活祭。因為有大批像徐永澤一樣的虔誠信徒，基督徒人數每年都在增長，據最保守估計，在中國大陸，基督徒已逾兩千萬（四九年僅七十萬），一般接受的數字為五千萬。但三自愛國協會只承認有四百萬。

宗教真是麻醉人民精神的鴉片嗎？



今年四月，中國宗教事務局和三自愛國協會邀請美國最著名的基督教佈道家葛培理（BILLY GAHAM）訪華。徐永澤聞訊時希望能拜見葛培理，并希望與之能討論中國家庭教會問題。因為家庭教會一直被視為非法，外界存有一些誤解。徐認為自己有責任向葛培理言明真相，取得共識。四月十五日，徐和幾位同工到達北京，住在中央電視台一位親戚家中。徐永澤以前因獨立傳教而遭公安局逮捕，送往勞教營。後來他借機逃跑，一直過着無身份的生活，也一直為公安局和國安部黑名單上的人物。這次徐永澤一進京便被國安部人員盯上。四月十五日國安部就派了批警察，四輛小車，準備逮徐。因徐住在中央電視台大院內，警察唯恐

驚動大多數群眾，便推遲下手，而只在大門外以逸待勞。

四月十六日，徐永澤和兩位親戚去遊月壇公園動物園，兩位親戚想看蛇，徐則言想稍息片刻，便在爬蟲館外等他倆。此時，早已等待多時的便衣警察立即上前，帶走了徐永澤。

徐永澤的被捕在中共基督徒中引起極大反響。現在許多人都日夜為他禱告，求神憐憫，能盡早釋放他。同時許多人，包括非基督徒都指出，在實行開放政策的今天，秘密逮捕基督教傳道人無疑有損於國家形象，及拖民主、法治的後腿，對統戰也不益。宗教人士追求的，是神國事業，不光對在世的任何政權無威脅，反而極願協助政府。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界人士一樣都在為國家作出巨大的貢獻。不經任何法律程序逮捕宗教人士將嚴重打擊他們的積極報國的意願。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對宗教徒的種種限制、人身安全的威脅都是踐踏憲法、人權的不義之舉。今天大陸道德風氣日益淪落，妓女竟已公然在街頭拉客。一個政府如不能壟斷經濟，也就更不可能壟斷人們頭腦裡的思想。神既不可能證明有，也不可能證明無，全憑信心而已。但從功利角度講，宗教都是勸人為善，以愛待人。在一個信仰危機的國家，宗教更應得到重視。對宗教界人士而言，則有進一步認識國家政策的必要。憲法中四個堅持是和信仰自由根本矛盾的。目前對宗教一定程度的寬容全是因統戰需要。從理論上來講，共產主義是絕不容許信仰自由的，換句話說，每一個非共產主義者今天所作的努力，如不以求國家放棄四個堅持為出發點，那無異是在給自己掘墳墓。

中共應當無條件釋放楊巍，也應當無條件釋放徐永澤。



# 魏京生在青海

— 鳴



法庭上的魏京生

去年十一月在報上看到美聯社自倫敦發佈的消息，稱「國際特赦組織」根據來自中國大陸的報導，魏京生已在服刑期間死亡。當時心中思緒萬千，悲嘆這位民主、自由的鬥士英年驟逝。

後來中國司法部勞改局否認了上述報導，同時拒絕提供任何有關魏京生的消息，但也拒絕任何人以任何名義包括魏京生家屬和「國際特赦組織」探訪魏京生。

從那之後，再也沒有聽到任何關於魏京生的消息。於是我決定利用今年暑假回國探親的機會，向從前活躍在民主牆下的老朋友們打聽魏京生確切的生死情況。

回到北京打聽到的結果是，魏京生仍然還活着，現在仍在青海某勞改農場服刑。但健康情況極壞，據說牙齒幾乎都掉光了。

關於為什麼會傳出魏京生死亡的消息，是因為自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這段時間內，魏京生的家屬未曾收到魏京生任何信件和消息，這是完全違反慣例的，所以才傳出了魏京生死亡的消息。魏京生的妹妹為這件事多方奔走，事後才恢復了正常的通信聯繫。至於那段時間魏京生和家屬被停止正常通信的原因，仍是一個問號，猜測可能是魏京生又犯了什麼「錯」受到獄方的無理處分。

通過這些老朋友，把海外人士對魏京生死的憂慮和關心輾轉告訴了魏京生的家屬，他們由衷地表示感激，但同時表示不能接受任何外界物質上的援助，以免給魏京生帶來無謂的麻煩。

我深深地瞭解魏京生家屬的難處和苦衷。因此希望借貴刊一角，向關心魏京生的熱心人懇切呼籲，希望大家通過各種方式，給予魏京生和他的家屬道義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援助。讓他們知道有許許多多的人在關心他們，讓他們知道魏京生對民主和自由所做的一切努力和犧牲都永遠會銘刻在每一個高尚和正直的人的心上，讓他們在絕望中還有一絲希望。

## 我的橫笛

我吹過的橫笛，  
我絕不會拋棄；  
哪怕黑暗追蹤我的足迹，  
甚至監禁我的嘆息。

我不會沉寂——  
縱使荆棘滿地，  
縱使明天的太陽，  
不再為我冉冉升起。

## 野鳴

無論背時的命運，  
把我押送到哪裡，  
我只吹叛逆的歌，  
——用我的橫笛。

## 大赦國際關注朱建斌

· 一鳴 ·

「國際特赦組織」美國第九十七小組來信詢問民運人士朱建斌的情況，希望知道朱建斌近況的人士告知本刊或美國第九十七小組。  
朱建斌，男，一九五五年生，武漢鋼鐵廠工人。八一年四月可能在武漢被捕。

「北京之春」期間，他和另一鋼鐵廠工人秦永敏共同創辦「四五學社」出版民刊「鐘聲」。

八〇年八月朱建斌和一些民運人士共同簽名發起一份要求釋放「四五論壇」編輯劉青的公開信。八月卅日，朱和其他三人在廣州商議成立全國民刊協會時被捕，但不久即被釋放。八一年四月再度被捕。從此沒有音訊。也未聞被判刑。

美國第九十七小組地址：

AIUSA 97  
BOWLING GREEN STATION  
BOX 1936 NY 10274



# 關於我太太出國的前前後後

楊先智

我太太一九五三年五月出生於成都市，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結婚，一九八七年八月開始申請出國探親。當她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去申請出國護照時，遭到了管理處的拒絕，理由很簡單：根據教育部文件，公派出國短期考察、培訓人員的家屬，一概不許探親。在她多次解釋我們的情況以及楊先智本人已在西德取得長期居留後，管理處才答應考慮、研究一下，一個月之後，管理處才作出決定：接受她的出國探親申請，並填寫了中國公民出國申請表。

幾經周折、調查研究，文件旅行半年之後，一九八八年三月，她才得到出國護照。管理處劉××態度友好地向她表示祝賀，並問她：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你的護照拖了這麼久才發下來的，她回答：不知道。劉××又問她：你知不知道楊先智在西德幹什麼？她回答：只知道楊先智在西德慕尼黑的一家化學公司工作。劉××話題一轉說：你去翻一下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報紙，上面登了一起上海的審判案，上面雖然沒有楊先智的名字，但據我們所知，楊先智是參與了這件事的，但他不是特務之類的人，我們可以肯定。不過，他也做了一些違背四項原則的事，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本着人道主義讓你們夫妻團聚。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八日，她得到了西德政府駐華使館的入境許可簽證。管理處的負責人再次找她談話，態度很嚴肅：你現在已得到了入境簽證。我們有一件事現在才想告訴你，之

所以現在才想告訴你，是我們擔心在你未得到入境簽證以前，你知道以後，不想去見你的丈夫了，他停了一陣又說：你的丈夫楊先智是中國民聯的成員，中國民聯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組織，他在民聯「三大」上還擔任了一個小職務。即使這樣，我們還是讓你們夫妻團聚，希望你們夫妻見面之後，和陸相處，能勸則勸，不能勸則罷。思想轉變要有一個過程，過去的事情我們既往不究，只要他不搞煽動，不要像楊巍那樣，任何時候我們都歡迎你們回來看。祖國的變化很大，成都的變化也很大。只要我不調離公安局，你們回來時，我一定為你們接風。

這就是她來西德的前前後後，目前，我們一家三口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小孩今年八月小學，她準備去學德文，我們夫妻團聚理所當然，出國本是每一個公民的當然權利，所以我并不想感恩戴德，也並沒有對中共形象有任何改觀！

各位盟友，你看了以後有何感想，有何疑問，請來信聯絡。通信地址：

YANG XIAN ZHI  
PARISER STR.  
5300 BONN  
WEST GERMANY

電話：0228—679902

## 中國民聯

### 西德聯絡站致

### 成都市公安局

### 外事科的一封信

尊敬的成都市公安局外事科各位先生：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監察委員楊先智先生的夫人××女士於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平安到達西德法蘭克福，同她分離了五年多的丈夫重逢，並受到中國民聯幾位接機代表的歡迎。此情此景，除了令我們無限感慨之外，還不禁使我們想到多方協助××女士辦理出國手續的貴科幹部及你們所表示的善意。在此，我們向你們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謝。

這件事使我們感到人道主義在中國大陸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重視。我們相信：對於中國未來走向的分歧，不能成爲割斷中國同胞之間感情紐帶的利刃。

我們這些暫時僑居他鄉的中國人，時刻懷念着祖國的山山水水，也保持着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們將一如既往，爲促進各黨派之間的平等對話與共存，開辟中國政治經濟改革新局面盡一份綿力。此致  
敬禮！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西德聯絡站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四日

## 編者的話

上面發表的，是中國民聯西德聯絡站關於楊先智夫人被批准出國給成都市公安局外事科的信，以及楊先智寫的「關於我愛人出國的前前後後」一文。從中，讀者可以瞭解到，楊先智夫人從一九八七年八月開始申請出國，經過半年多的幾經周折，直到一九八八年三月才領到出國護照。在當代世界各國日益開放的背景之下，民主、自由、人權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中共在面對這一世界潮流下，終於批准了分離達五年之久的楊先智夫人出國，使他們夫妻團聚，這說明人道主義在中國大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

## 楊先智生日快樂



我們分別是楊蕪在復旦大學生物系和中山大學英語中心的同期同學。今年十月三日是他的三十三歲生日。我們準備按西方的習俗寄張生日卡片給他，借此機會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慰問。我們并希望楊蕪在海外的朋友、同學和其他關心他的人們都來這樣做。生日卡可托楊蕪父母在探監時代為轉交。地址如下：

畢淑筠 (楊蕪之母)  
中國 上海 廣中路  
廣中五村 四〇四/十三號

林東  
郝易敏

一九八五年，中國大陸人大法制委員會通過了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明確規定不準出境的是以下五種人：①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國家的公、檢、法機關認定的嫌疑犯者；②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結民事案件不能離境者；③被判處刑罰正在服刑者；④正在勞動教養者；⑤國務院有關主管機關認為出境後，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或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者。自出入境管理法執行以來，凡不屬於以上五類的人員申請出國，幾乎一概可以放行。即使有政治歧見人員的家屬，申請出國，大多先後陸續獲得批准；但也有一些政治歧見人員的家屬，雖經幾次申請出國，仍未獲

批准，不知有關主管機關掌握的標準和尺度是什麼？如果主管機關僅憑主觀意志用「出境後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為借口，卡住一些老實人，不讓出國，那中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只停留在人治的局面，而阻礙開創法治的新格局。

僑居異國他鄉的中國人，懷念着祖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思念着祖國的親人，熱切盼望祖國早日走向民主、自由、富強。而目前在中國，人民只能享受上面「恩賜」的一點有限的自由，人權還受到侵犯。要改變這種局面，爭取人民真正的自由和人權，中國人民要繼續不懈地努力，監督和制止任何侵犯自由和人權的行為在中國大陸發生。

## 小對話

韓星

甲：喂，想吃免費的肯塔基炸雞吧，我有一個好主意。

乙：算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甲：怎麼沒有？請問你們學校有沒有公開參加「中國民聯」的人？

乙：有呀。可這和吃免費炸雞對得上號嗎？

甲：當然有關。下回你們學校的大陸學生聯誼會改選，只要你們將他選做主席，保險大使館會有人前來表示「關懷」，「犒勞」一餐肯塔基炸雞還不能少嗎？

## 環球汽車修理行

地址：112-21 Roosevelt Ave.  
Corona, NY 11368

電話：(718)429-1400  
(718)429-1442

華人經營

精修各種引擎、線路、  
板金、噴漆、換油、保  
養、舊車買賣、歡迎比  
價。

小閻主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 行逆風船

房志表

## 闖價格關

物價，已成為今天中國人最熱門的話題。中國共產黨正站在價格改革的鬼門關口，面臨着四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鄧小平說：要壓頭破血流，要壓亡黨亡國。由此可見形勢之嚴峻。

鄧小平的話並非聳人聽聞，觀前車之鑒，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幾乎無不在價格的鬼門關口翻了船。不過，東歐的共產黨人還不致於亡黨亡國，他們背後還有一個實力雄厚的蘇聯可以扶他們一把，可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救得了中共。

中國的價格改革表面上是經濟問題，但實質上是政治問題。形勢之嚴峻並不表現在那喧囂的漲價風潮上，而表現在其背後更深沉的危機。價格的調整可以使經濟走向良性循環，也可以使它走向惡性循環。就中國今天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而言，幾乎所有跡像都預示着後者而不是前者。

### 經濟後果：持續、大幅度的通貨膨脹

按經濟學的常識，價格調整可以達到三種功能：一是傳達供求信息；二是促進資源合理配置；三是刺激生產。我們假設中國的物價改革可以不折不扣地履行上述三種功能，其後果也並不樂觀。

價格的調整最終將體現為經濟結構的調整。因為按價值規律，短缺產品和部門的價格及收費會上升，而過剩產品和部門的價格及收費會下降（傳達信息），於是造成資金勞力從後者流入前者（資源配置），引起短絀產品的增加和其部門的膨脹（刺激生產），隨着供應的增加，這類產品的價格和部門的收費又會下降。以上是典型的良性循環圖。也是中國目前支持「價格關」的人士的根據所在。

可是就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而言，其短絀部門是基礎工業，如交通、通訊、能源、電力、原材料工業和糧食。以上部門均有兩個共同的特點：

第一，它們的價格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價格水平舉足輕重。只要它們漲價，幾乎所有工業產品的成本都要上漲，這就很難免造成一系列漲價的連鎖反應，形成全國性的通貨膨脹。

第二，這些部門投資巨，回收期長。即使資金和勞力在價格上漲的刺激下可以向這些部門轉移，其部門生產能力的增長也要等五年十年之後方能見效，其生產效益再傳到消費品工業又要一段時間。於是，一方面大量勞力、資金流入基礎部門，一方面市場上的產品在很長一段時期並不增加，這必然造成長期的通貨膨脹。



交通運輸是中國經濟的短絀

現在極需巨額投資

以上兩個特點，一個決定了通貨膨脹的普遍性和猛烈性，另一個決定了通貨膨脹的長期性和頑固性。持久而大幅度的通貨膨脹無疑是對一個國家政治結構的嚴峻考驗。所以我們說價格改革與其說是經濟問題，還不如說是個政治問題。

以上分析僅僅是理想的推論，現實中的問題將更為棘手。首先，在中國生產要素的市場尚未形成，勞動力和資金還遠遠談不上能跨部門橫向自由流動。因此，即使價格已強烈顯示出短絀之所在，但由於生產要素不能向其流動，增產仍是紙上談兵，望梅止渴。除非中央政府恢復以財政手段調撥資源的方法，否則通貨膨脹的周期還要延長。

如果說短絀部門的外延擴大再生產受到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的制約，那麼其內涵擴大再生產將受到勞動者總工的制約。通貨膨脹無疑將腐蝕勞動者的積極性。實際上，全國性的總工已不再是理論上的推論，而早就成為現實（見本期刊登的國務院體改所微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少傑的講演錄音），這將意味着通貨膨脹無限地延期和加劇。

一九八八年初露鋒芒的通脹僅僅是價格關的序幕，洪峰還在後頭。在基礎部門的價格上漲沒遇到其增產的反饋之前，通脹將不可遏止。它要持續多久，誰也沒有底，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當前中共政權結構的強度，能經得起這樣長時間的考驗嗎？



菜場公價牌，  
一天工資買不到一公斤腿肉

### 政治現狀：貪污腐敗無以復加

以上考慮的僅僅是純經濟因素。若考慮政治因素，危機就更加深一層。  
純經濟的通貨膨脹並不可怕，六十年代初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的通貨膨脹率更在今天之上，而共產黨仍能安然渡過無恙。當時它所憑借的有兩點，一是黨政官員相對清廉，二是人民對政府充滿信心。

今天的情況迥然不同，黨政官員的貪污腐化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人們會形容四十年代末的國民黨為「十官九貪」，可是今天的共產黨要更勝一籌，可謂「無官不貪」。通貨膨脹給予受薪者帶來的損失是一視同仁的，一般勞動者憑一技之長找第二職業來彌補實際生活水平的下降。對於黨政官員來說，其「一技之長」是運用權力，所以其防止實際收入下降的

出路無非有二：一是取之於民衆；二是取之於國庫。前者是貪污受賄，後者為特權官商。

貪污、受賄、特權、官商這幾個渠道從宏觀經濟的角度所履行的功能是一樣的，均不同程度地將積累資金轉移至消費領域，這一方面從實質上加劇了通貨膨脹，另一方面為民衆的不滿情緒提供了突破口。

腐化現象與價格改革並無直接聯繫，可是如果它與「闖價格關」的行動並存的話，將大大加強政治上的脆弱性。

### 社會心理：信心危機，風潮四起

所有的社會危機最終體現為人們信心的崩潰。現代社會的全部經濟和政治結構都建立在人們的信心上，有了信心，置於死地，仍可後生；沒有信心，風聲鶴唳，一瀉千里。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全中國鄉村餓死兩千萬人，城市遣散兩千萬人回鄉，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奇蹟。當時中國沒有發生動亂，主要是因為人民對共產黨政權尚有信心。只要人們相信忍耐一下困難就會過去，那麼困難就真的會過去。

可是今天時過境遷了。人們對共產黨的政策早就喪失了信心，對中共政權，對人民幣也都失去了信心。信心的崩潰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迹像：

第一是普遍的短期行為心理。全社會各階層的人都表現得出奇地「實惠」和「近視」，黨政官員的準則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置樹立威信的必要投資而不顧。廠長經理則濫發獎金，硬拼設備，吃光分光，無長期規劃，不惜留給後任一個爛攤子。農民則對土地和水利設施進行掠奪性經營，以防政策反覆。鄉鎮

游資也絕大部分流入消費領域和商業，很少流入長期投資項目。在商業中，巧取豪奪，投機倒把，招搖撞騙，背信棄義，一錘子買賣層出不窮，總之能撈多少算多少，能撈一把算一把。

第二是搶購風，擠兌風。隨着通貨膨脹越演越烈，人民幣威信掃地，社會上謠傳四起，百姓們惶惶不可終日，已成爲驚弓之鳥，一方面紛紛搶購囤積日用品，防止漲價損失，另一方面搶購高檔工業品和金銀手飾，以保貨幣原值。廣州曾出現過搶購大米和金器的現象，上



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安民告示

並不能阻武漢市民搶購食鹽

海市民搶購肥皂、火柴，武漢市居民曾搶購食糧。一些城市甚至發生銀行擠兌提款的風潮。一些專業戶、承包者還紛紛搶先和國家和集體簽訂合同，以便佔貨幣貶值，少繳利潤的便宜。

第三是出國熱潮。全國的青年現在已把出國當成他們的首要理想，在北京一個機構搞的問卷調查中，「出國留學」在青年職業選擇中高居榜首，手段已成了目的。很多大學教師，研究人員，處局級幹部都寧願放棄國內的一切，爭取出國。很多國家第一流的學者、技術人員寧願留在國外洗盤子當餐館跑堂而不願回國從事專業。一些從前常給子女們上愛國教育課的家長現在轉而吩咐他們「能出去盡量出去，出去後能留下盡量留下」。所有的人都削尖腦袋擠出這個毫無希望的國家。人們稱這種出國風潮為：勝利大逃亡。這說明，人們不但對共產黨的統治喪失了信心，甚至對整個民族的前途喪失了信心。

在同樣的社會條件下，經濟的良性循環和惡性循環之間只有一步之遙，關鍵就在於人們有無信心。所有的改革措施，政策調整措施信則靈不信則廢。當人們連制訂這些措施的政權都不相信的時候，企圖通過這些措施來扭轉局面無疑等於抓着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

### 一個產生「替罪羊」的時代

以上經濟結構，政治現實再加如此民衆心理狀態，價格關的險境是不難想像的。對於那些面對如此兇險的環境仍堅持「關關」的中共改革派領導人及學者們，我個人報以衷心的敬意。打破僵局需要非凡的勇氣，在這條船上的人恐怕別無選擇，亡國還不至於，可是亡黨

則很有可能。拖下去爛掉還不如壯烈地失敗。如果在同一條船上，或許我會作同樣選擇。

古語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歷史可造就成功的英雄，也常造就失敗的英雄。一個正在衰落的王朝，並不是由幾個賢臣明主就可以挽救的。

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七八年的形勢大不一樣。毛澤東留下的攤子是個百廢待興的局面，農業窒息，輕工業萎縮，農民苦不堪言，城鎮居民的消費被壓縮到最低的極限。總之，情況壞得不能再壞，社會已滑到了「鍋底」，轉機已經來臨。任何一舉一動都可以得民心，甚至共產黨躺下休息，放手不管，社會也會憑着反彈力走向復蘇。農村改革最初的成功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其實當時共產黨的政策並非改革，而僅僅是「休養生息」，把農民脖子上的繩子鬆了一下，誰知農民身上迸發出來的潛力就震驚了全世界，把鄧小平送上了時代週刊的封面。輕工業的調整帶有向人民還債的性質，它當然也是得民心的，這會帶來市場繁榮，人民消費水平提高的「大好形勢」。總之，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四年是改革的黃金時代，這是動大手術的絕好時機。

可是中共在這段時期內幹的所有的事都是摘菓子吃肉的事。到了一九八五年，所有的菓子摘完，肉吃完，得民心的事幹完，下一步輪到種樹，啃骨頭，幹得罪人的事了。

農業潛能釋放完畢，糧食產量到頂，水利設施殘缺不全，農業需要大量新的投資才能繼續增產，改革需要新的刺激才能突破。同樣，輕工業的膨脹被基礎工業拖住後腿，整個經濟結構需要調整，急待大量投資。

大量需要長期基建投資，這本身就為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而此時價格關無礙等於為

這一潛能的釋放創造了一個缺口。而且，此時投資，錢從何來？第一要掏人民群眾的錢口袋，第二要挖各級政府的小金庫，明知得罪人，這事也非幹不可。也就是說，整個價格改革將伴隨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關關選在此刻，從政治上來說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所以鄧小平要「準備頭破血流」，口氣極其悲壯。



對鄧小平來說，關價格關是一付只能贏不能輸的牌

如果說毛澤東死後初期的社會形勢像一個壓到底的彈簧，其潛能大可利用的話，那麼鄧小平死前的時期則像一個彈到頂的彈簧，潛力已釋放完畢，若想令其重新具備勢能，必須有人壓彈簧，幹吃力不討好的事。前者像一架滑到「鍋底」而正在反彈上升的車，這是個真假改革者倍出的時代，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而今天的形勢則像一輛正在下滑而又沒滑到底的車，這是個考驗真正改革者的時代，也是個出「替罪羊」的時代。一個無奈而又悲壯的時代。

### 幾種關關結局的推測

我們不妨推測一下，在上述經濟、政治、社會背景下，價格關關將會出現哪些可能的局面：

可能性(一)中共改革派仍穩固地在中央佔優勢，他們一方面在經濟上繼續改革放鬆，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收緊，實行高壓。這樣可以在最初階段維持一個表面上的安定局面。但隨着政治上的黑暗和經濟上的惡化並存，使改革派失盡人心，集全國各界民怨為一身。暫時安定的局面會維持到鄧小平死亡，然後便是所有的矛盾總爆發，以後的局面將很難預料。

可能性(二)如果鄧小平活得足夠長，如果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共改革派能夠渡過通貨膨脹的高峰並完成市場轉軌，隨着形勢的好轉，中共為了平息掩護經濟改革時實行政治高壓所激起的民憤，可能會作出一些政治上的開明姿態。隨着市場經濟的形成，中共對人民的控制力大降低，社會有可能在不斷的小動盪中向民主制度前進。不過這種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它需要鄧小平至少活十五年。

可能性(三)經濟形勢急驟惡化，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社會出現動亂，保守派趁機反撲，改革派拋出替罪羊以謝天下，經濟改革至此完全失敗。不過保守派上台並不可能控制住局面。一方面市場化不可逆轉，退回計劃經濟去，另一方面抑制通貨膨脹的必由之路是壓縮人民消費，所以民憤不但無法平息，反而會越演越烈。如果黨內鬪爭公開化，改革派有可能會再次和社會民主力量結成一戰綫，社會變革的焦點將完全移至政治領域，並可能比較激烈的形式進行。

可能性(四)以上情況若造成黨政機構癱瘓，有可能導致軍隊涉政，接管政權。但中國與波蘭不同，中國是個大國，歷史上的軍事政變幾

乎沒有在中央政府一次成功的先例，非經割據階段不可。今天同樣，在沒有絕對權威可以號令全國軍隊的情況下，軍管只可能在局部地區實現。這有可能導致內戰，或者和平割據，最後是中央集權垮掉或剩下空架子，各省基本自治。

可能性(五)中共「改革開關派」無法在中央佔優勢，不得不向保守派妥協。於是價格改革關雷聲大，雨點小，或用行政辦法來壓住物價。但無論什麼辦法，若想扭轉中國經濟這個頭重腳輕的結構失調症，必經之路是砍消費，增積累。砍消費首當其衝的受害者當然不會是那些爆發戶和官商，而是普通老百姓。這個得罪人的黑鍋不是由改革派來背(通過通貨膨脹)，就是保守派來背(通過行政手段)，若兩者妥協，則由兩者一起背。總之，誰在台上都要辦這件事，背這個黑鍋。如果妥協局面出現，中國將不死不活地拖到鄧小平去世，然後由鄧公親自背黑鍋，當替罪羊。

以上推論尚未考慮海外因素，例如世界經濟危機，台灣和海外民主力量的介入，美蘇日等國家的政策影響，這些因素都會對中國大陸的局勢演變起催化作用。

在中國的局勢演變中，鄧小平的壽命是個關鍵的因素。改革派深知，他們需要一個活着的鄧公來掩護開關，鄧本人也意識到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改革若不能在這段時間解決最棘手問題，成功的希望就很渺茫了。鄧小平、趙紫陽之所以急於在這種兇險的環境中關物價關，正是基於這種考慮。這是孤注一擲的挺而走險。正如蔣經國的死意味着台灣強人政治的結束一樣，鄧小平的死也將預示着大陸強人政治的結終。在中國大陸這種毫無章法，民心崩潰的情況下，強人身後的局面，神仙難料。

##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訂費 (每年)
地址： _____	寄達地區
_____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_____	機關：60美元 200港元
_____	普通訂戶：24美元 96港元
_____	學生訂戶：20美元 84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第 _____ 期) 開始	
北美地區：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贊助200美元或港澳地區500港元以上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3-7710410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1號萬隆大廈1206室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費：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BOOK STORE	航空：10美元 平郵：5美元

# 物價騰飛·書生窘迫

毛滢



到美國才一個多月，所認識的大陸同學也不過二十幾人，然而，至少已有十六、七人問過我「國內物價如何？」。尤其是一些持J—L VISA的同學，往往見面後談了不到一兩句話，就問道：「漲價漲得怎樣了？」看來，我這個在國內時常為物價飛漲所窘迫的書生，到了美國，似乎也難以馬上擺脫其魔影的籠罩。現借「中春」園地，向諸位同學作個大概的介紹。不過，筆者有言在先，我在國內一向過着宿舍——食堂——教室（或資料室）三點一綫的簡單生活，很少問津不是我們書生享用的物品。況且，國內的物價也根本不是幾年中調了幾次價，而是月月都有東西在漲價，下面所談的只是我知道的一些商品在兩三年中的價格變動，盼望能得到其他初來美國同學的補正。面對大陸的物價上漲，我有一種不祥的預兆，這種小孩臉似的物價，就是我們這些暫時享受着美國物質文明的留學生在明日回國後肯定逃脫不了的命運和未來書生們的現實。

自大陸實行改革以來，上海一向被視為各大城市中物價較為平穩的地區，然而，在這二、三年中，也捱不住種種「刺激」，吃、穿、用，還有讀書人離不開的書，其價格都呈現出陡形上漲的趨勢。

## 一、吃。

肉，肥瘦相夾的每斤定價在二點八元至三點五元之間，純粹的瘦肉都要四元以上。

雞，國營菜場出售的大多是冰雞，視大小而定價，每斤價格在二點八元至三點五元之間，一般加冰連五臟腸子的雞總要在三四斤以上。自由市場上的活雞更貴，尤其在冬天。

魚，上海人一向喜愛的黃魚帶魚，因海水污染和漁民濫捕，早已成罕見之物，即或偶爾出現在菜場，其價格足以令人瞠目，每斤三元

或更高，這是十年前的十倍價格。鱸絲現賣到四點五元至六元一斤，是三年前的一倍。青魚、扁魚、黑魚等淡水魚都要一斤三點五元以上，逢年過節甚或高達六、七元一斤。

蔬菜，現在已根本見不到三年前的什麼幾分錢一斤的蔬菜。青菜、黃芽菜（北方稱大白菜）都要賣到一斤二毛以上，上市量少的時候會高達三、四毛一斤。花茶價格至少四毛，有時候會高達七、八毛一斤。蠶豆在三四年前只有幾分錢一斤，高的時候也不過一毛出頭。筆者在出國前夕的一個星期去菜場買蠶豆，兩斤要六毛八分，家裡人還告訴我「今天不算貴」。

水果，蘋果、梨、橘子等，都在每斤一元以上。有時候，水果攤上偶爾會出現低於每斤一元的水果，但這都是爛了一部分的「便宜貨」。春節時，上海人喜歡提一塑料袋水果走親訪友。這樣的一袋水果，三、四年前是二元或二點五元一袋，今年春節，最低的價格是四點五元，一般都在五元以上。

以上是商店和菜場的一般價格。大學食堂裡的價格也一直在上漲中。一盤蔬菜（青菜、黃芽菜之類），筆者在七八年剛入學時，只有幾分錢，現在都要一毛幾分錢。大學食堂最多的是「大排」或「小排」，筆者讀大學時只有一毛五或二毛錢，現在至少六毛，有的學校要賣到八毛錢。魚更貴，一塊（或小一點的一條）鯧魚，要一點二元或一點五元。至於一般飯店，筆者是不敢問津的。不過，筆者也略知一些行情，如結婚宴席，在八三、八四年時，五、六十元一桌也有，一百元的已是屬於很有氣派一款了。這幾年的價格也一直在漲，你走在馬路上隨處可見，鮮有一百五十元的，即使有，也是一些看上去就不太衛生的飯店，像杏花



樓、新雅、楊州飯店等較好的飯店，二百五十、三百元一桌的算正常價格。

總而言之，「中國大陸的食物算便宜的」已成爲歷史。我在美國僅生活了二個多月，已經發現，即使把美金折合成人民幣來計算，大陸的食物已經接近美國的物價。然而，大陸的工資又是美國的幾十分之一呢？

## 二、穿。

所有的棉毛織品，與三年前相比，大約都上漲了至少百分之五十。筆者三月準備行裝時購買過加厚的棉毛褲，每條要六元八角五分，同樣的棉毛褲，我在八五年冬天買的時候只要四元一角五分。

毛料在三年內已漲了幾次。一公尺全毛料，三、四年前一般性的售價二十幾元，好一些的三十幾元，現在分別要四十元左右和五十元左右。成衣的西服騰飛得更快。筆者在八五年買過一套全毛西服，價格是一百零六元，今年春天爲留美準備行裝，去購買時發現，幾乎是同樣的款式和顏色，衣料質地也差不多，已經上升到一百九十元。這種西服還算便宜的。在培羅蒙一類的名店，三、四百元一套也不稀罕。全毛的中長大衣，筆者在八三年買過一件，價格九十五元，今年春天，這類大衣已至少售價一百六十元，質地好一些的都在二百元以上。

滑雪衫（即羽絨衫），八二年筆者剛大學畢業時買過一件，那時五、六十元可買到質地相當不錯的，然而在去年冬天，在上海市場上你不花至少一百元左右，休想買到一件像樣的滑雪衫，其價格幾乎翻了一倍。當然，現在款式要漂亮一些。

皮鞋。四年前，三十五元不到就可以買一雙很不錯的牛皮皮鞋。現在，不花四十元以上

的錢，肯定買不到有點光澤的牛皮皮鞋。三、四年以前的高檔皮鞋最多四十幾元，現在得超過六十元。

羊毛衫。筆者在今年春買了四件羊毛衫，價格從三十九元到六十四元不等。家裡人告訴我，八三、八四年羊毛織品未漲價前，這些售價在二十五元至三十五元之間，所不同的是，現在的顏色染得較漂亮。

## 三、用。

今年四月，筆者在登機前夕就風聞包括火柴、肥皂、衛生紙在內的一百多種日用小商品要漲價。我雖未親眼見到，但在那時已感受到前兆。記得在一個星期天，我要去買包火柴，走了十幾家煙雜店，都說缺貨。那時我真有些着急，最後找到了一家個體戶煙雜店，拿出二毛錢對店主說：「家裡的煤氣點不着了，二毛錢買你一包，如何？」她猶豫了再三，拿出了兩包火柴，說：「我賣你一毛一包，這不算貴，國營商店過些日子也要賣七分錢一包。」究竟有哪一百多種老百姓日常生活離不了的日用小商品漲了價，我不清楚。但是，最近收到的國內親友來信都提到了這次漲價，上海的大街小巷，關於漲價的議論、罵娘、牢騷已成了最主要的話題。

大陸的電器用具一向比海外貴。隨着人民幣的不斷貶值，現在大部分是國外進口的生產綫和元件組裝的彩電、冰箱等，也都在原已很高的價格基礎上再上升。前不久，筆者收到一位即將準備結婚的老同學來信，他抱怨說，他有限的收入存的款子，根本跟不上彩電、冰箱價格上升的速度。按理說，在一個不斷取得「現代化成績」的社會中，這類標誌着現代化的商品應該不斷降低價格，不知咋搞，在大陸會越來越高，真是一個令人吃不消的「現代化」。

傢俱。記得八二、八三年有同學結婚時，擁有超過一千元的一家俱已是很「高檔」了。然而，隨着木材價格上漲等因素，現在傢俱的售價，已經變得你幾乎認不得它們了。這幾年上海時興組合式傢俱，實際這種款式易於加工，用料也省，可是，價格却幾乎是原來的一倍以上，二千元一套的已算較差的，三千元左右的算一般，要四千元以上才算「高檔貨」。或許偶爾會在市場上出現從前的老款式，但售價都在二千元左右或更高。

交通費也在變。上海一直在傳聞，將取消現在的電車四分、七分、一毛、一毛三，和公共汽車五分、一毛、一毛五的票價體系，將改爲「一上車就得買從起點到終點的票。月票將改爲「內部發行」，以阻止外地來滬人員購買，價格也將從原來的六元上漲到十二元。這個月是否已經開始實行，筆者還不清楚。可是，我相信絕對要變的，今年一月，筆者已無法自己去購買月票，每月必須交給學校去「內部統一購買」，月票卡也說會換成了塑料片。筆者有位親戚在公交公司工作，他早就告訴過我，公交公司收入太低，職工福利也受影響，只能通過票價提升來解決問題。飛機票已經漲了幾次，上星期收到廣州中山大學一位朋友來信，告上海——廣州機票要漲到二百七十元一張。而筆者在八三年初到廣州去時，機票只有一百元出頭一點。

至於理髮、洗澡和電影票等一些雜項，也都漲了價。筆者在登機前一天去一家很普通的理髮店，僅剪了一下，胡子還是回家自己剃的，就付了一元七角。電影票的最低價格是八毛，大光明、新華、國泰等裝修過的電影院，一般都要一元五角或二元。

#### 四、書。

讀書人離不了的書，這幾年也在連續漲價。筆者一本不到三百頁的著作，八三年初版時定價一元二角，去年底再版，已漲到二元二角，超過百分之八十。筆者長期在大學出版社工作，出國後接到過去同事來信說，他們已接到通知，從六月一日起，排版費、印刷費、紙張都要漲價一倍左右。這就意味着，從今年六月開始簽訂付印的書，書價要在原來的基礎上再漲近一倍。筆者出國時，「新民晚報」的訂價已是它八十年代初創刊時的三倍，一元五角，恐怕還會往上升。據說「人民日報」也頂不住了，明年開始，每份零售價將變成二毛。

至於房價調整（大陸專有名詞，即漲價），筆者出國時還未開始，究竟怎麼變，大概過了多久就會清楚，因為我已聽說即將公佈實施細則。

以上所談的都是上海的物價，但我相信這些價格在大陸還算低的，因為廣州、北京等大城市早在五、六年前就先於上海開始翻騰物價了，這些城市也一直保持着比上海高得多的物價。

總而言之，在大陸，與你生活有關的一切東西都在漲價。如果你出國已四、五年，現在回去探親或工作，所見物品的價格肯定與你原來記憶中的是兩個樣。而且，我也相信，若要半年一年後來美讀書的同學介紹國內物價現狀，肯定與本文所談的會不一樣。

那麼，在騰飛的物價中，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教師們的收入，又是如何呢？

在筆者所在的大學，流傳着這麼幾句話，大學教師的等值是：「助教八隻雞（月基本工資八十元，約值八隻冰鷄），講師十隻雞（月基本工資一百零二元），副教授十三隻雞（月

基本工資一百二十八元），教授十六隻雞（新提升的正教授月基本工資一百六十五元）。平時大家湊在一起，會自嘲「我是八隻雞」，或「三隻雞加了沒有（即有沒有提講師）」？這些話一點都不算過份，事實上各級職稱的教師收入，包括各種各樣其它名目的收入，最多是月基本工資再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這些是：

(1) 物價補貼。七、八年來，為安慰人們普遍對物價上漲的不滿心理，實行過兩次物價補貼，第一次五元，第二次八元。不知乍搞，高等學校與一般工廠企業不一樣，加了八元後，取消了原有的五元。

(2) 發放獎金。獎金的數額各校略有不同。筆者所在的大學，月獎是一般員工和助教十四元，講師以上十七元。獎金並不是每個人或每個月都可以拿到的。在筆者所在的學校，三個月發一次月獎，事先要經過莫名其妙的「評議」，包括「政治表現」，每週五是否按時「做禮拜」（政治學習），有無請病假，或課時不足，等等。

(3) 科技服務費。大陸近年來鼓勵各校賺錢，名曰「創收」。「創收」所得到的一部分錢可以「科技服務」名義發給教職工。不過，大概是為了「控制」通貨膨脹，政策規定不能多發，否則要加很重的稅。筆者在去年共得二百四十元，屬於一般水平。

(4) 雜項收入，包括書報費、洗澡、理髮補貼等等，加起來每月不會超過十元。

把所有的收入總加起來，大學教師平均每月的實際收入是：青年教師不超過一百二十元，因為有講師職稱的畢竟是少數；中年教師大部分是副教授，一般有一百五十元或一百六十元；老年教師（一般在六十五歲以上）收入高

一些，因為原工資基數較高。

拿着比五十年代多了多少的收入，去對付八十年代而且是日益上漲的物價，大學裡的書生們只能在經濟重壓下生活。

筆者是個有碩士學位的青年教師，月薪八十元，加上其它雜項，平均每月可領到一百二十元左右。住單人宿舍的房租、水電費以及在學校食堂的一日三餐，就得耗去七十元左右，加上購買書刊和每週一次的回家路費及一些零星的生活用品所必需的花費，能剩下來用作機動的不過二十幾元。買一件衣服我都要權衡再三後作決定，上館子吃飯對我來說簡直是個莫大的奢侈和浪費，甚至與女友看電影也得考慮一個限制數。若有意外的支出，如人情往來或出差，往往會使你很尷尬。我這樣的情況在高校不算特例，與我同樓住的一些青年教師們幾乎個個如此，所有的收入全部供自己糊口而已。可是人總不可能永遠像天馬行空那樣獨往獨來，總要結婚成家，為繁衍族類盡責。然而，這類事對我們這些書生說來，大部分費用要靠父母的資助。有些人三十好幾還不算結婚，其中有「西化」影響的因素，但經濟上的原因也肯定是個重要的因素。那些結了婚的教師的日子過得更拮据。

中年教師不比青年教師好多少，因為他們一般都有兩個以上的孩子，家庭負擔重。筆者所在的教研室的室主任，夫婦倆都是副教授，每月實際收入三百多，可也是天天叫窮不迭。他有兩個孩子在上大學，伙食費和每週回家的路費至少每人六十元，餘下的二百元左右，應付房租、水電和煤氣費用，他們自己的生活及每逢週末為孩子改善伙食，已經所剩無幾了。若孩子們想買些工具書、添衣服或暑期出去旅遊，就會使他們夫婦難堪。這位主任已根本沒

心搞教學和科研，他的主要興趣是「創收」，如何使自己能每月多收入二、三十元。對他來說，更糟的是「我只是在邁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過了二、三年，孩子畢業了，他就要開始為孩子們的婚事操勞至少四、五年，而且，這恐怕是更艱巨的與騰飛的物價搏鬥的過程。

老教授的日子也不見得好過。他們的工資與中青年教師相比當然要高得多。然而，這是五十年代的工資數。現在飛速上漲的物價已在無形中減少了他們的實際收入，同時也剝奪了一部分他們辛苦一輩子所積累的存款數額。筆者所在的教研室有位二級教授。他一個兒子一個女兒結婚，就耗去了他積蓄了一輩子的萬多元中的百分之九十。現在，有了外孫和孫女，他也不得不拿出一部分收入去幫助兒女們同騰飛的物價搏鬥。這位老先生年紀大了，性格變得有些囉嗦，經常在教研室發牢騷：「二十年代一塊大洋可買四斤臘肉，五十年代一塊錢可買四斤黃魚，今天，我吃肉也得想一下才能去買。」像這樣的老教授，現在在大陸已不是個別現象，有的兒女多一些的，就會更窘迫，甚至住房也會被分到房子的兒女們擠掉。

學生們更寒酸。師範院校的學生有助學金，若再從父母那兒稍微得到一些津貼，情況相比一般院校的學生還算好一些。一般的院校，如筆者所在的大學，學生從父母那兒拿了六十年生活費，這對家庭已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可也僅僅是糊口而已。倘若想買些書，或添衣服或暑期想出去旅游，恐怕就會變成一種奢望。所以，八六年底學生運動之後，人們普遍認為，現在的大學生將會對共產黨政權形成更嚴峻的挑戰，因為，即使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毛澤東的社會階級分析方法，現在的學生也是最革命的，因為他們最窮，而且，同需要有人來

啓蒙的工人也不一樣，他們是這個社會中最敏感且有知識的階層。一九八六年底的學潮，數量如此之多的學生自發地涌上街頭，以及近來北京學生的民主示威行動，都不能不認為與他們的實際經濟地位有關。

筆者不太清楚中小學教師的實際收入，但在大陸這塊既貧窮又等級森嚴的地方，中小學教師的收入絕對不可能超過大學教師。去年九月的「教師節」，國務院大概想顯示一下「尊重人才，尊重知識」的「德政」，宣佈從八八年一月開始，所有的中小學教師加一級工資。可是，即使這麼一點有限的僅僅是象徵性的錢，至筆者四月份登機赴美時，還是一張空頭支票，原因是：國家太窮，目前還拿不出這筆錢。現在已經是八月，不知數量如此之多的中小學教師們是否真的拿到了這筆僅夠買一隻冰雞的「追加工資」沒有？

一般工人的狀況大概要比「老九」們好一些。筆者的一位中學同學，從未讀過大學，憑着工齡的增長，基本工资已增至一百零五元，他的其它獎金之類的雜項收入，更是我們這些高等院校的書生所不能企及的。筆者在出國前夕，曾讀到過「新民晚報」上的一篇文章，說同樣是與人的「頭」打交道的，腦外科大夫加班動手術六、七小時，至多只能得加班費七至八元，而一個搞了承包的理髮師，或許在一天之中就能比未搞承包時多掙十幾元。

不過，一般的工人生活狀況並不見好，他們也承受着物價的重大壓力。若你回國去上海，可以在電車上、辦公室、大街小巷到處聽到人們關於物價的牢騷和議論。在今年春節前夕，筆者在一次電視新聞中聽到，上海市平均每人生活標準是七十一元人民幣，這就是說，低於這個數字的屬於生活有困難者。筆者不知

這個標準是根據什麼制訂出來的，但是，即使按這個標準來看，大學教師們的生活，除了老教授以外，基本上都在這條綫的邊沿上下擺動着，大部分學生們大概從父母那兒拿到的錢也低於這個標準。筆者有位同學在上海財經大學攻讀學位，他去年曾參加過一個調查項目，據他告知，就上海地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的生活水平在這幾年的經濟改革中下降了，據他們的分析預測，這個比例數還將繼續增大。可是，他們的研究結果不能作為論文發表，只能以一個閱讀範圍很小的「內部資料」名義發行。

最近，大陸已宣佈要放棄物價管制，鄧小平也說要「冒風險」——「理順物價」。看來，大陸的物價將會有更猛烈的折騰，那麼，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所謂的「四化」主力軍知識分子的收入與實際生活又將發生些什麼變化呢？從進行了十年、但仍然處於艱難躑躅中的種種事實來看，我，一個剛從大陸出來不久的留學生，是絕對不相信會有任何改善的，而且，大學裡的書生們即使變得再寒酸，也不會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沒有個人的自由就不會有人類的和平；也不會有人類的尊嚴；更不會有人類的幸福。

(法) 本杰明·康斯坦特



# 還是

## 「自由民主統一中國」好

胡平 林樵清

「世界日報」八月三日及中春六十四期發表于大海先生的「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是第一篇大陸留學生對三民主義的積極意義進行探討的文章，裏面提出的許多問題確實值得人們進一步商討。

于大海在文章中指出，三民主義是一種包容的主義。依據三民主義制定的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憲法保證了各黨派在政治上競爭的權利，保證了人民的人權和自由，特別是注意到了權力的分立與制衡。這些都是正確的。

有些人，特別是那些沒嘗過共產制度的人，通常不知道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不知道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憲法和後來的各種版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區別，也不知道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區別，不知道台灣社會（解嚴解禁之前）與大陸社會的區別。他們傾向於認為彼此都是半斤八兩、難兄難弟。這種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大陸、蘇聯的黨屬於極權主義，而台灣、南非等則屬於權威主義。後者的特點是，它們一般從理論上並不拒絕憲政民主的思想，其政治體制也多少具有一定的西方式民主架式。前者却是從根本上拒斥憲政民主思想，政治體制本身就是純粹的極權專制。國民黨搞專制，總還要打出「戒嚴法」的招

牌，表明那只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而共產黨搞專制却是理直氣壯天經地義。說難聽一點，過去的台灣是掛羊頭賣狗肉，但大陸却一直是掛狗頭賣狗肉。

台灣的反對派要出頭，甚至有朝一日掌了權，它們也不必反對原來的憲法，因為原來的憲法肯定了這種可能性。大陸的反對派要出頭，那就非要修改憲法、非要取消其中的四個堅持不可了。

台灣的反對派可以認同台灣的憲法，而大陸的反對派若是認同了大陸的憲法，無異於自己否認、自己取消自己的存在。

衆所周知，任何一個社會中，反對派人士起來鬥爭，最初總是利用原來的憲法做文章，總是用這個社會所標榜的理想、理論或意識形態去反對這個社會的現實，因此，台灣一些權威主義社會中反對派的成長，相對而言就要順利一些。更不用說在權威主義社會中，私有財產大體還能受到一些保護。像中國大陸和蘇聯發生過的強迫集體化、三面紅旗、割資本主義尾巴一類殘酷而荒唐的事情，在權威主義社會中是不可能發生的。

歷史學家都注意到，權威主義社會已有不少和平轉入民主的成功先例，而極權主義社會却還沒有一個發生過這種轉變。不論是戈爾巴

喬夫的改革還是鄧小平的改革，其實都只是在做台灣、南韓等地早就做到了，或者乾脆說是一直在做的事。

大陸的經濟改革很受世人稱道，最近中共是同意了土地可以轉讓出租，不少人說是偉大突破。這算什麼突破？漢武帝的時代土地就可以轉讓出租了！菲律賓過去是馬科斯搞獨裁，可是，馬科斯是怎麼下台的？是在總統自由競選中作弊失敗被人民轟下台的。

反觀一切社會主義國家，誰個採取過對最高權力的自由競選？連門都沒有。競選中作弊當然可惡，看到自己票數少不惜借用軍隊來維護自己的權力，更是可惡。可是，馬科斯畢竟還沒有取消自由競選本身，畢竟還要承認反對黨可以和他平等競爭，而共產黨從憲法上就把這條路給封死了。

于大海文章提醒我們，在制定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憲法過程中，「中共代表對其要點也都表示過同意」。這件事很重要。要說認同這部憲法就是向台灣一邊倒，那麼中國共產黨就是頭一號。

于大海認為，大陸非共人士應認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對此，我們不敢苟同。

說三民主義有包容性，這不錯。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三民主義也有排斥性。當然，對於什麼是三民主義，人們歷來也是人言言殊，各有各的解釋。一個詞用久了，難免會有許多歷史附着物。現今人們一談起三民主義，總會把它和國民黨一貫宣稱的那套意識形態（其實那只是對三民主義的一種解釋）聯繫起來。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創立的，而孫中山先生是目前台海兩岸都尊敬的先賢。可是，孫中山先生並不是嚴格的理論家，他關於三民主義的種種闡釋也有不夠嚴謹、不夠細密和前後矛盾

之處。譬如他曾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話我們今天同意嗎？

認同一個特定的主義有很多麻煩。一個在歷史上產生的特定的主義，勢必有它的歷史局限性。再經過長期的政治鬥爭的薰染，這個主義又勢必會帶上若干歷史包袱和說不清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尤其是如果這個主義曾被一個執政黨所佔用，還會產生一個「道統」的問題。因此，要那些來自大陸的去認同它，必然會在感情上、理智上都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障礙。比方說，你說要大陸非共人士認同三民主義，有人不肯認同怎麼辦？有人表示要批判它怎麼辦？有人表示對了解三民主義沒興趣怎麼辦？作為一個希圖在實際政治中盡量發揮最大作用的口號來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顯然有它的麻煩。

胡平在「中國統一之我見」指出：

「有人之所以贊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因為他們認為三民主義就包含了民主主義的思想，因此三民主義不同於四項堅持而具有廣泛的包容性。可是問題在於，三民主義者們應當看到現今大陸上絕大部份人並不熟悉和並不信仰三民主義這一事實，更應該懂得廣大人民（尤其是大陸人民）對各種主義均持存疑心理，不肯輕言信仰，十分重視自己的選擇權利這一普遍心態，因此當今首要之務並不是急匆匆地把自己以為不錯的信仰加給別人，而是努力建成一個人民能夠在其中自由比較、自由選擇的政治架構，也就是說實現民主和法治。」

在我們看來，于大海希望有更多的大陸人注意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了解，這是無可非議的。在肯定了三民主義包含着民主主義的前提

下，我們也可以對現今國民黨當局中一些人提出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口號持有保留的贊同。

不論是什麼人，不論他提什麼主義，只要其間承認自由民主，那麼，不管它叫三民主義、叫社會民主主義、叫基督教民主主義，甚至叫民主的馬克思主義，我們都可以有保留的贊

## 民聯總幹事丁楚致民主中國回信

「民主中國」的朋友們：

非常興奮地接到你們組織成立的消息，中國民聯不再孤軍奮戰了，我們有了越來越多的戰友。在此，我謹代表民聯總部向你們表示祝賀，並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國進步的最大障礙是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制度，而這種專制只有有用組織的力量才能打破。如果說幾年前人們還在想像從體制內部來改變這種專制制衡的話，那麼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體制外制衡力量的重要性了。我們相信，今後還會有更多類似組織湧現出來扮演這種制衡的角色。共產黨可以將「民聯」宣佈為「反動組織」，可是它無法宣佈成百上千個這種組織都是反革命。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專制主義的末日就到了。

在當今所有的共產黨國家中，還沒有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先例，可是，歷史給了中國一個機會，使她成爲這個可怕的專制鏈環中最薄弱的一環，成爲最有可能創造這個先例的國家。我們有擁有很多成功的條件：我們有文化大革命，我們有擁有很多成功的條件：我們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歷史，它不但把專制主義推向了荒謬的極端，而且讓人民學會了如何組織和鬥爭；

同。換句話，我們不反對任何依據自由民主原則統一中國的思想或主義。從實際政治運作上講，我們以為我們最好是儘可能避免無謂的誤會和爭端，努力尋求「最大公約數」，讓持有不同意見的各方都能用和平民主的方法走到一起來。因此，我們認為，還是提「自由民主統一中國」好。

我們有台灣和香港，在無孔不入的專制制度下留下了兩個「活眼」；我們有兩千多萬海外華僑和三萬餘名海外學子，他們將爲中國的土壤播下民主的種子；更重要的是，中國是個大國，她不受蘇軍坦克的威脅，同時她又是個窮國，她受到外部文明的壓力，使她的人民有了變革現狀的緊迫感、危機感。

我們在開創一個先例，這將爲人類史寫上壯麗的一筆。我們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就能親手結束中國的專制，讓下一代人在出生時就可以看到民主自由的曙光。

民主是世界的潮流，民主是大勢所趨。我們面對着共同的目的，時間對於我們是有利的。也許前程還有千難萬險，可是，朋友們，當你們在爲着這一目標奮鬥時，請記住，在中國大陸，在北美大陸，在世界各個角落都有着你們分擔壓力，同你們分享勝利的戰友。你們不是孤立的，正義的事業是不會孤立的。祝成功！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總幹事丁楚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 初談中國海峽兩岸 兩部憲法的比較

于大海

本文試圖對一九四六年國民大會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和一九八二年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加以初步比較。

## 一、兩個第一條

一九四六年的「中華民國憲法」(以下簡稱四六憲法)的第一條是：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民有、民治、民享」，這是林肯對美國民主政治制度的精辟概括。美國是最先制定成文憲法的國家。美國的憲法，又源於歐洲啓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特別是洛克(JOHN LOCKE)和孟德斯鳩(MONTESSQUIEU)。洛克認為，每個人都有「生存、健康、自由和佔有」的權利。這些基本權利是不可剝奪的；無論是皇權還是別的政治權威，都不能侵犯這些權利。孟德斯鳩認為，為了保障個人自由，需要對政府的權力加以分離和制衡。(1)這些思想，在美國憲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四六憲法將概括這些思想的「民有、民治、民享」寫在第一條中，表明它是與西方民主

政治同源的。

一九八二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八二憲法)的第一條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

中共的領導人和理論家都會反復說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2)無

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概念。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這個時期相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對「無產階級」(也就是「工人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則在「共產黨宣言」中另有解釋：「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階級都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却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4)八二憲法將「人民民主專政」和「工人階級」寫在第一條中，表明它源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

兩個第一條，體現出兩部憲法截然不同的本質。四六憲法推崇平等、自由、民主，而八二憲法認為這些都只能是謊話，由無產階級專政階級的政才公平。四六憲法基於西方國家成功的憲政經驗，八二憲法則基於馬克思「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預言。

八二憲法與自由民主思想之間的鴻溝太深了，是無法靠重新解釋憲法條文來填合的。譬如，自由民主思想中有一條原則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六憲法的第七條發揮了這一原則：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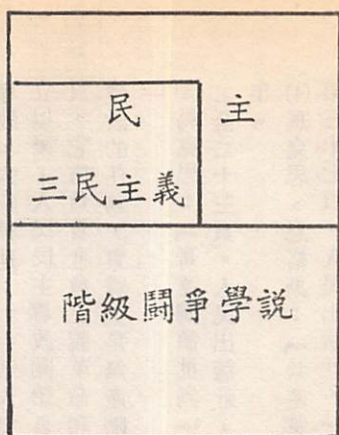
八二憲法的第三十三條中，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字樣。然而，這一條顯然是與第一條相矛盾的：那些「對立的」或「日趨沒落和滅亡」的階級，怎麼能和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人階級平等呢？

結論：中國大陸要民主，必須廢除或大幅修改八二憲法。

## 二、四六憲法與三民主義

四六憲法中，有「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的字樣，似乎沾定了中華民國於三民主義之「尊」的嫌疑。針對那些討厭「主義」這個字眼的人，我願在此對以上提法作如下辯護。立國總要基於一種原則，一種信仰。原則和信仰，也就是主義。討厭「主義」的人喜歡講要民主，不要主義。但既然世界上有不要民主的人，定尊於民主同樣是推行一種特定的原則和信仰。因而，我們需要考察的，實際上是三民主義與民主的關係。這要分兩層談。首先，孫中山

提出的三民主義，其中的民權主義，也就是民主。所以，三民主義與民主，是完全相容的。三民主義、民主和階級鬥爭學說，三者的邏輯關係是：民主與階級鬥爭學說互不相容，而三民主義則是民主的一個子集（SUBSET），是一套具體的民主制度和與民主相容的政綱



民主、三民主義  
和階級鬥爭學說的邏輯關係

。現在假定中國有第三黨提出另一套民主制度和與民主相容的政綱，不具黨派色彩的民主人士，則應當擁護孫中山與第三黨共有的民主內容，對孫中山與第三黨的具體主張不發表意見，並堅決反對吹噓階級鬥爭學說的共產黨。現在一些談民主的人，把主張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一同歸類為主義派，並以民主派的姿態高居於二者之上。這些人，沒有看到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根本區別，是不能算作真正的共產黨在行動上不接受民主政治的規則，因而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政黨。有人說共產黨是大陸的執政黨，這話不對。共產黨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執政黨，因為它從原則上就不准別的黨執政。共產黨是一個專政黨。專政黨是與民主政體互不相容的。

其次，四六憲法中出現「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的提法，表明制憲人士已對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註釋，將之與「民有、民治、民享」劃等號了。按照這種理解，三民主義就是民主。這樣的三民主義，應是所有的民主人士可以接受的。

### 三、八二憲法的演變

中共一九五四年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一條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農工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一九五四年，中共還沒有實行國有化，所以憲法中沒有「社會主義」和「專政」的字眼。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則已經確立。

中共一九七五年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一條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農工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一九七五年時，中共不但已基本完成工商業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國有化，階級鬥爭也正搞得激烈。所以憲法中連「人民民主專政」的隱詞都沒有用。

中共一九七八年重新制定憲法時，沒有變動第一條。

我們再看蘇聯一九七七年憲法的第一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社會主義全民國家，代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國內各族勞動人民的意志。」

蘇聯憲法的這一條，雖然還有階級鬥爭的烙印，卻沒有明確指出各階級的優劣，民主精神總比大陸的八二憲法多些。難怪蘇聯的政治改革比大陸步子快。中共一九八二年沒有效仿蘇聯憲法，大約是因為仍對蘇聯抱有「修正主義」的歧見吧。

### 四、三個序言和「四個堅持」

美國憲法有如下簡短序言：

「我們合眾國的人民，為建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維持國內安寧，提供共同防務，促進公共福利，並保障賜予我們和後代的自由，特此制定這一美利堅合眾國憲法。」

這個序言，只說明了制定憲法的目的。美國的法學界，公認憲法序言沒有實際效力。(5)

四六憲法的序言也很簡短，只有六十六字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

這個序言，體例內容都與美國憲法的序言接近，也沒有什麼實際內容可以引起訴訟。

八二憲法的序言則約有兩千字之長。大陸法學家從未論證過這段文字的法律效力，但中共却多次引用其中提到的「四個堅持」來壓制和懲罰大陸不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士。譬如，上海市公安局在宣佈中國民聯為反革命組織時指出：「該組織的綱領公開宣佈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現行專制制度，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四個堅持』……』顯然，這是違反中國憲法的。」(6)

按照民主原則，公民有權要求修改乃至廢除重訂憲法，這個道理，胡平早就講過了。這裡，我們且看看八二憲法是如何在序言中提到「四個堅持」的：

「中國各民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

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爲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段文字，顯然完全沒有說公民必須堅持什麼，而只是一個將來時態，一個預言。序言中這樣的文字，無論是按慣例，還是按字面意思，都不可能具有法律效力。

通讀一下八二憲法的序言，我們可以總結說：序言基本上都是廢話，刪了比不刪好。

注釋：(1) 參見 THE CONCISE COLUMBIA ENCYCLOPEDIA 中 LOCKE 和 MONTESQUIEU 條。AVON BOOKS, 一九八三。

(2) 譬如，大陸出版的「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對「人民民主專政」的解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人民民主專政開始具有新的性質。它擔負着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

(3)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

(4)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三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

(5) EDWARD S. CORWIN: THE CONSTITUTION. PRINCETON UNIV. PRESS, 一九七八年。

(6) 「人民日報」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和「中國留美同學政治學會」分別於七月舉行第四屆和第三屆年會。

經濟學年會於七月十五日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召開。會議首次邀請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家和台灣經濟學家共同參加，研討的中心主要圍繞着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海峽兩岸的經濟關係。

以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總

幹事孫尚清爲首的六位大陸學者和官員到會並作了國內經濟改革的報告，台灣方面出席會議的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的趙崗教授。會議之後舉行了選舉，新任會長爲德克薩斯州澳斯汀大學的孫濼，新任理事爲許小年、徐濱慶、海聞、左小蕾、單偉健、楊昌伯。

政治學年會於七月二十九日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召開。著名美國學者、中國問題專家、密西根大學政治學教授奧格森·伯格和美國著名的中國民主運動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出席了會議並作了講演。會議研討的問題主要圍繞着中國大陸政治和經濟改革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國傳統文化與政治、經濟改革的關係。中國民聯主席及政治學會前任會長胡平在會上發言，引起熱烈反響。

會議後舉行了改選，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徐邦泰當選爲會長，新任理事爲程鐵軍、唐文方、莊文仁和林至閩。

這次經濟學和政治學年會除得到美國基金會資助之外，還分別得到了世界日報文化金會的資助，這是台灣方面支持大陸留學生的學術交流活動的一個先例。

經濟學會和政治學會會長的聯絡處：

孫濼(經濟學會會長)

STEVENS HALL  
COLLEGE OF BM.  
UNIV. OF MAINE  
ORONO ME 04469

徐邦泰(政治學會會長)

2456 PARKER ST #1  
BERKELEY CA 94704

(415)843 1653





# 中共動武？ 台灣獨立？

柯平

我認同台灣，但却是個不折不扣的外省人。我父親是一九四九年到台灣，母親是遲至一九五四年才到台灣，到現在我還能說一口道地的寧波話。我既不主張台灣必須獨立，也不仇視大陸人的情緒，現在還有大陸親友和我保持聯繫。統一或獨立的根本要以人民的幸福為依歸，並沒有絕對不變的道理。

現在大陸人中的流行看法，是對台灣經濟成就的極端欽佩。有人贊揚台灣，台灣人自然是高興的，不過台灣有不少人，對大陸人的這種讚美，是覺得有點過分，台灣的經濟還沒有好到那種程度。外匯存底數量大，也並不是經濟成就的唯一指標。事實上，台灣在經濟上面臨的困難不小。南韓的國民所得雖不如台灣，但技術能力上却早已超過台灣，日本、美國更是遙遙領先，中國、泰國、菲律賓則苦苦追趕。台灣正是前有強敵，後有追兵。而在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方興未艾，國內，經濟特權尚未消除，金融自由化猶未貫徹，正是內憂外患。

若說台灣過去有經濟奇績，其實增長最高的十年不過年平均百分之十一。廣東省在過去九年中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高達百分之十五。這麼說來，廣東豈不是奇績更大。台灣真正的力量，並不在於外匯存底的數目。很多大陸人覺得想當然的事，並沒有事實根據。

四百多年前，大陸人開始移民台灣，這些人大多是在大陸活不下去，才會投奔怒海，冒險一試。來到台灣也真的是要戰天鬥地，不然就生存不下去了。後來荷蘭人來台，屠殺了不少漢人與高山族人。鄭成功驅逐了荷蘭人建立了東寧王朝，和清朝對峙達二十二年。鄭成功的父親原是海盜頭子，鄭成功的部將們，也大多海盜出身。東寧王朝是以貿易與海路立國，

和清朝的重農帝國，大不相同，所以能隔海對峙。他們最後的敗亡是內政不修，部將紛紛降清，包括後來攻陷台灣的施琅。在內政不修的情況下，鄭經又在三藩之亂時，發動對清朝的戰爭，前後打了七年，雖然曾經攻陷南京，但最終是精兵喪盡，國力耗光。東寧王朝，隨後即被施琅征服。

在有清一代，台灣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變亂叢生，比較大規模的，有林爽文起義。在中法戰役中，台灣軍民曾擊敗法國，簽下晚清時代唯一沒有割地賠款的合約。到甲午割台，台灣人成立了台灣民主國，推選唐景崧為總統，劉永福統治軍務。結果日本人在基隆澳底登陸之後，唐景崧與劉永福就潛逃大陸，台灣民主國不戰而潰。但是台灣人民却發動了長達十年的抗日戰爭，結果因為各自為戰，武器裝備相差太遠，終於被日本人壓制下去。武裝鬥爭雖然失敗，但是秘密的抗日組織與運動却從未間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協會與台灣共產黨。當今台灣總統李登輝，青少年時代就曾加入台灣共產黨，後來退出。台共的成立，和中共、日共幾乎同時，此三個兄弟黨同時加入共產國際，其目標是反帝、反殖民及民族解放。當時，此三共對台灣的共同決議是台灣獨立作為其反帝、反殖民鬥爭的一部分。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公然提倡台灣獨立。台灣獨立運動的老祖宗，正是台共的謝雪紅、蘇新、蔡孝乾以及中共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

後來中共勢力漸大以後，就不再高唱台灣獨立，但也不反對。這時台共與中共的裂痕漸生。到二·二八事件時，台共利用台灣人民對國民黨的不滿，發動武裝起義，爭取台灣獨立。那時中共雖然表示支持，但是却說成是自治

運動。二·二八失敗後，謝雪紅潛逃大陸，依附中共。

到中共在大陸上獲得全勝，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台灣就是中共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謝雪紅在大陸上所以會遭到中共的整肅，就是因為她堅持台共最初的獨立建國路線。

由上述可見，台灣獨立運動的起源，即是台共、中共與日共。台獨派承襲了過去這個獨立運動的歷史，民進黨則吸收了台灣人四百年來的反抗精神，吸收外省籍民主人士，搞起了獨立運動。總的來說，本地台灣人，您固然可以說有島國的偏狹性，但也確正有島國人民的叛逆性與冒險性。

到了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率二百萬人撤退到台灣。跟他撤退來台的，多是比较忠貞、比較意志堅定的人，不然，早就或投共或帶着金銀細軟到國外去了。那時的台灣，已是一幅標準的亡國圖。經濟崩潰，軍事失利，外援斷絕，人心惶惶。使台灣渡過難關的有三大原因：一、內部人民的意志與奮鬥，因為再退一步即無死所，沒地方可逃了！二、海峽天險，中共渡海不易。三、後來韓戰爆發，美軍協防台海。就在一九四九年情勢最險惡的時候，蔣介石終於覺悟，推行三七五減租，一來解決百姓吃飯問題，二來爭取台灣本地人民的支持。接着有金門古寧頭戰役的勝利，大家心情才漸定。

在經濟上，從一九五〇年的耕者有其田開始，接着發展農產品出口，到農產品加工，到輕工業，到今天的追求技術密集工業及精密工業。循序漸進，終於有了相當基礎。

在軍事上，却是戰爭不斷。古寧頭戰役之後，有一江山戰役，又有大陳島撤退。接着有大規模的金門炮戰，金門的落彈密度，超過二

次大戰時。落彈密度最高的硫磺島戰役。那時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蔣介石放棄金門，而由美國第七艦隊協助，防守台海一綫。蔣介石拒絕了，他親自到港口督師，運送重炮到金門，並派他兒子蔣經國到金門前綫。接着九·三大規模空戰。最後中共無力奪取金門，以單打雙不打，自找下台階了事。到了一九六〇年，熱戰的程度降低，但是蔣介石仍然發動一連串的沿海小型突擊戰，比較著名的有東山島戰役。

七十年代，國際形勢轉變，西方國家改採聯中制蘇的戰略，台灣與中共的鬭爭，由台海的熱戰，改成了外交上的爭奪戰，結果台灣不敵中共的國際戰略地位，外交戰上大敗，最後在一九七九年美國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承認中共。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二大以後，開始了和平統戰的鬭爭階段，直至今天。

在五十年代，台灣的國防預算會佔總預算的百分之九十，到現在還佔百分之四十。一九四九年，飯都吃不飽的時候，開始三七五減租。一九五八年，八·二三金門炮戰時，開始發展輕工業。一九七三、七四年前後，正當退出聯合國之後，石油危機使台灣的經濟貿易跌到負增長，越南、高棉、寮國相繼陷共，就在那時，開始十大建設。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開始發展資本工業。大陸人只看到台灣的經濟增長，却沒有看到這個增長是在戰火及動盪中茁壯的。

總而言之，台灣就是在過去四十年，和共產黨鬭爭中站起來的。熱戰、冷戰、經濟戰、外交戰、和平統戰，都打過。在長達四十年的交戰狀態中，台灣並未被拖垮，即使每年頂着百分之四十的國防預算。連中共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都估計過，台灣如何會沒算到什麼「宣而不戰」或「不宜而戰」。



台灣 F-5E 一虎 II 式戰機

台灣人民與中共冷戰、熱戰幾十年，從未改變反共立場，中共的空言恫嚇，只會導致台灣人民的譏笑：既要宣戰，又不敢打，不是紙老虎是啥？中共的所謂「強大」，會使台灣人民感到威脅，感到不斷努力的必要，也會使他們步步為營，不能走錯一步棋。但是，不會被嚇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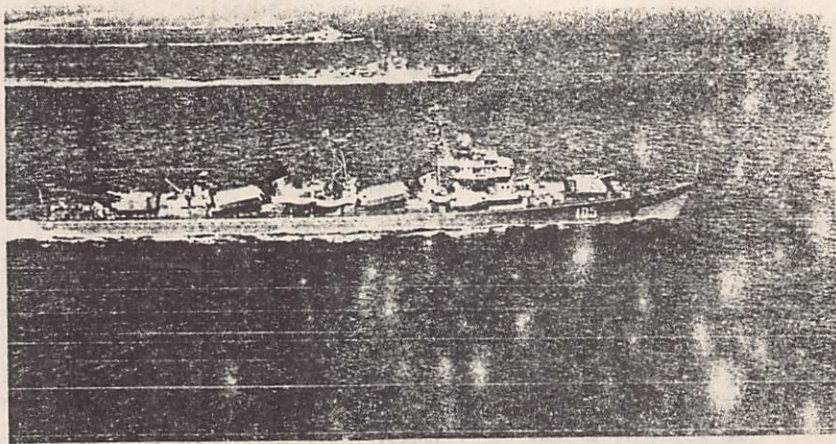
其實，民聯的提醒，中共官方不知做過多

少。最近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明白指出一國兩制是台灣的唯一出路，其它統統不行。又說，攻打台灣也許很困難，以台灣的海島型經濟，困住台灣却不難。瞭望月刊上，說得更明白，台灣若對統一再無紧迫感，中共即將用武。台灣總統李登輝的答覆也很明白，在中共放棄四個堅持、放棄一國兩制、放棄武力之前，兩岸的關係不會改善。中共對台灣獨立，以用武相威脅；民進黨的反應很乾脆，你用武，我就獨立。民進黨把獨立，再解釋成「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之外」，高唱台灣主權屬於台灣全體人民。

對於中共的恐嚇能嚇住台灣嗎？能改變台灣的強硬立場嗎？大陸人被老虎咬怕了，而台灣人民正是打老虎出身。台灣不但沒被嚇住，報紙社論反過來威脅中共，你若發起任何形式的戰爭，我保留任何的自救手段。這個夠中共想很久了，什麼是「任何自救手段」？台灣獨立？支持西藏人民打游擊？倒向蘇聯？使用核武？經濟戰？摧毀大陸的沿海經濟特區？人們還可以想一大串！

即以純就封鎖台灣而言，封鎖大約可分三種：一種是遠海封鎖，其次是近岸封鎖，最後一種是直接炸毀港口。以直接炸毀港口來說，中共戰國機載彈量有限，轟炸機數目不多，又容易被擊落。在台灣的空軍及防空網之下，中共飛機自然仍有機會丟一些炸彈在台灣港口上，但是這種損失還不及一次強烈颶風對港口或交通綫所造成的損失。中共能持續多久？台灣空軍若突襲對岸機場，中共又如何應付？台灣的港口與交通綫很快可以修復，中共補充被擊落的飛機的能力如何？飛彈便宜，飛機貴，台灣以飛彈對飛機，中共經得起多久的損失？轟炸若不密集而持久，根本無封鎖的效果。

其次遠海封鎖，例如將台灣海峽的兩端堵住。封鎖綫可以維持在離台灣海岸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以免被台灣的岸射反艦飛彈擊中。東海艦隊可以堵住北端，南海艦隊負責南端。



中共海軍戰艦：「旅大」號驅逐艦 「江東」號導彈巡洋艦  
「安山」號驅逐艦 「自豪」號驅逐艦

照您想，這樣台灣自然就完了。首先，這種幾百公里長的封鎖綫是很脆弱的。台灣的海空軍集中力量突襲封鎖綫上的一點，在那一點上佔盡優勢，消滅了一點，下次再選一點。這封鎖綫實際上是挨打綫，因為海戰最忌諱這種備多力分的做法。這種封鎖只有在對方沒有海、空

軍時才行得通。

退一萬步說，即使中共能維持封鎖綫，結果台灣未必封鎖到，和其它國家倒可能先開戰了。台灣海峽是一條國際通道，通過的船隻，大部分並不屬於台灣。台灣固然要依賴這條水道，日本、南韓的依賴更深。隨着中國貿易量的增加，中國對這條水道的依賴也更深。況且海運是國際性的，台灣的進出口貨物，大部分是由外國船運送，幾乎沒有一條船是只裝一國貨物，只到一個港口的。新加坡、香港、高雄、上海、釜山、橫濱、舊金山，這些港口一路貨物上上下下，是一種最普通的情況。你要不准所有船隻通過，那麼中共至少得罪了十個以上的國家，尤其是日本，因為日本貿易量最大，貨輪最多。日本會同意嗎？南韓會沒反應嗎？中共如何應付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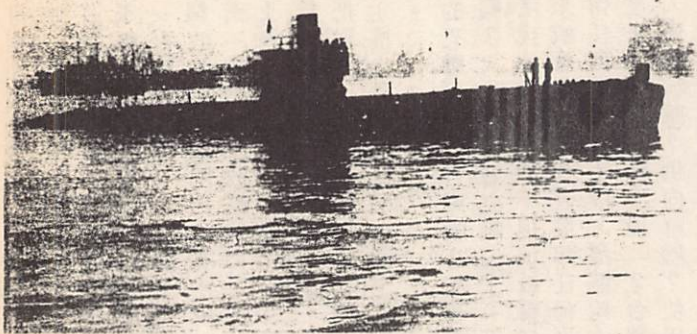
若是准許外國船隻通過，只是不准台灣船通過，那麼台灣大部分貨物，仍是通過外國船運到了。另外，再把台灣船到國外註冊，改掛了外國旗，再聘請一個美國人當船長，問題不就解決了。事實上許多所有權雖屬於台灣公司的船，現在就是掛巴拿馬或希臘的國旗，因為那兒的船隻註冊費便宜，或者當初就是從希臘買過來的，仍掛希臘旗。

中共所謂的封鎖絕招，說穿了不過爾爾。用台灣話講，是根本不夠看。

比較可行的，還是近岸封鎖，也就是到港外佈雷。用艦隻佈雷不行，因為台灣海岸上有近千顆的反艦飛彈。中共有一百多條潛艇，或者佈雷，或者到港外用魚雷打貨船，這倒是有點可行性。首先，這還是有前述的問題，中共潛艇打中的，八成是外國船，可能這條船還是剛離開上海，載了一大批上海貨。當然中共可以警告外國船，叫他們不要到台灣港口，到了

港外就打，或者會觸雷。我們看看，波斯灣中，兩伊不斷炸油輪，油輪就不去了嗎？不過是船隻保險費跳升了好幾倍。

也就是說，中共若不能使台灣船隻高比例（例如百分之三十）沉沒，外國船不怕，繼續會來，台灣不過多付點保險費。中共能使大部分船隻沉沒嗎？能夠持續三個月以上嗎？首先，台海是個大陸棚地形，海峽中最深不過一百五、六十公尺，淺的六十多，平均一百公尺上下。到了基隆港外，水深不足二十公尺。潛艇作戰，本就像魚游大海，例如美蘇的核潛艇，可深潛至二千公尺。即使中共的潛艇比美、蘇還厲害，到了台海，也是龍困淺灘。中共潛艇的活動空間，就在一百六十公尺到二十公尺之



中共海軍R級潛艇

間。事實上，潛艇是不能在二十公尺的水深中潛水的，因為艇身的高度就至少十來公尺，不小心或者觸礁，或者撞船，即使沒人丟深水炸彈。若是硬要到這種地方潛水，普通延期信管的炮彈，都可以擊毀這些潛艇，根本用不着魚雷。這種地方，佈雷也很困難，因為丟下的水雷，很容易炸中自己或者其它潛艇，尤其是磁性感應水雷。

若是台灣海軍一來，這些潛艇就死路一條。所以，潛艇不能在二十公尺深的地方潛水的。那就是說，台灣海軍所要防守的地方不多，只要三個主要港口外，水夠深的地方到海峽中綫的幾條航道就行了。中共潛艇自然要到航道附近的地方佈雷，在那兒不小心就會被擊毀，佈下去的雷，不久會被掃掉。台灣經濟自然會受影響，但不會被扼死。中共的潛艇却損失更大。中共的潛艇在損失後的補充能力如何？台灣海軍突襲潛艇基地，中共如何應付？台灣封鎖廈門、福州、馬尾，又如何？結果，我看最後中共只能再找一個「單打雙不打」的藉口，自找下台階了！

其實，以上所說，並非什麼險辭難見的道理，只不過大陸人，自小生長於中共的陰影之下，中共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敢的印象深刻，所以，一聽小台灣要和中共敵對，想當然耳覺得不可能。還有大陸人提什麼人海戰術都可拿下台灣的主意。這就是被中共的所謂「強大」嚇住了，不肯去動腦筋。

我曾經也將一些兩岸軍事常識，和大陸同學談談。慢慢他們也開始從實際的角度去想，不再囿於中共的強大。有一次，一個大陸朋友和我談起，他說他看到一則消息，中共在閩江口集中三千條漁船，進行列陣演習。照他從前想，這樣子萬帆齊發，先拿下馬祖，再拿下台

灣，豈不容易！我問他，你現在開始用一點實際軍事常識去想，還會這麼想嗎？他說不會了。萬帆齊發，近了海岸綫時，台灣守軍只要倒個幾千噸汽油在海裡，不把他們燒得片甲不留才怪。我問他，如何有這個想法的？他說，三國演義裡曹操不就燒得片甲不留嗎？那時，尚未有汽油，所以，還要先使一個連環計，要曹操把船都連起來。現在只要汽油一倒，連這個連環計都省了。

一個普通大陸學生，只要肯動腦筋，也可以想出一些作戰方法。台灣軍方的參謀本部，整天沙盤推演，對付中共的方法還更多。其實，只要你不被嚇住，動動腦筋，研究研究武器戰法，自然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中共那有什麼好怕的。

這樣台灣是否可以宣佈獨立呢？在未來十年內，我看是不會的。其中原因，並非中共這隻紙老虎的威嚇，而是下列原因：第一，台灣人民中，還是有許多對大陸懷有感情，不願就此一刀兩斷。第二，一般人民覺得，只要中共不過來，日子也過得不錯，中華民國也還混得下去，就沒有急着換國號的必要。第三，美國、日本現階段都反對台灣宣佈獨立，因為這會打亂了美、日聯中制蘇的全球戰略。但是也不喜歡看到中共一統台灣，因為萬一中共重走親蘇路線，美日即可反過來，用台灣制中共。第四，中共雖是紙老虎，却有核子牙，台灣在核子武力上，尚不足嚇阻中共。

大陸人不贊成台灣獨立，我當然可以理解，我自己都不一定贊成。反對台灣獨立的理由，是中共一定會用武，台灣若宣佈獨立，又不接受一國兩制，中共就不用武了嗎？台灣若怕中共用武，還能存在到今天嗎？今天的中共已不是過去那樣，登高一呼，萬民盲從。今天

更怕打仗的是中共，例如印度在麥克馬洪綫上，已經駐軍設邦，中共却擺低姿態，說中印可以和平相處。因為西藏情勢不穩，即使解放軍可以打敗印軍，印度若支援西藏人打游擊，即可拖垮中共。另一方面，國內物價飛漲，改革正處於成敗關頭，中共也難以動武。還有，現在的大陸人民，改善生活的欲望很高，作戰意志並不高。尤其到西藏那種窮山惡水中去作戰，面對西藏游擊隊的夜半突襲與自殺炸彈。今天有幾個人想到西藏打仗？今天已不是抗美援朝，上戰場是光榮的時代了。

台海形勢也是如此。中共攻打台灣，也有上述的問題，而台灣人民是背水一戰，雙方的作戰意志，已可預卜其成敗了。今天中共對台灣獨立一再叫囂，正因為這是中共最可怕的事情。萬一台獨派得勢，不顧一切宣佈獨立，中共就真正面臨考驗。打或不打？打的話，那是兩面作戰，因為台獨派一向支持西藏獨立運動，台獨派不會只對中共一面作戰的。今天的大陸人會像抗戰時代那樣咬緊牙根，抗戰到底嗎？還是不滿升高，反戰厭戰？這種情況下，中共先垮還是台獨派先垮，就難說了。打，救不了中共。

不说的话，中共威信大失，日子也難過。總而言之，中共一向買空賣空，中共有把握的事，如香港，就予取予奪，然後還要說他是多寬大。他害怕的事，如台獨，他正要窮叫囂，希望能嚇住台獨派，因為中共經不起這個考驗。國民黨不一定會搞獨立，但是現在清楚中共的弱點，就擺出一付可統可獨的態度。台獨派可以在街頭公開演講，高喊獨立萬歲，但又有兩個人抓進監牢。台灣同鄉會回台開會不准，但是以個人名義回台，又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是台獨的游說組織，在台成立分會，照

准，台灣獨立聯盟回台，又不准。反正政治大家玩，你以此嚇我，我也以此嚇你。中共威脅台灣獨立，台灣也以獨立相威脅。這盤棋還有得下。

最後，台灣的真正力量在哪裡？那幾百億外匯嗎？錢既能賺來，也能花掉。今天經濟上去了，明天也可以掉下來。現在天弓飛彈很先進，過幾年也會落伍。中共現在無力攻台，並不表示未來不能踏平台灣。中共的經改也不一定會失敗。即以中春六十三期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報告來看，過去兩年中中共的生產增加很快，有些方面比過去台灣的高增長還快。經濟、軍事、生產，都是由人所創造，人才是最重要的，人的活力、幹勁、信心、意志才是一切的根源。本地台灣人有其海外人的冒險性，拓荒者的苦幹性，四百年的叛逆性。外省台灣人，有其作戰到底的意志，與反共決心。在內憂外患之中，這群人在一個小島上併出了火花，站穩了腳跟。這才是台灣的真正力量。

用香港人來對照，就看得更清楚了。台灣人在國民黨的專制體制中，打出民主來。香港人在老牌民主英國手中，得不到民主，反被統治得很舒服。他們習慣於一個主子，所以，永遠會有一個主子，不是英國，就是中共。他們不習慣於當家作主，所以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香港即要沒入這個十億人的大海，不久連泡沫都看不到了。民聯中人，在談到未來影響中國的力量時，有美國，有蘇聯，有日本，有台灣，但是沒有香港，因為香港沒有獨立的方

向，只能隨風飄，只能被人同化，不能同化別人，他們只有舞照跳，馬照跑而已。

有自由人，才有民主國。有奴才性，才有奴隸主。有苦幹的人，才有經濟發展。有勇敢的人，才有軍事勝利。台灣在各種陰錯陽差的

歷史交點中，成了中原文化的突變種。那裡的人，重冒險，重追求，不再那麼安土重遷。那裡的人，必須要戰天闖地，不然人口密度世界第二的小島上，是活不下去的。他們的國家，不再是重農帝國，而是靠貿易為生的重商國，不是陸權國，而是海權國。

台灣人的努力，不止爲了自己幸福，也爲古老大帝國標示了新方向，從大陸文化開創了海島性，從重安定到重開創，從專制因循到民主爭執。台灣對大陸有很多啓示作用，但決不止是多了一點外匯而已。台灣之所以有意義，正在於台灣的獨特性與獨立性。若像香港那樣，沒入十億人的大海之後，就沒有意義了。若沒有一個不同的台灣，古老文化可能失去了更新的契機，封建專制，沒了民主的火花。就因有不同，才有台灣。也因有台灣，才有不同。有了不同，有了挑戰，才有更新與調整。

今天講統一的人，對這方面，恐怕沒有認識清楚。統一之後，這個紅色帝國，就沒有對照體，因爲那時的台灣只是在中共領導人恩賜下，多了一點特權。其它的人若想多一點權力，還是得求皇上開恩。這樣，十億人會更幸福嗎？

所謂外行人看熱鬧，內行人看門道。民聯中人，最近的未來，大概有機會去訪問台灣。看熱鬧的人，去看高速公路或國際機場，其實，這些在美國多得很，不必千里迢迢跑到台灣去看。我希望民聯中的大陸人是內行人，不是去看表面，而是去看人，看文化，看精神。您不必同意那裡的一切，更無需大聲讚揚。但是，請您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心情去瞭解他們的心情、他們的意志、他們的生活。一個和中共對抗四十年的小島，一定會給人們一些啓示的。

# 是真話又不是真話

## 評吳祖光在日本的談話兼論中國

### 共產黨和中國知識分子的關係

鍾其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就有所謂的知識分子政策。但和其它很多的政策一樣，常常是被「靈活運用」的。中國知識分子，只是在某些短暫時期或個別特殊樣版，會蒙受黨的眷顧。而作為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相對於其他人民來說，大多數人常常都是被歧視和被打擊的。

前不久，報刊報導吳祖光在日本答記者問，說：「中共對知識分子有恐懼感」。這是百分之一百的真話。

但我不同意他說五十年代中期中共和知識分子關係才變壞，五十年代之前，黨和知識分子是互相信賴的；更不同意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已恢復正常。

衆所周知，遠在二十年代，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便在中共領導集團中顯示出歧視知識分子的傾向。出於他的帝王思想，毛本能地從秦嬴政、漢劉邦及明朱元璋等人身上吸取了提防與仇視知識分子的精粹，運用他的「階級分析法」，把知識分子摒除於革命隊伍之外；雖勉強給一些知識分子加上「革命」稱號，但又附加軟弱、動搖、小資狂熱：

：等特點以和工農基本群眾區別。（這是毛澤東別有用心以偏蓋全。事實上，怕死叛變在工農出身者也不少，往往服膺真理、主動尋求革命的知識分子，比因生活陷於水火而逼上梁山的工農，其革命情操和堅定性還高超得多。

三十年代，毛澤東在打倒陳獨秀、王明的奪權鬥爭中，深深體驗到未來能取代他的也只有知識分子，故一在延安站穩腳跟後，便借批「野百合花」事件，向一批投靠革命的知識分子首開殺戒，這不過是四十年代的初期。祇是五十年代反右及六十年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小試其鋒。當時發表的，迄今仍為極左派奉為經典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欽賜給工農兵新貴族的身份，正式把知識分子寫入「另冊」（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用語）。規定知識分子只有接受工農領導和改造才可登上革命之台。

本來，中共領導集團內，有的是知識分子，但他們跟隨毛幾次「路線鬥爭」爬上特權層之後，「存在決定意識」，對毛整治知識分子

以保衛他們既得利益的做法，自然深表贊同。到一九五七年，毛進一步（借一句古語：「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把中國的知識分子比喻為「毛」，只能附在「皮」上才可生存。全黨全國那些本無正確革命理想的靠黨吃飯的上下各級領導，誰不心領神會這一個把「毛」剝掉，「皮」可絲毫無損的暗示？從此，大陸社會上，知識分子可有可無的社會意識開始滋長。「知識分子比滿腳牛屎的工農骯髒」、「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有害」……等謬論泛濫，直到六、七十年代，把知識分子排到被專政對象的末位——「臭老九」。

回過頭來看中國知識分子，自秦焚書抗儒，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國封建主義上升期的自由學術之風已受壓抑，一般讀書人的確只有依附專制的統治者才有出路。春秋戰國時的墨家，早已後繼無人了。但他們急公好義的學說和凜然正氣的精神，部分溶入儒家，流存在少數知識分子的精英之中。每當國家民族的危難關頭，人民百姓被暴君權臣蹂躪之際，便總有一些這樣或那樣的錚錚烈士站出來為民請命。他們或整頓朝綱、或力挽狂瀾、或領導抵禦外侮、或號召群眾革命，儘管因歷史局限，他們的思想行動未盡正確，但絕不是毛的描繪所能污蔑的。遠的不說，就近百多年，中國被世界各帝國主義入侵，瀕於滅亡，衆多中國知識分子為探求祖國生存與復興之道，從出國留學，吸取泰西、東洋較後進的科學文化到變法維新、到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到北伐、到抗日……那一役不是以知識分子為前導及中堅？中國共產黨從創立到奪取政權成功，難道知識分子起的作用小嗎？

中國共產黨人一向奢言是他們解放了中國人民。但幾十年事實證明，毛澤東及其一小撮

特權擁有者，掛共產主義之名，却是繼中國歷代專制統治者的衣鉢，長期施行愚民奴民政策，以達其定於一尊的目的。他們心知這一切必遭中國知識分子的反對。即在中共黨內，凡是稍有良知及略懂解放革命真諦的黨員（包括很多算不上知識分子的工農兵在內）對他們這一小撮人的作爲及「毛澤東思想」，都深感不滿。只要廣大的黨員知識化，他們依靠欺騙宣傳和「愚忠」管制的統治必將徹底破產！正是出於這一「恐懼感」，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壓根兒就未信賴過！而是借一次又一次莫須有的政治運動，要把知識分子變成「馴服工具」。

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沒有經過「延安整風」的洗禮，在四、五十年代，一廂情願地信賴中共，不少人還捨棄原在海外較好的生活和工作的回國，積極主動參加及冒險幫助中共的「革命」，擁護他取代蔣介石的政權，以爲可給人民帶來幸福。到頭來，却在誠意提意見後掉進「陽謀」的陷阱，然後陸續明白過來，無可奈何地接受被「剝」的命運或乖乖地附在「皮」上作裝飾。

反右以後到文革，二十年，一班「根子正」、「出身紅」、無知少識的工農及「立場穩」、「黨性強」的知識分子，「高舉緊跟」、自下而上、逐層篩選，攀上了各級擁有特權的地位。成了名符其實的「特殊材料製造的人」。由他們主宰着大陸十億同胞的命運，直到今天。這些人，對鄧小平的改革政策，基本態度是：（一）趁開放和經濟改革，利用手中特權，狠狠地撈一把；（二）或明或暗地拖延與反對有可能取消他們特權的政治改革；（三）發現改革中有任何缺點錯誤，便祭起「毛澤東思想」的法寶，向改革派狠狠地倒打一耙。是以幾年來，什麼

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鎮壓學生運動、加緊箱制海外留學生、開除劉賓雁……等、繼續拘禁政治犯、限制新聞輿論、不准出版自由、宣佈「中國之春」爲反革命刊物……等，其矛頭無一不仍舊指向知識分子。

以上的歷史和現實，大陸人民都可見證。一向以說真話見稱的吳祖光先生，爲什麼隱瞞了這一切真相呢？他的被勸退黨也算關係正常？

我認爲，這正反映了目前大陸中年以上知識分子的十分矛盾複雜的心情——他們從善良的願望出發，忍不住要說真話，却又不無餘悸地不敢把真話說盡。因爲，共產黨和國家數十年出現的弊端和近十年的「改革」，他們在三十年前已向中共進諫過；中共不聽，反要加罪；三番四覆的折磨，死者已矣，苟存殘生者，莫不對中共死了心！可除了中共，別無選擇。幾十年，中共幹了多少錯事，黨內出了多少壞蛋，人民都只能低頭默默地忍受。知識分子把一切看在眼裡，却無所作爲。看看只有「官逼民反」一途了。祖國與人民何堪？唉！

鄧小平經歷過「教訓」之後復出，他審度時勢，思慮過黨的前途，不得不順應民情，毅然宣佈「改革」！情況已如上述。

「改革」的十年過去了，到了今天，像吳祖光先生這樣有敢冒死進言的主客觀條件的知識分子，在大陸已是鳳毛麟角，而他批評時局，仍只達到如斯限度。一句「中共對知識分子有恐懼感」，其前後却要違心賠上多少假話，說是「爲尊者諱」也好；說是「明哲保身」也好，「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恐懼感」，已盡在不言中。

中國共產黨人們，你們覺得怎樣？！這一種互相恐懼的關係，你們願意儘早結束嗎？

# 林口 印刷公司

彩色報紙 各型雜誌 宣傳刊物 大型海報

☎ : 718-937-5141

718-937-5301

🏠 : 50-22 23 ST.

L.I.C., N.Y. 11101

LINCO PRINTING CO.

# 訪問羅大衛

肖昆珠

羅大衛，美國某公司常駐中國北京代表，

四年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認識了他，大衛為人敦厚、誠懇，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此後，我們常在一起談論一些我們都感興趣的問題。大衛曾經短期訪問過中國，西安的秦陵、桂林的山水、北京的故宮都給他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告訴我，他很愛中國，希望有機會能更多地瞭解中國。三年前，他奉派常駐北京，他深入瞭解中國的願望實現了，他帶着十分興奮的心情飛去中國，一去就是三年。平時大家都很忙，很少通訊。前天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他已經從中國回來了。如果不是他說話時帶有很重的南方口音，我幾乎已經聽不出是誰在跟我說話了。他約我去他住的酒店聊天，因為三年前去中國時他已經把自己的住房賣掉了，現在臨時住在酒店裡。兩天後的一個下午，我應約去看他，三年不見，他似乎更加深遠了。坐定之後，自然而然地談起了他的中國大陸之旅，此時他的眼神突然有些凝重、憂郁，與他三年前臨行時興奮的光芒成了明顯的對比。他是個基督教徒，談話也就由此開始了。

問：「在北京您常去做禮拜嗎？」

答：「去，常常去。北京現在開了六、七個教堂，我常常去崇文門教堂，每次人都很多，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中國有很多青年人去教堂。」

問：「所以您就可以體會出中國大陸的宗教自由了。」

答：「不」他堅定地說：「據我瞭解，這些公開開放的教堂，都是受到中共政府控制的，教堂裡設有中共的黨支部，有的牧師就是黨支部書記。由於他們常常背離上帝的旨意，按照共產黨的宣傳解釋聖經，所以有的教友就不願意去這些受中共控制的教堂敬拜神。因而教友們常自動組織家庭聚會，中共規定，凡是宗教活動必需在教堂裡進行，在家庭裡聚會是違法的，所以大家又叫這種聚會處為地下禮拜堂。」

問：「你去過地下禮拜堂嗎？」

答：「去過，」顯然他開始有些興奮了，「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參加上海一家地下教堂的活動，那個地下教堂就是王明道牧師的家。」提起王明道牧師，他流露出崇敬的心情說道：「你認識王明道牧師嗎？他是中國一個很有名的傳道人，五十年代中共以反革命罪名把他逮捕下獄，監禁了幾十年。中共推行開放政策以來，在國際宗教組織的營救下，一、二年前中共才把他釋放。釋放後，中共要他到教堂裡去擔任牧師，但被王明道先生拒絕了。王牧師現在在家裡傳道，每到禮拜日，他那個小小的家到處坐滿了人，樓梯上，走道上，窗口上到處都是人，我真怕那個小樓會被擠塌掉。」

，」他詭譎地笑了一下。

問：「中共取締家庭禮拜堂嗎？」

答：「當然，據我所知就有好幾個家庭禮拜堂的負責弟兄被捕入獄了。許多兄弟、姐妹都為王明道牧師禱告，神聽了我們大家的禱告，保護了王明道牧師，所以他能在家裡傳道而不受騷擾。」他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有的朋友認為中共現在推行開放政策，要在國際上建樹一個民主、開明的形象，所以他們不便於過於強硬，在短期內再次逮捕王明道牧師。但無論如何王牧師的處境是很困難的，願神祝福他。」

問：「聽說中國大陸已經公開出售聖經了，是嗎？」

答：「不！中國大陸的聖經不是在書店裡出售的，而是在教堂裡出售，買聖經的人要到教堂登記姓名、住址、工作機關、政治面貌，等等，以便公安機關隨時查考。許多基督徒和慕道者都很希望從外國朋友那兒得到中文聖經，而不願暴露自己的身份，以免日後遭到麻煩。我途經香港時，買的一百本中文聖經，都已經送完了。」

談到這兒，他大概意識到我的肚子在唱「空城計」了，於是同他夫人一塊到樓下餐廳裡共進晚餐。按基督教的禮儀，飯前要禱告謝飯，謝飯完畢，開始喝湯。他太太說在中國上餐館吃飯時我們不敢禱告謝飯，我們怕遭到麻煩。席間我們的談話在繼續着。

問：「您對中國大陸的印象如何？」

答：「中國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她有那麼悠久的歷史，我們美國才有這麼短一點點歷史。」他習慣地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做了一個比喻「短」的動作。「中國人民很好客，對我們非常友好，我在北京有許多中國朋友，但是



我們聯絡起來比較困難。首先，我們不能打電話聊天，因為每當我撥動電話之後，我就會清楚地聽到錄音機開動的沙沙聲。其次，我的中國朋友也不方便來我的住處看我，我住的公寓大門前有解放軍守衛，沒有PASS的人不能進入大門。訪客要在傳達室填「會客單」，然後由工作人員打電話通知我們到大門口去把客人接進來，真是太麻煩了。最使我頭疼的是裝在電梯裡的錄音機，有時我朋友進來時電梯裡的錄音機並沒有打開，等我朋友離去時錄音機已經打開了。為了避免麻煩，好多次我們不得不走樓梯下到底層，真是一個很好的體育鍛煉。說着他聳了聳肩，雙手一攤，做了個無可奈何的姿勢，「我住的是一座高樓，在我住的這座樓的側方有一座小樓。」說着他拿出一張照片說明這兩座樓的方位。的確這座小樓佔了極為有利的地形地勢，大樓中的一切活動都能一目了然。大衛指着照片不無有點情緒地說：「瞧，這裡有幾扇窗戶，它們一天二十四小時輪流地亮着燈，裡面人影幌動，隨時監視着我們這座樓的一切動靜，簡直使我頭疼極了。幸好，三年來尚未在我的住房裡發現裝有竊聽器，否則我真該發瘋了。」

羅太太是北京一家研究所的義務英語教員，她一直聽着我和大衛的談話，這時她插嘴道：「我的學生常常想來看我，以增加他們說英語的機會，但是他們不敢常來我家，怕惹出麻煩來。我們常常在上課時約好，哪一天，幾點鐘在地壇公園或天壇公園裡見面，這樣比較安全一些。而且我常常從不同的大門進入公園，以免引起便衣警察的注意或跟踪。」

說到他們在北京的家，羅太太有點激動地說：「我們租的這套公寓在建國門外，租金比美國同類房屋的租金還要貴一些，我們的房間

是帶傢俱的，但我們搬進去時，沒有地毯，也沒有空調機，甚至有的電插銷也被拆除了，到處都很髒。原來前一個住戶搬走後，管理人員就把地毯、空調機和一些容易拆卸的裝備都拆掉了，很可能是搬回他們自己家裡去了。我們搬進去之後，就立即到香港訂購空調機，但在空調機收到之前，我們在百華氏度以上的高氣溫下着實吃了不少苦頭。地毯也要重新鋪過，鋪地毯時工人們一邊工作一邊抽煙，我真擔心他們不小心會把地毯燒壞。煙吸完後，工人們隨手把煙頭在地毯上按滅，扔在地毯上。我着實心疼，只好找來一個罐頭盒，請他們把煙頭扔在盒子裡。」

羅太太的話匣子打開之後，也顧不上再吃飯了，滔滔不絕地說道：「我家請了一個保姆，北京「外國人員服務處」每月收我們三百六十元人民幣，而保姆本人每月只拿到九十元人民幣的工資。」大衛插嘴說：「我有個中國朋友在世界銀行工作，銀行每月付他薪水一千美元，而他本人每月拿到的工資只合美金三十元。」羅太太繼續說道：「我的保姆有個孩子上小學，她自己的爸爸媽媽還要靠他們養活，她先生是工人，收入不很多，所以生活比較緊張。她做事很認真，也很勤快，我們相處很好，她常常給我們包饺子吃，為了感謝她的好意，每次她替我們包饺子，我都額外送給她四、五元人民幣。」羅太太頗有點驕傲地說：「我們樓裡的保姆們常常集在一起抱怨工資太低，物價漲得太快，住房太小……他們以為我聽不懂他們說什麼，其實我全聽明白啦！」憑良心說，羅太太的中國話說得並不高明，至於她的聽力如何我倒沒有測試過。

我繼續問道：「北京的生活費用怎樣？」羅太太有點不太高興地說：「很貴，北京

友誼商店裡的肉食品，在我們去中國之前已經漲了兩倍，我們去後不久又漲了兩倍，聽說最近還要漲，所以物價很貴。我們只好常常到自由市場去買食品，有些自由市場外國人去的不少，那兒的物價就便宜一點，現在日壇路那兒也有自由市場了，因為靠近外國人住的公寓，很多外國人去那兒買東西，所以也就不便宜了。有一次我買向日葵子，這麼多，她把兩隻手合在一起，窩起來像個小碟似的「要我兩元人民幣，我說你賣給中國人只要兩角錢，為什麼要我兩元錢，你道我發瘋啦！」她很欣賞她這句中文說得很得體，現在提起來還很得意。羅太太接着說：「一、二年前在毛紀念堂附近開了一間中美合資經營的肯塔基炸雞店。兩塊炸雞，一碟土豆泥（還有點什麼我忘了——作者），收人民幣七元，也不便宜呀。所以我們在北京時的生活費用大致同在美國時的支出相似，但比在美國麻煩多了。」

問：「您對中國的工作效率有什麼印象？」

答：「OH, NO, 太差勁啦！大陸的機關辦事效率普遍都很低。他們互相推卸責任，大陸叫作「打太極」。有些事完全可以在一天之內辦完的，但常常要拖好幾天，一個機關可以解決的事，他們常常推來推去非要你跑十個二十個機關才能辦成。但如果你送點家用電器或紅包，事情就好辦得多了。」羅太太又插嘴道：「有的中國人並不太願意和外國人打交道，有一次我去友誼商店想買件毛衣，售貨員小姐頭也不抬說「沒有」。我只好離開櫃檯，但我並未死心，等一會兒我又折了回去，正好換了一位小姐在那兒，我問她有沒有毛衣，她說「有」。大陸售貨員就是怕麻煩，說聲「沒有」就什麼事也不用費了。」

問：「您們在北京常常到外地去旅行嗎？」

答：「有，但大部分都是因為公事。否則我們寧願留在北京，因為中國大陸的交通太差了，飛機和火車票都很難買，即使您提早訂票，到時候也不一定能拿到。有一次我去西安辦事，回來時在西安機場整整等了三天才登上飛機，最使人頭疼的事是機場的服務員好象什麼都不願告訴您，您問他什麼時候可以飛，他說『不知道』，您問他出了什麼問題，他說『不知道』。您問他我回酒店休息一下行不行，他說：『待會飛機飛掉了，誰負責？』特別是這一年多來，大陸交通事故很多，飛機墜毀、火車相撞、輪船翻掉，尤其是去年上海兩列火車相撞，死掉許多日本青年，從那以後，許多外國人都很怕在大陸旅行，都怕因交通事故喪身，還不如呆在家裡算啦！」

甜食來了，我們一面吃着草莓冰激凌和蘋果餅，一面繼續聊，我說：「看來您這次旅居中國三年，實現了您深入瞭解中國大陸的夙願，這次您可以寫本書囉。」

答：「是的，我要告訴我所有的朋友，讓他們對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有一個全面的瞭解，但目前我還不想寫書，因為我還有可能再去中國大陸，我不想由此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時間過得真快，告別大衛夫婦出來時，已經滿天星斗。我把車速開到七十邁往家趕，因為明早公司裡還有一個重要的會議。高速公路上一依然車水馬龍，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中國呀，中國，什麼時候您才能不以您祖先的成就——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傲視世界，不用只以長城、秦陵、地下宮殿……招徠世界觀光客。而是以您自己的當代經濟成就，文化發展，高效率的工作方法和優質服務來吸引四海好友呢？我盼望着！

## 有獎徵集大陸留學生新通訊錄

新的學期開始了，各校迎來了新出國的同學，並將編輯新的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通訊錄。本刊特將有獎徵集這些新通訊錄，以利於與各校留學生們的交流。如有可能，本刊將嘗試編纂全美、全日、全歐、全澳中國大陸同學總通訊錄。

- ▲凡寄本校全套的新通訊錄者，本刊贈寄過去兩年中國之春，並將贈閱中春一年；
  - ▲提供不了全套通訊錄也無妨，凡提供十名以上大陸留學生通訊處者（寫出姓名和院系），獲贈未來半年及過去一年中春；五名以上者，獲贈中春過去半年及未來半年。
- 感謝您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援！

中國之春編輯部

### !! We Need Computer Programmers In Australia !!

We have openings for SOFTWARE ENGINEERS. We offer competitive salaries and stock options.

- M.S. or higher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 Unix/C experience required; DBMS & network experience a definite plus.
- We will help you immigrate in Australia.

We have only a few positions open so respond today. Send your resume to:

Job Opportunity, P.O. Box 967, Boulder, CO 80306.

# 制度與人性

王炳華



二百年前，美國開國元勳們在費城聚會，制訂了光輝永照的美國憲法，奠定了民主制度的基石。

在確立美國的民主制度時，制憲先賢們充分尊重了人性。例如，他們當時認識到，司法必須獨立，法官判案必須公正。而就人性而言，影響法官公正的因素可能有二。一是法官怕丟官位。如果有人控告政府首長而政府首長有罷免法官的權力，那麼，法官斷案時，就免不了有恐懼感，就會自然地偏向政府官員。二是法官可能愛財，如果打官司的某一方用金錢賄賂法官，法官說不定經不住銀彈的攻勢。

爲了防止這兩種可能，制憲先賢們想出了兩個辦法。一是法官終身制，一旦行政首長提名法官而被議會通過，法官的職務就是終身的，行政首長無權罷免法官。二是法官高薪制，就是給法官訂下很高的工資，不但使法官在生活上沒有後顧之憂，而且能夠頂住金錢的誘惑。當然，倘若法官胡作非爲，議會仍有彈劾、罷免之權。

可以看出，民主制度的設計，其出發點是尊重人性的，它承認人性的弱點，從而想出辦法抑制人性的弱點。

中國的泛道德主義者就不這樣考慮人性了。他們提倡用道德、而不是用制度管理人群。泛道德主義者主張，凡是做官的人，都應該是道德高尚的人，應該兩袖清風，視金錢如糞土；應該爲真理而不在乎犯上、不怕丟官。包公，就是這種觀念塑造出來的理想模型。

現今，中國大陸殘酷的現實已擺在我們面前：中共泛道德主義者們建立起來的官僚隊伍是有史以來貪污最厲害的。應該說，中共社會主義制度失敗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其不尊重人性。

因此，我們在設計一種制度時，應該充分尊重人的本性。使得人類本性善良的一面得以盡量發揮，而人性醜惡的一面則被最大限度地壓抑。

我們在專制和民主兩種制度下生活過的人，對制度與人性的關係，有着深刻的體會。讓我在這裡試舉幾例：

例一：懶惰和勤奮是人的一種本性的兩個方面。在社會主義大鍋飯制度下，由於幹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歷來以勤勞著稱於世的中華民族，逐漸變成了一個懶惰的民族。然而，當中國人來到自由社會時，當農村實行包產到戶時，就勤奮起來了。

例二：誠實和說謊是另一種人性的兩種對立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一貫以誠實爲驕傲的中國人，大都養成了說謊的習慣。因爲，你不說謊就無法生存。譬如，開會時，領導問你擁不擁護四個堅持，在公開場合，人們大都不願說個「不」字，以免惹禍上身。久而久之，人們發現了一個規律：誠實的人危險、吃虧；說謊的人安全、佔便宜。於是，說謊脫口而出，成了習慣。到了民主國家，

住久了以後發現，民主制度是一個講信譽的制度。沒有信譽，就辦不了信用卡，在銀行就貸不了款，就找不到好工作，就沒有升職的機會。在這種制度下，人們也就不敢說謊了。

這樣的例子還可舉出很多。前些年，紐約市在夜間停過一次電。剎時間城市一片漆黑，有一個區的住民很多竟瘋狂地搶起別人的東西來。這個區平常是個不錯的區，怎麼一下子變成了強盜區呢？原來，停電後，有一小撮人乘黑鬧事，打劫了鄰近商店。被洗劫一空的人也被逼急了，在漆黑一團，誰也認不出誰的環境下，他們也萌生了「不搶白不搶，不搶無法活下、搶了查不到」的念頭，連鎖搶劫事件發生。正在混亂時刻，突然一片光明，恢復了供電。人們立即扔掉了搶的東西，回到自己的住宅，做起了正人君子。顯然，人有做君子、也有做

強盜的本性。在光明的制度下，多數人可為君子；在黑暗的制度下，多數人可變成強盜。

最近，我走了十二所大學，和大批留學生、學者深入交談。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某些剛從國內來或暑假探親回來的留學生，對國內形勢都大搖其頭：整個社會在腐爛，簡直是無官不貪，大家能坑一筆就坑一筆，能賺一票就賺一票，辦事完全沒了章法，國已不國了。大家都感到，人心已經壞了，社會的大危機已經來臨。面對這種情形，你是怪廣大的中國老百姓呢，還是怪那個不合理的制度？

制度與人性的關係，在日常生活小事中也常常碰到，并不只是限於社會政治制度的確立。例如，中國之春雜誌社（英文版）請人翻譯文章時，就碰到了是按小時計酬還是按字數計酬的問題。按小時計，文章翻譯的質量就較好

，但譯者費時則較多；按字數計，譯者速度就較快，但質量則較差。如何使譯者的工作既快又好？我想，這是每個管理計時和計件工的經理都感到頭痛的難題。

人的本性具有雙重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或者說，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麼，建立政府、確立制度是沒有必要的，因為人人都能自覺地管理自己；如果人人都是魔鬼，建立政府、確立制度也是沒有必要的，因為，任何政府和制度都建不起來。

民主運動的目的之一，是在承認我們都是人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合理的、合乎人性的社會制度，以便在這個制度下，人的天使一面得以盡量發揚，魔鬼的一面則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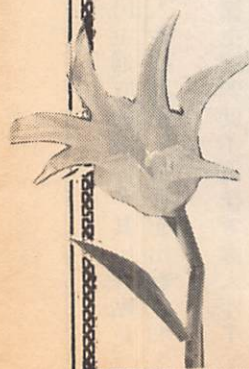
# 夢之天春

## 流螢

我，依偎着大地。  
望着遙遠的蒼穹，——朦朧，幽深。  
那，可藏着夢神？  
藍天飄曳白雲，  
縈繞托我開。  
呵，一隻素身大雁，  
載我穿太空。  
高山顯出起伏，  
江河宛如銀帶。  
一陣風，  
清新，溫暖，還有芳香。  
一陣風，  
一絲涼意，幾滴雨點。  
又一陣風，  
怒吼着，捲起冰塊。

雁，化為雪花，  
輕盈飛舞。  
而我，却冰冷，沉重。  
旋轉着，  
向下！  
再向下！！  
無底的深淵，等我消亡。  
不！我要飛！  
黑暗的地獄絕非我的歸宿！  
為了飛的自由，掙扎，  
我將開騰。  
冰海雪霧中誕生了，  
綠的精靈。  
她冉冉上升，  
鳥瞰大地。

奮飛的心緒，  
激盪着年輕的胸懷。  
飛，四海雲游。  
回答遠方死寂的呼喚，  
帶去綠的種子，  
讓它們隨着生命的節奏，  
一切搏動。  
我醒了，  
瞥見石縫裡的青芽，  
曲折了身體  
向着陽光萌發。■



# 對「我的幾點看法」的幾點看法

## ——與遲來先生商榷

先到

讀了「中國之春」第六十三期遲來先生給中春的公開信，筆者不敢苟同，願與遲來先生進行商榷。

### 也談否定之否定

首先，遲來先生談到他的幾位留學生朋友都對「中春」持否定態度。而他們這些人是「有頭腦的」、「辨別是非能力是很強的」，也希望「中國早日強盛，早日實現民主」云云。言外之意，他們「否定」中春是有道理的，而中春應該好好反省。

說得通俗些，民主與獨裁之爭，就是「一言堂」與「群言堂」之爭。拋開誰是誰非不談，既然倡導民主，就需要有一個自由論壇。人人都有平等的權利自由地發表個人意見，進行自由競爭。不能因為「有頭腦」，就可以壓制別人的言論。也不能因為「辨別是非能力很強」，就可以要求別人改變自己的觀點。民主的內涵就是包容，人人都有為自己的權益辯護的權利，而不只少數人才有這種權利。因此，不

能因為有人肯定中國之春，中國之春才有生存的權利；也不能因為有人否定中國之春，中國之春就沒有生存的權利。也許遲來先生會爭辯，說他並沒有否定中國之春的存在，而是希望中國之春改進提高。對此，筆者仍然不以為然。北美大陸雲集了兩萬多名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其中藏龍臥虎，各種優秀人才不乏其人，所謂恃才高傲者亦并不罕見。對於民主的認同程度，各人意見并不一致，這本是正常現象。既然是民主，就當然不能強求統一，這也就是為什麼廣大人民群眾要求的民主與中共當局鼓吹的所謂「民主集中制」，實為「獨裁統治」的「民主」大相逕庭的緣故。中國之春是中國民聯主辦的刊物，只是民主園地中的一朵小花，當然有其自己的特色。你不同意中春的觀點，大可爭鳴一番，又何必要強人所難，指責中春這也不是，那也不對，非改進不可，否則前景不妙云云。筆者就認為中春沒啥了不起，本人對中春的觀點，也是有褒有貶。但本人絕不敢要中春改弦更張，本人也以為能在中春讀到各種觀點的爭鳴文章為快。中春既提供了一塊

可供各種觀點爭鳴的民主園地，同時又代表中國民聯的立場。如果有人否定中春，我則持否定之否定的觀點。因為你可以不喜歡聽別人講話，但你沒有權利堵住別人的嘴或要求別人改變講話的內容，不知遲來先生以為然否？

### 舊帳不要重算，新帳又作何解釋

誠如遲來先生所指，中共掌權以來政績如何，大家自然心知肚明，因為親身領教過嘛！說得客氣些，用「實在不敢恭維」幾個字來形容，大概不算過分。因為中共名聲太壞，所以九七大限愈近，數百萬香港同胞猶如驚弓之鳥，愈惶惶不可終日，這就是一個例證。最近和美國學生一起看了獲九項奧斯卡獎的「末代皇帝」，其中文化革命一段，雖親自經歷過，現在想起來仍然不寒而慄。可悲的是現在看來荒謬絕倫，當年却也跟着瞎起哄，不以為耻，反以為榮，不能不說是空前絕後的民族悲劇。中春雜誌上登的關於大躍進、文革的悲慘故事，提醒當代中國人不要忘記過去，挖掘產生這種悲劇的政治、社會、文化、歷史淵源，是對「

左「僚」的控訴和對民主、自由的向往，這絕不是所謂遮遮掩掩、小罵大幫忙的「傷痕文學」所能比擬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共勉強容得下「傷痕文學」，却「寧可」中央日報「在北京發行也決不許『中國之春』在大陸登陸」的原因所在。至於「國內來的人對此反感」，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對此反感？除了少數共產黨高幹或政工人員心中有鬼對此反感以外，一般老百姓無任何理由對此反感，了不起憶起辛酸往事罵一聲娘而已！這些都是共產黨的傑作，一般中國人是不必為此負責的，至少不必為此負主要責任。

遲來先生又稱改革是「史無前例」，是「摸索中前進」，因此錯誤在所難免，應該「爲之出謀劃策」，而不應該「拆台」。如果此說能成立的話，那麼中共掌權三十多年來的劣績，如反右，大躍進，文革，都可一筆勾銷。因爲哪一次運動不是「史無前例」，哪一次運動又不是在「摸索中前進」與「沒有前人留下的經驗供借鑒」呢？僅僅因爲「史無前例」，就可以爲所犯的錯誤辯護嗎？事實證明，中共決不是「初犯」，而是「慣犯」。自中共掌權以來，中共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屢犯錯誤，不僅不改正而且拒不承認錯誤。每一次犯錯誤都有借口，不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一點而已」；就是「大躍進主觀上是好的，只是性急了一點」；再不就是文革罪惡深重，可還有個「四人幫」墊底。而那一百萬右派的奇耻大辱、家破人亡的悲劇，大躍進造成餓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慘景，和那文革給國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都不了了之！難道人民群眾只能逆來順受？批評一下鄧小平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就是「拆台」？至於「出謀劃策」之說，中共要是能容納不同意見，「中國之春」就不

會被打成反動刊物了，劉賓雁也就不會被開除出黨了。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錯誤已經容忍到最大限度，早就「超負荷」了，請問遲來先生怎樣才算「善意地指出他們的錯誤」呢？中國之春只是在刊物上與中共講理，沒有對中共犯下任何罪行，應該算是善意了吧？反而是中共將楊巍下獄，吊銷胡平的護照，大罵王炳章，將民聯打成反動組織。廣大留學生應該算是無辜的吧？中共關於留學工作細則出籠，引起留學生群起而攻之，可見你善他不善。唯一的例外是做「花瓶」的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胡作非爲一聲不吭，這樣的民主黨派即使出謀劃策也難有作爲，說了等於白說。中共如果離這樣的民主黨派愈近，就離民主的宗旨愈遠。

遲來先生又稱，「如果希望改革成功，就應當與改革者配合，而不是給他們製造麻煩。」還有所謂「中春」的所作所爲，的確是讓改革者感到頭痛。「這裡需要澄清的是，中春究竟作了些什麼？什麼叫作「製造麻煩」？就筆者了解，中春只不過沒有與人民日報的觀點保持一致。人民日報翻來覆去講形勢大好，越來越好，還有加強黨的領導等陳詞濫調。而中春則提倡「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多元」。如果說中春只是發表了一些呼籲「自由、民主」的文章和批評中共的所作所爲就是「製造麻煩」，那麼要想不「製造麻煩」，中春似乎只有每星期翻印人民日報了。改革是否成功，取決於中共的政策是否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要使政策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中共就不能一意孤行，而是要傾聽人民的呼聲，要發揚民主。遲來先生的意思好像中共一心要改革，造福庶民，而中春則破壞改革，干擾「偉大戰略部署」。因而認爲，上頭自有錦囊妙計，小民百姓只要俯首聽命於中共的擺布，改革自可

成功，中共自然會將庶民百姓帶入人間樂園。何必多嘴多舌，自尋煩惱！否則壞了改革大事，大家都有苦頭吃。這就像「你給老子老實點，要不老子揍你」的無賴口氣一樣無理。明明是打人的不對，却責備挨打的人不對，因爲他不老實，而不是打人的太霸道。面對中共的許願，只有白痴才會相信。因爲一個人如果上了太多的當，他就絕不會再相信說謊者。幸福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爭取來的。改革成功不是中共恩賜的，而是要廣大人民群眾努力爭取才能得到的，也許還需要數不清個楊巍獻身才能得到的。春種秋收，流下多少汗水，才能獲得多少收成。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我想遲來先生不會不知道吧？「三信危機」不是製造出來的，而是共產黨長年累月的倒行逆施所帶來的後果。結論是：人民群眾不能再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共產黨，而是要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就這一點而言，中春不論「算舊帳」（登載大躍進、文革的悲慘故事）或「算新帳」（批評鄧小平及其他中央領導人）都合情合理，順其自然。「算舊帳」是提醒老百姓警惕中共不要故伎重演，「算新帳」是提醒老百姓監督中共不要再犯錯誤。豈不知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積累小錯可鑄成大錯。由此可見，批評一下鄧小平及其他中央領導人讓他們警惕不要步毛澤東的後塵又有何不可？事實上他們的所作所爲值得批評的太多了，中春也不過才傷其九牛一毛而已，又何必對中春大動肝火，大加圍剿呢？！

### 大陸的民主氣氛真的已經濃多了嗎？

遲來先生不同意中春關於大陸無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反對刊物的觀點，而認爲大陸「

是在向言論、出版及辦刊自由這個方向走」，最妙的是，遲來先生還要加上一句：「儘管步伐還很慢」，有多慢？遲來先生沒有說。作為讀者，可以理解為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一萬年，或永遠。如果等個十年，大陸就有言論、出版及辦刊自由，那就等吧，不必抗爭。要是等二十年呢？一百年呢？抑或更長？等到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呢？這就像將一個人關入囚籠，告訴他，「老老實實呆着吧，明天就給你自由！」但明天又有明天，什麼時候才是明天呢？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是最起碼的自由，等於民主的ABC。連這一點自由都不給，還奢談什麼民主？我們不要等，我們不要明天，我們今天就爭取到有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連這一點都不具備，怎能同意遲來先生所說「大陸的民主氣氛已經濃多了」之說？也許遲來先生認為「官報」上登一些「揭露陰暗面、不良作風」的報導就是民主氣氛濃多了的表現。遲來先生怎麼不想一想這些文章是官方記者寫的，登在官報上。為什麼不能由民間記者來寫，登在民間刊物上呢？自己不能監督自己的，要靠外人來監督。官僚是不能靠他的幕僚來監督的，要靠社會輿論來監督。試問一個官方記者在官報上批評自己的長官，如果不想學劉賓雁，就只有避重就輕，虛與委蛇一番。這樣的批評又有什麼用？現在報紙上雖然也登一些揭露陰暗面的文章，黨風依然每況愈下，越來越壞。假公濟私，損公肥己，貪污腐敗，簡直泛濫成災，無人能制止得住。這也部分歸於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結果。僅靠官報上那點不痛不癢的揭露文章是形不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來制止不正之風的。美國總統如果說一句不中聽的話，社會輿論完全可能迫使其丟掉烏紗帽。鄧小平昨天一高興許願香港資本主義制度

五十年不變，若明天一不高興再減四十年，又有誰敢說一個「不」字？沒有法律保障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大陸的民主行情還是不能被看好。這就像甲家庭父親打了兒子後一聲不吭，乙家庭父親打了兒子後說一聲對不起，你決不能因此而判定乙家庭比甲家庭民主。真正的民主家庭是每個家庭成員具有同等的權利，父親沒有權利靠打兒子來解決爭端，就像兒子沒有權利打父親來解決爭端一樣。不以父貴，也不以子賤。至少在目前來說，說大陸無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反對刊物比說大陸的民主氣氛已經濃多了更接近事實。不知遲來先生意下如何？

### 是否中春太不知趣？

遲來先生的第三點其實也和第一點差不多，主要還是說中春罵中共罵得太多了一點，為什麼總是「千方百計尋找中共的錯誤或以往舊帳來指責或罵」呢？為什麼不頌揚中共「光明的一面」呢？因而「這樣做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論，中共罵中春豈只更甚於中春罵中共千萬倍，又有誰會替中春打過一聲抱不平呢？不僅中共罵中春，國民黨也罵中春，海外人士右的罵中春太左，左的罵中春太右，罵的中春裡外不是人，又有誰想過一下公平不公平呢？筆者不好唱歌，唯一會唱的歌就是「東方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那幾首。因為會唱過千遍萬遍，所以至今不忘。共產黨強迫老百姓歌功頌德，儘管他們功量不大，德行亦不高，老百姓稍有微詞就會禍從天降，九族六親亦會牽連，遲來先生認為公平不公平呢？因為中共「光明的一面」已經被頌揚得太多、太多，所以偶爾

批評一下也不能算是不公平。筆者來美前剛好趕上黨委書記訓話，傳達中央緊急文件，內容主要是不准大學生遊行；二是王炳章叛國投敵，投靠蔣幫，即將出國的人員都不許和他攪在一起，聽得本人毛骨悚然。再看上海市公安局公告，哪一位讀了後不心驚膽顫。中共視中春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遲來先生認為公平不公平呢？如果中春批評中共是實事求是，那麼不可謂之「罵」。如果中春對中共只是造謠中傷，中共也決不會對中春動那麼大肝火。遲來先生認為中春對中共的批評是言之有理呢還是造謠中傷？如果是造謠中傷，中春就不可能擁有那麼多熟知內情的國內外讀者和撰稿人。想必遲來先生不會同意此說。如果是言之有理，中共更應該開過則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作為權勢如日中天的中共大可不必別人來為它打這個抱不平。

筆者寫此文，也曾想過有無被打成替中春說話的嫌疑。但筆者一介書生，既非民聯成員，與中國之春也無什麼瓜葛，不怕瓜田李下。其實筆者對中春並無什麼好感，因為筆者才疏，志却大，正打算網羅人手創它一個「中秋」雜誌，與「中春」爭個高低。所謂「同行是冤家」，自然對中春恨之入骨。但如「中春」雜誌在中共的高壓下辦不成，筆者也休想再辦「中秋」雜誌，這就是為什麼「一人有難，大家幫忙」的道理。

中春雜誌可以一無是處，但它有存在的權利。誰都可以批評中春，誰都可以不同意中春的觀點，但中春應該有其自己的特點，而不以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果我們不愛護中春，有一天中春終於上絞架時，我們大家離上絞架的那一天也不遠了。直人直語，還望遲來先生海涵。

# 波蘭地下活動組織的演變

(一九三九年—一九八六年)

倫納德·蒲魯塔 (LEONARD PLUTA)



## 一、導言

共產國家對付地下組織總是成功的。憑藉着嚴密的特務系統，各共產政府都能滲透到地下組織內，逮捕它們的領袖，最後將整個組織搞垮。波蘭、匈牙利、立陶宛、烏克蘭、愛沙尼亞諸國的情形無一例外。只要看看這些國家給予特務系統的龐大權力和資源，即可思過半矣！況且，共產政權對於政治、經濟、社會、新聞機構的控制無不嚴密；戶口、糧票、通行證等等措施，更加控制了人口的流動。這就使得地下組織的出現和生存難乎其難。所以，納粹控制下的德國沒有出現過地下組織，其他共產政權下的國家也沒有秘密團體，唯一例外的是波蘭。波蘭在一九八一年前將近四十個年頭內不曾有過正式地下組織，直至八一年才出現。出現後不但能生存，而且組織更加良好，更為有效，更為嚴密，雖然也歷經過政府的多次逮捕、整肅、甚至判刑入獄。

現今波蘭地下組織的存在，自有其特殊的原因。第一、它有着成千上萬人民的參與；第二、它的運動方式是和平的，幾乎在五年存在歲月中，除了一次礦工暴動和一群少年意外擊

斃一名警察外，不曾有過暴力恐怖活動；第三、它的發展正在歐洲較為和平之際；第四、它的組成和計劃都有長遠的目標。

這樣一個龐大的地下組織，要想在共產制度下生存和發展，就必須有某些基本條件。第一、政府與人民間的距離，大到不是警察可以有效滲透的地步，因此警察所佈置的內綫和情治機關所安插的奸細，不易在地下組織潛伏，而且也深為廣大人民所不齒；第二、整個國家人民不喜歡政府，因此相當多的人全力或部分秘密參與活動；第三、組織自有一套程序、方法、規章、結構等，能使個人或組織單位進行活動；第四、組織所欲達到的目標或所主張的意識能夠使人們信服稱讚，特別是深為青年所服膺，這就使得大批個人樂於參加活動；第五、領導幹部經驗足夠，甚能發展計劃、綜理協調各種秘密活動；第六、廣大人民在物質上、社會活動上和精神上能給予支持。

所幸，以上各種條件都在波蘭近五十年內逐漸形成。其他的共產國家並未出現這樣的情況，因而沒有出現地下組織。捷克只有部分上述條件，因此捷克的地下組織，如「地下教會」、「地下搖滾樂」等，是一奇特的現象，僅為該國所特有的形態。



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討自一九三九年後，以上所述諸情況的演變，同時簡介現今波蘭地下組織的計劃、結構、作用，並預測其未來。我們分三個時期敘述：(1)三九年至四六年間的「地下政府」；(2)四六年至八〇年間沒有組織的政治反對勢力；(3)八〇年迄今有組織的政治反對勢力。

## 二、地下政府

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波蘭地下活動可謂瘡痍滿目。三九年德國與蘇聯佔領波蘭後，地下政府隨之形成。三個月內，地下網絡蔓延至德蘇佔領區。波蘭的流亡政府先在法國成立，後又轉至英國；流亡政府與地下活動網憑着無線電和信使通訊連絡。

地下活動有三項作用。第一、儘管波蘭被入侵者佔領，但它代表了波蘭政府的連續；第二、它維持波蘭精神力量，使波蘭免遭佔領軍所可能給予的最惡劣的蹂躪；第三、它為全面抵抗德軍的起義做了準備。

這段時期地下活動的結構，採取的是中央軍政組織，而重點放在軍上。它的武力儼然像一支軍隊，先取名為「波蘭勝利軍」，後改名為「武力抵抗聯盟」，最後定名為「國軍」(以下統稱AK)。四三年時，AK有三十餘萬人。它有如下三個特點：(1)搞活動的核心人物盡是職業軍官，每月只有一點津貼維生；(2)約有四十個游擊隊，隊員三十至百人不齊，專門同德軍作戰；(3)還有些半工作半抗敵的活動領袖，與指揮官們密切聯絡，隨時加入戰鬥。地下活動的政治工作部分，由四個大黨的聯盟和一個行政中樞構成，前者猶如「地下議會」，後者由政府代表為首。

地下的軍事活動，在戰時最初三年，為了保持人員實力，未曾充分發揮出來，但是約一萬次的對德軍作戰，牽住了德軍和警察約近五十萬人的兵力。軍事活動包括收集情報、槍殺德軍、工業怠工和破壞、攻擊德軍軍隊和指揮所等。此外，還有非軍事活動，包括地下教育、地下大學、地下音樂會、地下展覽會、甚至地下劇場。

軍事上最大的一次行動是「颶風作戰」。AK企圖在蘇俄軍隊開入德軍佔領區前加速逐走撤退的德軍。這樣會增加流亡政府同紅軍談判的籌碼。AK軍司令下令不得對紅軍有敵對的行動。

「颶風作戰」在波蘭東部進行得不順利。首先，它與紅軍的合作反使它在戰後遭紅軍繳械，而且紅軍逮捕了它的領袖。這一挫敗使地下領導不得不採取更大的冒險，以獲得預期的政治目的。這就是一九四四年七月所發生的華沙起義。當時八萬名裝備欠佳的AK軍，與德國黑衫軍好幾個師鏖戰了六十三天。而紅軍則靜待一旁觀望，使得納粹肆其威力粉碎了這次起義，結果二十萬人死亡，八十萬人被放逐，整個城市夷為平地。

華沙起義的失敗，對地下勢力是嚴重打擊，所受的創傷此後一直未能康復。此外，蘇聯的秘密警察(NKWD)成功地偵破並消滅了許多波蘭地下組織單位，因為在先前幾年蘇聯曾空降了不少情報人員進入波蘭，這些情報人員對波蘭地下活動頗為熟悉。蘇聯秘密警察還利用奸計，逮捕了十五名全國性的地下組織領袖，並將其送往莫斯科受審和槍決。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九日，AK軍司令奧古立奇下令解散軍隊，同時試圖組織反蘇的政治團體。這個團體叫做「獨立」，可惜僅勉強苟

存了數月，即為共黨滅。到了四七年，整個鄉間的地下活動亦為共黨掃盪殆盡，唯一倖存的是當初獨立於AK的民族武裝軍，但是幾年後也終於被消滅。這時的流亡政府，既無活動勢力，它的總理隨之亦辭職，便只能算是全國人民渴望的主權象徵而已。

地下政府在當時的影響是相當不利的。不僅是許多鬥士死得冤枉，而且竟反助共產黨在波蘭得勢。全國人民因地下活動的失敗而普遍感到失望；少數的共黨成員可以在沒有什麼抵抗下，攫奪了波蘭政權。

但是，地下政府長期的影響却是積極的。它是波蘭人民戰後拒絕共產主義的重要因素。人民認清蘇聯對波蘭的奸計和背信棄義，尤其是華沙起義時紅軍所扮演的邪惡角色，因此使得波蘭民族在精神上遠離共產主義。由於地下活動慘遭挫敗的影響，使得波蘭在六十年和七十年代，未產生地下組織，可謂保存了實力。因為假若那時地下組織再次出現的話，因適合地下組織的條件尚未形成，難免遭到共黨的再次殲滅。此外，另一有利的影響是，現在波蘭的地下組織之所以能相當有效地對付秘密警察，理由之一是它汲取了戰時地下活動的經驗。

## 三、沒有組織的政治抵抗

(一九四五年至八〇年)

在這三十五年間，波蘭教會領導着嚴密而有效的抗拒共產制度的運動，只是這種抵抗是採取精神上的形式。不過，三十五年後，精神抵抗終於成爲政治抵抗的基礎。

漫長的三十五年內，除教會外，尚有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學生等團體，這些團體只是無組織、間歇性的抵抗，它們互不聯繫，而

且抵抗的目標也只限於與各自團體切身利益相關的方面。因此，農人反抗合作社；工人反抗剝削、惡劣環境、物價上升；知識份子抗議沒有自由；學生反對思想教條。這些團體中反抗最有效者，首推工人的反抗。

工人反抗分別在五五、七〇、七六、八〇年發生四次，震撼了波蘭共產制度的基礎。四次反抗形式都一樣，主因皆為政府宣佈民生必需品的大幅漲價。工人一開始和平地進行街頭示威，後來轉變為暴力行動。共黨領導表現得非常恐慌，下令警察開槍鎮壓。解決四次暴動的方式也是如出一轍：執政者犧牲一點自己利益綏靖工人，並做出以後還要改善的保證。五六年的反抗，使奧察布為戈穆爾卡所取代，七〇年戈穆爾卡又為吉拉克所取代，八〇年吉拉克又為凱尼亞所取代，據說一個比一個是「較好的共產黨員」。

就在危機與妥協交替產生固定模式下，政府與民間的權力平衡，也逐漸發生變化。每次危機解決後，人民總能從政府那裡獲得較多自由。例如，因戈穆爾卡的妥協而取消了合作社，並使人民獲得較大的宗教自由。七〇年吉拉克的讓步，使波蘭在經濟與文化方面恢復與西方世界的歷史關係。凱尼亞八〇年的和解，使全國透過工團聯盟所表達的民主要求被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們的輝煌勝利，既非由於他們的政治力量，也非因為他們的組織力量。這些工人僅僅是短暫地組織在一起，而且分散於幾個城市，這就說明工人力量雖然不夠強大，但共產黨政府的力量則更為弱小。

反對力量何以不大？第一，反對力量是零星且有派系的，農民不信任工人，工人猜忌知識份子和學生，而知識份子則多半反對教條。第二，反對每每出於情緒而非出於理性，一旦

感到不正義時，工人即湧上街頭，隨即轉入暴動。第三，沒有積極而長期的計劃或方案，工人們經常不清楚治標與治本，他們只要求當下解決問題，而通常也多屬經濟問題。政府每次讓步後，很容易又反過頭來操縱工人。第四，缺乏固定機構，所以不能較長期堅持工作。第五，沒有堅強的領導核心。五五、六八、七〇、七六年四次反抗行動中，沒有一個領袖是知名的人物。只有團結工會的領袖，才是全國和地方上有名氣的人物。

但是，共產黨政府的弱點則更大。其一是不能善處理物價問題。物價漲幅太大，宣佈時間不得宜。其次，每當暴動發生，黨官即顯得束手無策。七〇年暴動發生時，戈穆爾卡竟慌張地說道：「反革命來了。」一般共產黨員自知處於少數地位，而就心身家性命。尤有甚者，黨員並不信任軍方。其三是黨內缺少團結，總有一批反對派。危機出現時，黨內各派的內鬩當然大大削弱黨的權力與堅定性。

最大的弱點也許是黨的領導，在廣大的人民眼中沒有合法性，因為共產黨政府全憑紅軍的支持。為克服此一弱點，共產黨乃追隨一種「民族主義政策」，創造了它代表工人領導的神話。但是工人的反抗正好說明了該神話的荒謬。共產黨政府乃處於兩難的困境：或者全憑武力統治而不管合法與否，或者向工人讓步。由於希望有合法性與得到人民的支持，共產黨還是選擇了遷就工人的辦法。

五五年首次反抗後，反對勢力與政府均致力改善弱點，而且多少有點成效。反對勢力尋求各團體的合作，聯合了起來。到了七六年暴動時，這種勢力便顯示出效果。七六至七九年間，陸續出現了「工人自衛委員會」、「人權保護運動」，以及其他旨在加強反對勢力的新組織。地下報紙、地下出版公司、自我教育運動都已形成。波羅的海沿岸更有自由貿易聯盟運動、青年波蘭運動和農民自衛聯盟成立。

伴隨著新組織的出現，共同的目標也隨之



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紀念工會創立六周年。

前排中立者為瓦文薩

形成。目標要求新組織獨立於政府之外，並能代表多種團體。由於這樣的目標，遂導致戰略與戰術的變化。原先是湧上街頭，現在贊成罷工，而且協調整個區域聯合罷工。接着七十年代又出現一群領導精英。他們分別來自三方面：積極參加天主教活動的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思想失望而被開除黨籍的年輕人以及工人階級組織內的領袖。頂頂大名的瓦文薩，即是工人出身。反對勢力的增加，最明顯的表現即是八〇年春季盧布林市的總罷工。那次罷工使整個區域癱瘓達數週之久。

共產黨政府也努力改善自身的缺點。為克服黨員恐慌，吉拉克在七〇年創設鎮暴警察。政府也試着解決物價上漲的問題，也引進許多受歡迎的政策，包括增加工資、增加消費物資的產量、擴大西方貸款、加強與西方文化交流等措施。這些政策無非旨在增加政府的正統性和共產黨受人民歡迎的程度。七十年代中期，這些政策似見成效，但是後來又發生一次暴動，證明共產黨政府並沒有克服它先天的缺點。

#### 四、有組織的政治反對勢力

(一九八〇年至八六年)

##### (一) 合法的反對勢力

(一九八〇年至八一年)

工會運動在八〇年八月，忽然震撼波蘭全國，甚至震撼國際舞台。最初在格但斯克港（即但澤港）列寧船廠發生的地方性罷工，人數不過三千，三個月後忽然演變成一千萬人參加的全國工會。這就證明若無事先數十年的準備工作，這樣龐大的工會是不可能遽然形成的。政府最初的反應是以黨控制團結工會，無效後改用暴力威脅，再無效後遂造成軍人干涉

的局面。團結工會被批評為發動太多的罷工，太任意胡為，加速國家的經濟危機，誘發蘇軍干涉，甚至引起內戰等。團結工會也被人批評未更多地發動地下組織，未能執行原訂的八一年三月總罷工的計劃，以及允許太多的民主、甚至內鬥等等。這些批評不無道理，但本文只討論團結工會的組織結構及其在有組織的反對派中的作用。

團結工會是介乎非正式政黨和強大社會運動之間的一個混雜物。從一開始，它即填補了波蘭當時的政治真空。它要求基本的政治、社會、經濟的改革。它所以有這樣一種政綱，是因為在共產黨制度下，包括教會在內的組織都必須政治化。

從組織結構上說，團結工會乃是地區工會的鬆散大聯盟。地區工會又是小地方工會的聯盟。團結工會含有三十九個地區工會，但實際上以格但斯克等五個地區的工會為主宰。團結工會之上有一個全國性的委員會，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主席是瓦文薩。

團結工會有助於其他獨立團體的成立，它們包括農村團結工會、獨立學聯、以及種種專業協會等等。作為共產黨政府的政治伙伴，團結工會在合法存在的十六個月內，簽下六百份以上的協議。當團結工會從事其「有限革命」和使社會團體免受政府控制的活動時，共產黨政府遂發現自己處於困境。黨內外都有反對勢力。國內經濟趨向瓦解。國際方面，蘇聯和鄰國類施壓力。因此共產黨被逼將作一痛苦選擇：或者力求生存或者自動放棄權力。它選擇了前者。於是黨的領導階層由文職人員變為三軍中的政委和職業軍人。黨因此獲得軍方的保護，黨的政策開始轉向強硬。團結工會對共產黨政府此種準備事先竟毫無查覺，它自以為自

己力量甚大。當政府於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宣佈「戰爭狀態」時，整個團結工會，一觸即潰。工人對於軍人干預的抵抗，只是零星短暫的，一週內抵抗即全部瓦解。這一次共產黨政府獲得了輝煌的勝利。

##### (二) 地下組織的反對勢力

(一九八一年至八六年)

合法的反對派既已不能存在，唯一的代替即是成立地下組織。這個工作包括地下組織綱領的形成和地下組織結構的設立。最初只準備把地下組織作為一過渡，以待團結工會重新恢復合法地位。因此地下組織的計劃是先迫使政府回到談判桌上來，地下團結工會的基本要求是結束戰爭狀態、解放政治犯、恢復團結工會。為達到此目的，地下組織乃組織街頭示威和準備全面總罷工。但在八二年十一月，團結工會被正式斥為不合法，而總罷工亦成泡影。此時，地下組織的領導開始意識到，建設組織必須有長遠的考慮，於是遂有一種「長征」哲學的出現，它的諸多提案中，以「秘密結社」最受歡迎。一名被囚的團結工會領袖曾定義如下：「秘密社會即是一群不斷擴充的人民，從事種種不同程度的公開活動，但不為當局所控制。」按此定義，可以概括說，鼓勵一切不受政府控制的有利於國家人民的政、經、社會、文化活動，抵制一切增加政府對社會控制的活動。具體地說，地下秘密活動範圍主要有三：(1) 加強人際關係和社會整合；(2) 發展自我教育和創造政治文化；(3) 抵制政府違背社會利益的一切活動。

內容廣泛的綱要，為種種不同地下組織或團體提供了聯繫的基礎。有這樣的吸引力是因為：(1) 它符合團結工會和七十年代政治反對勢力非暴力和講民主的特性，因此它代表了從前



唯有在教堂波蘭人民勇于舉手。

秘密活動的延續；(2)由於活動領域廣泛，所以易於接納各類成員；(3)它調和了兩種波蘭連續二百年來互相衝突的政治哲學。這三方面從本文的觀點看可以簡單地稱為「反抗」與「合作」。

「反抗」的觀念源於十八世紀末，直延續到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它的目的是透過軍事起義重獲政治主權。「合作」觀念源於十九世紀末，特別是在一八六三年元月起義失敗後。它贊成同入侵者合作（當時的入侵者恰巧為帝俄），大力鼓勵利用民族創造力從事經濟、教育和文化活動。這個計劃叫做「組織工作」方案。它的意思是說，當國家經濟力量轉強，也就相對地在政治力量上強大，因而可獲得更大的政治自由和自決。

但是當波蘭納入共產主義體系時，這兩種哲學都開始大力修正。一九四四年地下政府的崩潰，把「反抗」哲學從人們心中完全剔除，

「合作」的主張開始佔統治地位。共產黨政府強調公有制、中央計劃經濟，並完全控制各種組織，因此「組織工作」方案就必須被放棄，只留下在政治方面與政府合作。這就是戈穆爾卡在五六年和吉拉克在七〇年受到歡迎的原因。

軍人主政後，徹底暴露「合作」哲學的失敗。政府竟然用暴力摧毀一個合法的工會團體，而且不惜違背它自訂的憲法，所以它就不能再得到人民的信任。「反抗」哲學遂再復甦。一位被囚的工會領袖說得好：「沒有獨立的政府或國家，便不會有獨立的工會。」

地下社會的方案對上述兩種傳統主張都有吸引力，而且大大修正了它們，以符合當時的政治情況。呼籲創設地下組織，透過地下活動以達到政治目標，源自於「反抗」傳統。另一方面，地下組織並未完全排除與政府妥協的可能性，它的先決條件是政府釋放政治犯及恢復

團結工會的合法性。

### (三) 地下組織的結構

共產黨政府宣佈戰爭狀態後，地下組織便如雨後春筍般地興起。不過，還是經過二、三年後各大小單位才整合成區域性或全國性的組織，並結成聯盟。迄今，朝此方向的發展仍在進行中。

現今的地下組織不同於二次大戰時中央集權的地下政府。它是分權的、多元化的、地方化的。因此，秘密警察的滲透極為不易。從結構上說，地下組織是一些自願合作的團體，其中以重新整建的「團結工會」為重心。「地下團結工會」包含着四個層次的協調工作，即全國性、區域性、工廠間和地方性四種。當軍人政府上台時，團結工會被整個擊垮。但是三年後，工會在三十八個區域都重建它們的領導結構。就全國性的層次說，成立了「臨時協調委員會」（TKK），成為有效的全國領導。TKK的日常活動由各小基層組織分別執行和協調區域間接觸、人事、安全檢查、出版、通訊、偽造文件等的特定任務。TKK在海外則由位於比利時的布魯塞爾的「協調辦事處」為代表；該辦事處同時協調位於西方國家的好幾個「新聞局」的活動。

負責區域性協調的機構叫做RKS。它的出現來自兩方面。有些來自下層，即由地方團體形成的區域性機構。有些來自上層，即出版地下報紙的團體。最近幾年來，大的組織較佳的區域，例如克拉科夫、格但斯克等四個城市，與意大利和法國的工會組織都簽定了正式的協定。由於這些協定，西方的財經和技術援助源源直接進入地下工會的各區。有時區間的合作不僅是聯合行動，更且有金錢往來。例如，當盧布林區於八二年被逼罰款時，它即從其他

各區借資解困。

工廠間相互協調的團體，只有在大而組織較佳的區內存在。它們是位於區域結構和地方基層間的中間機構。例如，克拉科夫市分成好幾個地段，各地段活動由工廠間委員會協調。

工會團體的主力在於其地下組織的基層（ZKS），亦即各企業內的工會。ZKS收集會費，支援被囚者的家人，幫助低收入者或家庭負擔重的工人，並組織罷工和示威。有些還有自己的圖書館，並與全國性的教育團體（ZEN）合作，教育其會員。一般來說，八三年時大企業的工人付會費者約為二成，小公司工人付會費者則佔六成。小單位反而會員比例高，這是因為小單位不易有臥底者。所有工會的活動，包括繳會費，皆屬非法，並可被判刑三年。不過，政府通常以高額罰款和緩刑取代。最近的統計顯示付會費的工人人數有所減少。地下團結工會總人數八三年時約為一百萬人。近兩年人數似有減少。

鄉村有鄉村團結工會。目前已知全國性的農民組織有三個，區域性的組織至少也有三個，並且刊行五種報紙。

「社會抵抗運動」（KOS）是地下組織第二個主要成份。這一運動是以居住地和友誼關係而非工作地點為基礎的。KOS的基層單位是五人小組。小組中每一人只知組織內的另四人和另一小組中的一人。一旦被逮至多只有兩組瓦解。這一方法對付德國佔領軍時相當有效，現在也有效地對付波蘭秘密警察，因此KOS不易為警察所偵破。KOS的目標在維繫並加強波蘭國民的關係和團結。而政府則在分裂國民成為互相衝突的團體，令他們互相猜疑、恐嚇、嫉妬、衝突、鬥爭。所幸共產黨政府並未如願，否則也不會有組織性的抵抗。KO

S是最初提出地下結社的倡議者，後來漸為其他地下團體所認同。這一活動在城鎮迅速發展。它已有全國性的出版物，名稱即為KOS，發行量約在一萬五千份左右。

地下組織的第三主要成份，即是自我教育運動。它向學生及工人進行獨立教育，由秘密自我教育小組執行。有些小組還受到全國性的教育組織ZEN的支持，有教材和隨時可以應召的教師。一九八二年六月，成立了全國教育董事會，專門協調這方面工作。自我教育運動的主要刊物是「此時此地」，約發行三千份。

地下組織的第四成份是文化活動。有些文化活動受到教會的保護，勉強為政府所容忍。教會經常舉行畫展、音樂會、戲劇演出、詩歌朗誦。更多的活動則在私人住宅內舉行。其中一個相當受歡迎的活動，即是偷放政府禁止演出的電影、錄影帶。自從共產黨政府頒佈戒嚴法後，地下文化活動乃特別興旺。有些地下出版公司竟也能像個商業公司一樣經營。最大的出版公司可能是成立於七八年的「新星」（NOVA），雖經多次查禁，仍然暗中出版了二百五十種以上的書籍。另一出版公司是克拉格（KRAG），專門出版歷史書籍。

地下組織第五個成份是人權運動。波蘭赫爾辛基委員會系統性地記錄政府機關在全國違反人權的行為。每年刊出的報告發行至全國及海外。八四年一名神父被謀殺後，好幾個區域成立了「公民抗暴委員會」（KOOP），專門記錄秘密警察的暴力。有些KOOP是半公開組織。有些大城市，如華沙，還有名為「自由與和平」的組織，專門反對政府對人權的迫害。教會在地方上支持人權運動，保護政治犯的家屬。政治犯家屬經常自發形成相互幫助的非正式團體。有人這樣形容：「他們在法庭、

警所、法律事務所碰頭。他們彼此幫助介紹工作，照顧被逮捕者的家人及子女。」除了以上五種外，還有許多獨立的團體和基層單位，甚至政黨，有些業已相當知名，如「戰鬥團結工會」、「獨立意志」等組織。

特別值得一提的地下青年組織。通常，青年組織發展較慢。但自八三年以來，發展比較迅速。這些青年組織多半以中學為基地，做些分發傳單、組織「沉默罷工」、抵制共產黨教師等活動。有些地區還發展了學校間相互聯絡機構。八五年時出現一種自稱為「選擇社會運動」的組織，大部分由職業學校的學生組成。他們不滿地下工會，寧願直湧街頭舉行示威。另一號稱「戰鬥青年聯盟」的組織，則企圖成立地下青年組織的全國聯盟。八五年時召開過全國會議，吸引了五個區組織的代表；青年絕大多數拒絕共產主義。例如，西西里亞地區的一次調查中顯示，只有百分之四的青年信任共產黨，百分之八十三信任教會。

高度發展的地下報紙，是地下組織各種結構、基層的支持者，也是它們的主要武器。每一區域內，凡稍具規模的團體、甚或專業如醫護從業員及教師等，都各自有自己的地下報紙，雖然多半為週刊，但發行量都在千份以上。華沙一市即有二百五十種報紙和定期出版的雜誌。

我們很難估計究竟有多少人加入地下組織。事實上「地下」與「地上」之分，有時很難界定。瓦文薩本人即是一很好的例子。大多數的時間內，他是屬於「地上」的，偶爾他也潛入「地下」。地下活動份子的絕大多數過着雙重生活，利用業餘時間從事部份秘密活動。真正專業搞活動的人士，也許只有數千，但也足夠領導地下活動。有跡象顯示，八二年至八四

年間頻繁的地下活動，已使地下組織趨向穩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人說：「經不起高壓的人離開了，留下來的都會繼續戰鬥。」

## 五、未來展望

波蘭政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政治情況，尤其是美蘇間的關係。下面的分析是以未來十年內國際力量的平衡和東西方關係沒有大的變動為前提。地下組織大概有如下幾種發展：

第一種可能是秘密警察取締了地下組織。鑒於地下組織已相當穩定，指揮有效，且已獲得波蘭人民及海外的廣泛支持，這種可能性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出現。

第二種可能是地下組織獲得當局的默許。假若發生此事，地下組織等於沒有必要繼續存在。但是這種可能似乎渺茫。現在的共產黨政府並無意像戈穆爾卡和吉拉克所領導的政府那樣肯讓步。自從頒佈戒嚴法後，政府的經濟政策包括提高物價與延長工時。瓦文薩本人及波蘭人民有意談判，但政府却無意。事實上，政府所採取的策略適與團結工會相反。政府的立法愈來愈緊，且似有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的跡象。例如，學術機構的自主權已被取消，秘密警察的權力擴大，限制工人流動的新規定已頒佈，甚至「永久性」的戒嚴令也被常規化。這種「立法」的趨勢顯然表明政府無意讓步。

從經濟方面說，波蘭外債高築、技術落後、人民日益貧窮，也不意味着有妥協的前兆。況且軍人政府的黷武性是和解的另一障礙。隨着戒嚴法的頒佈，共產黨的政治人物已由軍人取代。他們偏向於軍事氣質而非文官型態。他們傾向以武力和命令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他

們也厭惡談判妥協，認為那是寡斷和軟弱的表現。

軍人當政後，共產黨員幾乎少了三分之一。退黨幾乎遍及青年人、自由派、或工人。這也造成談判的障礙。靠着一位軍事領袖為後盾而集合起來的弱勢政黨，既不可能懷疑領袖的能耐，也不可能推動他進行談判。此外，共產黨現在內部並無反對勢力，因此願意別開蹊徑提出不同方法的新團體，也無法在黨內出現。

和解或妥協的另一障礙是黨與群眾間溝通渠道的瓦解。工會、青年組織、專業或文化協會這類傳遞網皆由共產黨控制。黨透過這些機構實施對人民的間接控制。而波蘭人民對這類結構杯葛，它們無法有效控制人民。

軍事化的政府往往喪失政治決策的能力，而多方依賴警察力量的鎮壓。這樣，就更挫傷代表工人階級的意識，而暴力鎮壓也逐漸喪失其效力。有人如是形容道：「約在一年前，被捕的人們已學會如何在審問中應對。他們拒受敵榨，拒供消息，他們知道家人會受到親友保護。而家人亦不失驕傲。被捕者害怕喪失榮譽猶勝於關心身體安全。」這種現象更加深政府與人民的距離，使得未來談判愈發困難。

第三也是最有可能的發展是目前政府與地下組織的對峙繼續下去。一位無名氏工人形容道：「戰爭照舊進行。在某些情況下，雙方可能有意妥協或停火。但是不會達成協議。」以現在的波蘭情況來看，有可能達成停火。現在的執政者可以從與地下組織戰術上和緩而獲短期的政治利益。原因有三：(1)地下組織，尤其是拒絕使用武力的團結工會的存在，有助於政治穩定，減少群眾湧上街頭的暴動，這就是八二年十月團結工會被解除合法性時，暴動未起的原因；(2)現有的地下組織抵消武裝地下組織

的興起；(3)地下組織的存在使現在的軍事政權存在合理。共產黨國家中出現軍事政權是反常現象，與馬克思正統意識不相容。蘇聯願意容忍此一反常，乃因軍事政府更能有效控制波蘭之故。如果沒有地下組織，軍事政府也就喪失存在的理由。說來奇怪，地下組織反是軍事政府的「安全毛毯」。

波蘭的內部也樂見地下組織的存在。內政部能獲多少資源、能有多少政治實力，全賴地下組織的存在。地下組織本身也有好幾個理由樂於與軍事政權做戰術和解。第一，現在的軍事政權再壞，也總比蘇聯直接佔領好。如果政治不穩程度增加，蘇軍佔領的可能性會加大。第二，比現在更具專制傾向的人物可能掌權。第三，雙方「停火」後地下組織便有更多時間強化組織、改善運作效率。第四，現在的政權所剩時間已不多。它未能解決拖延已久的政治、經濟、社會各種問題，極可能被逼下台，雙方妥協對彼此有利。

以上所述諸種穩定性的因素，均使雙方敵意不致太過擴大。一方面秘密警察將繼續鎮壓，却未必能殲滅地下組織，另一方面地下組織亦將繼續活動。這種僵局對峙一直持續下去，直至波蘭黨及蘇聯政府終於能了解到在政治、經濟、社會鬥爭中，「軍事反擊」不能起作用。此時黨內將有反對勢力出現，而且蘇聯會撤消對現在軍事政權領袖雅魯澤爾斯基（JARUZELSKI）的支持。陸續罷工和示威將使雅氏下台，可能另一「較好」的共產黨員上台。這又將導致新的政治循環，而使波蘭更接近政治主權的最終目的。地下組織在政權的權力轉移中，將扮演重要而且穩定的角色。在未來與新政權的交涉談判中，地下組織雖未必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却無疑是重要的角色。

（本刊編譯室節譯）

# 想想孩子

## 說不明白



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人的一ance只是短暫的一瞬間，然而生命的火炬一代一代地傳下去，爺爺傳給父親、父親傳給兒子、兒子傳給孫子……當我們從父輩手中接過世世代代傳下來的財富：廣闊富饒的土地、悠久燦爛的文化，我們是享受這些財富，還是增加這些財富然後傳給我們的後代？不論是「略輸文采」的秦王漢武、「稍遜風騷」的唐宗宋祖，還是「數風流人物」數得着的毛澤東，取的都是前者。秦始皇何曾想到長城會成爲中華的象徵，毛澤東大煉鋼鐵或炮轟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時候，何曾想到，留給了我們一個百業俱廢的中國！我不知道爲什麼，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很少想到未來，想到孩子，但是讓我們從今天起，想想未來，想想孩子。

讓我們想一想，我們是留給孩子們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還是一個專制暴戾的政權。五十年後，人們能不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嘗到法治的碩果，他們是否會像我們抱怨先輩沒有建立一個好的體制一樣抱怨我們？手中掌握着中國命運的人們，請想一想，想想孩子。

讓我們想一想，我們是留給孩子們一個陽光明媚空氣新鮮的美麗家園，還是資源枯竭冷寂荒涼的廢墟一片。長江以北已找不到一條沒有污染的河流，孩子們是否還能像我們小時候那樣玩水嬉戲？各大城市已發生水荒，難道將

來孩子們得從南極拖運冰山？濫砍濫伐的時候，可曾想到留給孩子的不是一個綠樹蔥蔥百鳥齊鳴的樂園，而是一個怪石崢嶸野草叢生的荒山？「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泉城或者「烟波浩渺、水連天碧」的洞庭是否有一天會成爲我們講給孩子們聽的「桃花源記」？改變着中國面貌的人們，請想一想，想想孩子。

讓我們想一想，我們是留給孩子們一個自尊自強互敬互愛的傳統還是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的風氣。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的人們，請想一想在孩子們的心中播下了什麼樣的種子？利用職權圖謀私利貪污受賄的人們，請想一想孩子們是否會因此認爲當官就是爲了發財？龍生龍子、鳳生鳳雛是否歷史的定律？通過父母的權勢而佔據高位的高幹子女們是否依然如法炮製？言教不如身教，在我們耳提面命孩子們樹立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請想一想他們是否認爲共產主義理想就是自己爬上去然後給自己的子女安插個好位置？請想一想，想想孩子。

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請先想一想，想想我們的後代！

在決定爲西德儲存核廢料之前，請想一想留給孩子的是放射病還是原子彈！

在大興土木建造樓堂館所之前，請想一想孩子們黑暗的教室！

在下一大興安嶺火災之前，請想一想孩

子們是否還會擁有同樣美麗的長白山！  
在劃定許多只準外國人進的旅遊點或商店時，請想一想孩子們是否在夢想着長出藍眼睛、黃頭髮！  
在舉起獵槍瞄準的時候，請想一想孩子們是否還能看到同樣的動物！  
在高聳的烟肉裡冒出黑烟時，請想一想孩子們吐出多黑的痰！

……

請想一想！  
想一想我們的兒子、孫子、兒子的孫子、孫子的孫子……

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會帶給我們自己很大的利益，也不會給我們自己帶來很大的損害，却給我們的後代帶來深遠的影響，我們，還能在這個世界上活多久呢？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

我們即將把祖先傳下來的財富傳到兒子的手中，我希望，他們接過去的是自強和富強，而不是耻辱和失望！

## 春雨

啊，你

春雨

風中，多麼輕盈

夜裡，又多麼深情

悄悄打濕知更雀的翅膀

偷偷飛入紫羅蘭的夢中

願你化爲黎明的淚水

安慰那路旁依依的蒲公英

啊，你

春雨

多麼輕盈

又多麼深情

艾菲





# ×海陵

## —「北京人」系列速寫之四

張潤

提起「×海陵」（這名字透着晦氣，不是？漢字共有四萬多個，有的是大吉大利的字，你不用，怎麼偏偏起這麼個不吉不利的名字？莫非你有意效法以海為陵的周恩來總理，死後將骨灰撒入祖國的江河湖海？……），北京城裡沒幾個人知道這個名字，可若是道出此人的乳名「×大東」，當年可是威震四城，不含糊！

大東的故事頗有傳奇色彩，充滿性與暴力，如果着筆不慎，很容易寫成一篇黃色小說，失去了其內在的嚴肅意義。

介紹×大東，不妨從他的若干特徵講起。首先，他落地時便是一個罕見的大胖娃娃，此後，在身體發育上，總是領先於同齡兒童，大過別人一個型號。及至十七、八歲，逢上文化大革命，×大東已成為北京城裡數得過來的一條壯漢。文革中期，大家無所事事，大東又學得西洋拳擊，如虎添翼……

與×大東有過交往的人，大都會得出這樣一個印象：這是個很聰明又很糊塗的人。說聰明，他經常上課打盹，拒交家庭作業，却逢考必勝，以高分為北京男四中錄取（這是一所藏龍臥虎的名校，據統計二分之一強的學生以拿破崙為偶像）。說糊塗，這位高中學生在計算水電費、伙食費時有八九必出差錯，也曾鬧出將一元鈔票當作一角票使用的笑話……他做出這種事並非出於一時馬虎，而是腦筋糊塗——在某些時刻，他的智能活動還不及三歲小孩。

在×大東身上，還存在着許許多多矛盾的東西：他身強體壯，在拳擊場上練上幾個小時而越戰越勇，可是有一次，他在汽車站排隊等車，却被烈日晒得暈了過去。

又如：他平日說話慢聲細氣，某次上台獨

唱，口未開，先自羞得面紅耳赤；可是，同一個他，却在國慶節前突擊性戶籍檢查中，被人們從床底下查出一個正當妙齡的女孩子，查戶口的老太太們有些抹不開臉面，他却談笑風生，若無其事……

莫非×大東是個兩面派，狡猾家？非也，他就是這麼個不可思議的人物。

×大東的父母都是延安幹部。由於他們超前地實行了「一胎化政策」，大東是這個家庭唯一的孩子。至於另有一些風言風語的傳聞，則基於口德筆德而從略。

大東之父×敬棠跟從陳伯達多年，擔任機要秘書。他就像是拴在軍艦上的一隻小船，隨着陳伯達的起落而沉浮。大東之母是中共黨內屈指可數的女秀才，寫過不少政論文章。她年輕時身高體健，是天津南開女中籃球隊的主力中鋒。人們私下議論，皆因「母壯」，才有了大東這個「兒強」。

如果沒有文革，今日之大東無疑是一名工程師技術人員。優則為工程師，劣則為技術員。進入男四中後，大東曾揚言：「我要上清華這個工程師的大搖籃，別的學校於我毫無意義。」

憑着他的小聰明，越過清華大學的錄取分數綫當無困難。

文化大革命把他驅上了另一條道路。

文革初期講究出身，大東可神氣啦。大腦袋一晃：「我爹在中央文革！」聽者無不敬畏。那年頭，全國到處都有走資派，唯獨中央文革小組裡個個都是走無派！也有少數吃了熊心豹膽的人貼出大字報反中央文革，漿糊還沒干就被括進監獄去吃餓窩頭。

於是，大東先當紅衛兵，旋即又成為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的幹員。抄家、打人、轟轟烈



烈。常見他騎一輛黑色飛鴿牌自行車飛來飛去，逢人便熱情宣傳「最高指示」：「毛主席說啦，『好人打壞人活該！』還不快上街打人去？！……」

毛主席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各種名目（好在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詩詞共有三十八首，足夠斷句之用）的紅衛兵組織爭先恐後地毆打「壞人」，把個好端端的北京城搞得血雨腥風。直到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宣佈「毛主席在『好人打壞人活該』之後還有一句重要指示，就是『今後不准再打人』……」，這場鬧劇才過了高潮。

大東得近水樓台之便，經常透露來自「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小道消息。有一回，他說：「哥兒幾個多多保重，十二月份北京要大亂。」聽者將信將疑：隔著好幾個月呢，亂與不亂，誰知道？！……

到了這年（一九六六）十二月，北京城裡果然亂了套……爾後，江青出面權威性地抨擊「十二月黑風」。

若干年後，我們才悟出這是一出運動群眾的政治活報劇，中央文革即是編導組。而在當時，大東被視為神機軍師，了不起的「三年早知道」。

大東飄飄然了許多日子。轉過年來，各區糾察隊解散，男四中校辦監獄（關著一些不良分子及社會青年）停辦，他的生活中驟然減少了有趣的內容，快快不樂。

大東是個閑不住的人，手上又有錢，遂廣泛結交社會上的三教九流。他學拳擊，學聲樂，學圍棋，五花八門，樣樣都來一手。那時節，黨政軍部門輪番受到衝擊，唯有中央文革如同泰山一般巍然屹立。大東背靠大樹好乘涼，無憂無慮。

常言道，強將手下無弱兵。大東之父在文革中輔弼中共中央第四號大人物陳伯達，出謀劃策，絞盡腦汁。也曾陪同首長親臨外省武鬥現場，排難解紛。大東耳濡目染，官場權術，也學得若干皮毛。待到毛澤東號召「軍訓」、「復課鬧革命」後，他又是第一個返校的積極分子。每日恭讀毛著，左胸前佩著個碗口大小的毛澤東寶像……博得了駐校軍宣隊的好評。展現在眾人面前的大東，是一個堂堂男子漢。他隨時隨地都在努力搞好思想革命化。

然而大東還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按照佛洛伊德學說，神經質症和幼兒性慾有直接關係。他還認為，在挖掘神經質症隱藏的原因上，夢的解析是一種有特殊價值的媒介。

佛洛伊德的觀點完全適用於大東其人。大東是個極端神經質的人。稍有刺激，便會發出女性一般的尖叫；更不可思議的是他的頭髮隨著情緒變化而脫落、復生……群醫為之束手。炎夏，他時常戴著女式游泳帽在池中戲水，被視為一怪。

大東私下坦承其性意識覺醒甚早。他曾做過許多荒誕不經的亂夢。進入青春期後，單相思（其對象經常變換）害得他寢食難安。

文化大革命把中國大陸變成了一座毛澤東思想修道院。大東明裡手捧紅寶書，口中不絕「團私、批修」之聲，暗裡却如飢似渴地憧憬兩性生活，深深地嘆息：「那想必是極樂世界。」

大東展於眾人之前的苦行終於修得正果。男四中的學生幾乎是整班整級地發配到山西、陝西農村去了，他却留在了北京，成為「領導階級」的一員。這在當時，等於抽中了一枝上籤。

工廠生活枯燥、乏味。上班時間松松垮垮

，下班後的政治學習又臭又長。大東勉強堅持了一陣，終於現出原形。爾後索性吃上「勞保」，除了每月按時領取打了折扣的工資，從不去工廠露面。

工廠領導級別很低，見識有限。一打開大東的人事檔案，見到金光閃閃的中共中央大機關的名目，這幫地頭蛇真是又羨慕又敬畏。哪個還敢過問大東的行止？

大東輕松快活，神仙一般。他酷愛美食，流連於京華地面上的各大餐館，尤其喜歡西四「同和居」、地安門「馬凱餐廳」的美味佳餚。

如果說有什麼不滿足，那便是他尋覓一位絕代佳人為侶的心願始終沒能實現。他常常在夢中與美女們廝混，醒來後發現生活中的姑娘簡直不屑一顧。

吃喝玩樂得有搭檔，大東周圍聚著一群酒肉朋友。那些人可不像大東似的有塊「領導階級」的招牌做掩護，而是一群成功地逃過上山下鄉這一關的大滑頭。鑒於毛澤東「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最新指示，大東成了這一群社會閑散人員的實際領袖。

人活得太愜意，往往就要生出許多新花樣。終於有一日，大東於酒酣耳熱之際伙同他人行劫，跌入犯罪深淵。

那是一個夏晚，大東等四、五個人在「海順居」飯店（這是當時海澱鎮上最高級的餐廳）飲酒取樂。十幾個炒菜，三、四瓶葡萄酒，風捲殘雲，狼吞虎咽。但是他們并未盡興。

「搓(1)完飯咱們幹什麼？」在座的中法混血兒×文北（其身世見「北京人」系列速寫之二）說道。

大東順手扳倒一個玻璃杯，殘酒打濕了桌面。他無聊地說：「沒有事情可做。」

混到飯店打烊，這一千人帶着幾分醉意躍馬路，順着中關村至體育學院的專綫往前走，沿途又碰上幾個熟人，加入一伙……

這七、八個人行至化工五廠附近，不知是誰多了一句嘴：「這麼逛下去真沒勁，干脆咱們湊個人吧，誰過來就拿誰練練……」

×文北笑嘻嘻地道：「光揍人也沒勁。順帶手兒咱們『蓋勒』(2)點東西……」

這一建議被包括大東在內的眾人無言地採納了。他們兒戲一般地越過了罪與非罪的界限。

路靜人稀。等了許久，老天爺才把一個倒霉的傢伙打發到他們身邊。這幫人一哄而上，捂嘴的捂嘴，抱腰的抱腰，掠去了一塊南京手錶廠出產的「紫金山」雜牌錶。

他們喝令被害人——一個老實巴交的中年男人——不得報案，否則格殺勿論……那人吓昏了頭，唯唯連聲。

次日，大東把手錶拿到委托商店賣掉(他是這伙人中間唯一持有工作證的人，責無旁貸)，又去「海順居」吃喝一頓。區區小事，過去了也就忘記了。

生活自有其嚴酷的法則。這件事兒幾年後被翻了出來——那是後話。

大東依然當他的快樂王子。既是王子，自然少不得嬪妃相伴。他耐不住寂寞了。既然夢裡所見的傾國佳人一時難尋，那麼不妨騎馬找馬，降格以求。

「我過去有些傻——好高騖遠。」大東慢條斯理地說。他拉着腦袋，兩道目光從眼鏡框架上漫射過來，彷彿是大型泥塑「收租院」裡的帳房先生。「我看別人都挺實際的，得——是一。反正又不是要結婚，馬虎一些嘛。」

從此，大東的生活裡增添了粉紅色彩。說

是色彩并不恰當，因為尋花問柳成了他生活的重心和第一需要。

以前，大東以孔武有力著稱於北京，他在幾次中學生地下拳擊賽上大出風頭，僅有一次敗於「海淀大腳」(石油附中的「拳王」)。賽後，據「海淀大腳」分析：大東體質好、力量大。只是反應略嫌遲鈍。他的右擺拳很厲害，別讓他打上，打上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爾後，大東逐漸獲得了浪子的名聲，他的武功則被人們淡忘了。他開始過一種二元的生活：繼續在夢中與絕色婦人交往，奉她們為女神，聽憑她們頤指氣使地調遣，畢恭畢敬，唯命是從；而當他做着意境高雅、溫情脈脈的美夢時，同床睡的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女子。她們慕名、慕錢、慕財而至，大東則一視同仁，來者不拒。

大東的風流韻事很多，據最保守的估計，至少有百十起。他膽量大，腰包滿，在野花叢裡橫衝直撞，無所顧忌。惹出麻煩也不怕，文打官司武動手，隨你便！

茶餘飯後，大東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艷史抖出來，供眾人消遣。許多在常人看來無法啓齒的細節，也不肯遺漏。用北京土話來說，他蓋不吝(3)。

大東的許多艷事都是千篇一律，也很庸俗。他迎來送往，與生張熟魏鏖戰於床第之間。選搜羅民間秘方煎製春藥，以維持其生龍活虎一般的幹勁……委實乏善可陳。

然而，在他的風流勾當之中，也有發人深思、悲涼壯美的生活插曲——

某日，細雨霏霏。大東在東風市場(即文革前的東安市場)用畢茶點，懶洋洋地在街上閑逛。他沒有事情可做。無事則要生非。走在前面的一對情侶引起了他的注意。男

的着藍色套頭雨衣，女的披綠色短雨衣，二人比肩齊步，款款而行……

大東暗自贊嘆這對情侶的好身材，并油然而生起對於男方的嫉恨和對於女方的愛慕……他決心掠他人之美，用黑話來說，這是「橫糖」(4)。

他不遠不近地尾隨着他們，心裡胡思亂想。春雨溫柔地潤濕了他的頭髮、周身，使其愈益精神煥發。

到了王府井南口，那兩位上了大一路公共汽車，大東也跟了上去。人家上前門，他入後門，以免過早暴露戰略意圖，打草驚蛇。

那兩位在軍事博物館站下車。大東心裡竊喜：這一帶幽靜無人，下手的機會到了。

這三個人兩前一後地進入玉淵潭公園。這是個沒圍牆、免收費的大公園，常有刑事案件發生。

下着雨，公園裡沒有游人。大東跟到樹林深處，一個箭步穿上去就把那個男的推到一邊，用熊掌一樣肥厚有力的大手揉搓着那個女的，發出一聲性衝動初步得逞後的低吼……還叫道：「我是一個色情狂，讓我幹一鍋子(5)吧……」

可憐女子無端受辱，驚得全身瑟瑟發抖……

「看來，你不僅是個色情狂，還是個虐待狂……」——沉靜、冰冷的聲音。大東一驚：原來高個子也是女人！

他的濫施淫虐的興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擊，興奮點因之轉移，住手了……

大東屈指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四百度散光眼鏡(他外出打架從不戴眼鏡，而獵艷時則必戴眼鏡)，左右打量這兩個女子，一樣的清秀、相似的白晰……他猜測這是兩姐妹。

詢問之下，方知她們是堂姐堂妹。都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屬非黨的社會名流。文革初期，自殺身亡。大東當紅衛兵滿世界抄家那會兒，聽說過這些事情。據悉，周恩來總理還為此發了脾氣。

「交個朋友，怎麼樣？」大東舔着油亮的嘴唇，和氣地問。美食之後要有美色，這才對得起自己。

高個女子無所謂地：「咱們已經是朋友了。」

大東沒話找話：「大雨天你們到這兒來幹什麼？」

原來，這天是高個女子的父母投湖自盡三週年忌日。她們特來此追念。剛才，還在王府井買了一點祭品。

大東雖然是個色情狂，心地却還善良，說了許多憐香惜玉的同情話。交談中得知她倆沒有正式工作，在街道福利組裡當臨時工，每日往蛋壳上畫大美人兒……

大東說：「看你們的臉色，好像營養不良似的。晚上我請你們去青海餐廳吃飯，怎麼樣？……」

高個女子、矮個女子相視一笑。這微笑清新而且高傲，是大東在野花叢裡見所未見的微笑。他不由得產生了幾分敬意。

高個女子說：「下個月的今天，我們陪你去青海餐廳吃飯。」她拔筆在一張碎紙上寫了一行字，「這是地址。記住，下個月的今天你來找我們。有個意外在等着你……」

說罷，堂姐挽着堂妹向樹林深處走去……那背影恰似一對情侶！

大東小心翼翼地吧碎紙揣入內衣口袋。細雨濛濛，淋透了人兒無妨，浸濕了紙片却會擔誤一件妙事。

大東抹了一把臉上的雨水，心中潛生着新的意念：他要改一改德行，和這對堂姐妹中的一位（或姐或妹，都行）傾心相待……他想戀愛了。而這一愛情是柏拉圖式的、純然精神的，絕對不包含肉慾的成份。

此後一個月，大東閉門裹足，正身修心。他無時無刻不在思念那兩位妙人兒。她們美麗、有教養、舉止不俗。至於出身，那到不是大問題，自己根壯苗紅，足以遮抹對方的家庭污點……俗話說得好：「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氣旺」嘛。

他不怕受黃泉之下的岳父母的連累，只因他是×大東，陳伯達機要秘書的兒子。

一個月之內，他在心中編織了許許多多的童話故事。他是王子，她們是敵國的公主，然而愛情是超然的，凌駕於政治、軍事鬭爭之上……

整整一個月後，他按照碎紙上的地址找到了南順城街附近的一個死胡同。他道出堂姐堂妹的芳名，人們却以陰郁的目光、可畏的臉色……

他又道出自己的名字。一個小腳老太太道：「您就是×大東？姐兒倆有封信留在這兒，等着你來拿……」

信只有寥寥數語：「×大東：很抱歉我們失約了。第二個安娜·卡列尼娜 第三個安娜·卡列尼娜」。

老太太顫着聲音說：「……們兒(6)大家伙兒看着這姐兒倆這一程子(7)就不對勁兒，估摸(8)着八成要出事兒，到了真的出了事兒！姐兒倆跑長辛店火車道兒上臥軌了！連個整屍首都沒落着，慘哪……」

大東摘下眼鏡，他的眼睛裡猝然涌出一包熱淚。回家後，他病了一場。病癒後，半個月

沒邁出家門，連日連夜地反復閱讀托翁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借以寄托對兩位僅有一面之緣的亡友的哀思……

如此悲壯的艷遇，在×大東的生活史上乃是鳳毛麟角。北京城裡流傳着許多關於他的花麗胡騷的傳說，大都粗俗、低級。有些簡直不堪入耳。

有時候，大東嫌尋花問柳不夠刺激，就在大街上打架滋事。他身粗體大，訓練有素，兩手握起便是鐵鉢似的大拳頭，走到哪兒也吃不虧。一次，他在公共汽車上被人踩了腳，趁機發作，把對方按倒在地，復加以奚落：「你這家伙，怎麼像女人似的沒有力氣?!……」

也有幾回，大東與情敵因爭風吃醋相約「查架」(8)。他的朋友遍於京華，點頭之交多如繁星，總是佔上風。公安局、派出所明知他品行不良，也只能眼開眼閉。小小民警（人民警察）怎敢過問「陳伯達辦公室」裡的事情？

不過，凡事均有例外。×大東上得山多終遇虎，也曾吃過一次虧。某日，他在大街上與一個風騷女子萍水相逢，雙方議了一下價錢，大東便用自行車貨架將該女馱回家裡。

事畢，該女貪得無厭，索要雙倍報酬。大東如何肯依？少爺脾氣上來，分文不予，一頓惡罵……

哪知，這風騷女子是崇文門花市——北京城裡的貧民區，因物質匱乏而衍生出種種罪惡——的一個著名「圈子」(9)，有着複雜的黑社會背景。她返回花市召來重兵，在沙灘的一家面食館裡尋着了×大東。

「識相點兒，給咱的姐們兒賠個不是，再拆兒些葉子(10)……」一個黑炭似的瘦子用兩隻玻璃球似的眼睛瞪着大東，慢吞吞地道。他身後站着那位風騷女子。

大東手上托着個三鮮餡包子，邊吃邊道：「咱們別在這兒說話，咱們口兒裡……」黑炭冷冷一笑：「敢跟老子叫板？你也不打聽打聽老子的字號——『牛魔王』！……」他從旁人手裡接過武器——兩把火筷子，握在手中。

大東肝兒顫了。他早就聽說這「牛魔王」是花市地區著名的殺手，常以匕首替別人解決糾紛（諸如爭風吃醋、口角鬪毆、招引了別家的鴿子、搶奪熱帶魚缸等等）。他還有一手絕技：用火筷子挑取對手的眼珠，百試百中。大東放下包子，陪出笑臉。他向神氣活現的風騷女子道歉，賠款。和平解決爭端，化干戈為玉帛。

一向跋扈的×大東栽了這個跟頭，心裡老大的不痛快。若非他反來復去地運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類的古訓來寬慰自己，只怕是會悶出毛病……

常言道：「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文革時期的官場，危機四伏，朝不保夕。中共九大之後，陳伯達大紅大紫，穩坐中共中央第四把交椅。誰料得到，一九七〇年秋廬山會議召開，他因「天才論」和國家主席之諫開罪中共中央第一把手毛澤東，被定為「口稱小小老百姓，實則大大野心家」的壞人。於是，全黨全軍全國展開「批陳整風」（對外稱「批修整風」），搞得轟轟烈烈。

這一來，大東的日子難過了。他的父母相繼被送到與世隔絕的某地接受審查，權勢炙人的「陳伯達辦公室」不復存在。

工廠領導此時想起了×大東這個特殊工人，通知他回廠復工，否則將除名。大東無奈，只得沒精打彩地上班去了。

此後，他渾渾噩噩地混了差不多兩年。大

錯不犯，小錯不斷。

一九七二年八月，×大東的密友、中法混血兒×文北被捕。警方在調查其罪行時順藤摸瓜，取得始料不及的收穫，挖出了一批不法分子。×大東即是其中之一。

被捕之前，他是有預感的。機關大院傳達室裡那幾個平時對大東很有幾分敬懼的傢伙，忽然總是虎視眈眈地死盯着他；而廠裡的同事却莫名其妙地對他分外好。

一個新來的小徒工聽說大東是失勢的陳伯達秘書的兒子，想欺負他：「×海陵！那台機床的套軸銹了，還不去看看！國家每月發你工錢，是讓你來幹活兒的！……」

大東對他怒目而視。

車間主任將小徒工拉出門外，壓低聲音道：「我說，你還是對他好點兒吧。往後橫是想想也看不見他了……」

這話被大東聽見了，又痛心又傷心。他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是夜，他轉側難眠。凌晨起床，動手整理衣物。三十六計走為上——他決定棄職逃跑，去京郊農村避避風頭。

本來，他是可以平安離去的。但是在打點了數百元現鈔、日常用品和幾本心愛的小說，而將其餘東西封存之後，又一轉念，想留個便條給失去人身自由的父母雙親。兩年未通音信，該怎樣落筆呢？他摘下眼鏡，用手揉着微濕的眼睛……

時間就這樣蹉跎過去了。六點鐘，警察們到了。客客氣氣。大東心中悔懼交織，却又混着一絲料事準確的自得……

一警察和顏悅色地說：「大東，我們一大早兒來是想找你問問×文北的事兒。他是他，你是你，兩不相關。哈哈……」

大東被他們用吉普車送進了東城公安分局

。三五天之內，×大東被捕的消息傳遍了北京四城。親者大痛，仇者大快。不久，又風傳大東越獄潛逃，到處「刷夜」……故事有鼻有眼，熱熱鬧鬧。

一九七三年初春，我和表弟在故宮門口與大東邂逅。他蓬頭垢面，臉上有一種長期缺眠的青灰色。上身穿着中山裝，下面却是一條尺寸短小的女燈芯絨褲——前面用剪刀開了條縫，佩着兩枚嶄新的大別針……

昔日那位好美食、戀女色的富貴公子沒有了，立在我面前的是個狼狽不堪的逃犯。

我和表弟拿出鈔票糧票接濟他。大東收了糧票，却把鈔票退回來：「我有的是錢，花不完……」他從腰間抽出一把「大團結」，估計有一千多元。「就是晚上沒地方『刷夜』，幫幫忙吧，咱們一向不錯……」

我和表弟均露出為難之色，大東也就沒有再說下去。這天，我們陪着他消磨了半日時光。三個人在一起時，大東的神態裝束才顯得不那麼扎眼。

……大東在東城分局拘留所蹲了兩個月，以參與搶劫手錶及生活腐化的罪名被判處強制勞動三年。他成了勞改犯人。

大東被送往京郊天堂河農場。那是個掛天堂之名而有地獄之實的所在。他實在無法忍受下去，就找了空子逃了出來（逃跑經過他僅用三言兩語帶過，我們也未深問）……路上，他又飢又乏，幾乎走不動了。見着一個香瓜攤子，覺得賣瓜老頭還算面善，就低三下四地哀求：「老大爺，施舍（這樣的文明詞藻是鄉下人聽不懂的）幾個瓜吧，行行好吧……」

老頭不肯。大東光火了，捏起拳頭對準老頭的鼻尖：「你給不給？老子把你的挑子扔下河去，咱們誰也別要！……」

老頭望望天上的太陽，又望望大東，遞過來幾隻香瓜。大東連皮帶籽吞了下去，頓時長了精神，大步向前走去……

豈料，那老頭放他走出一百多米，便扯開嗓門長嘯：「噢，噉！搶人啦！……」

一個騎自行車的農村小伙聞聲追上大東：「等等，你慢走……」

大東溫和地笑笑：「那人早跑到前邊去啦！我是過路的……」乘其不備，他快速打出一個右直拳，那人應聲倒地！

大東竄進了莊稼地，慌不擇路地只顧往前跑，天黑了，就睡在草堆裡……不巧，那天村裡走失了一頭種豬，男女老少一齊出動，結果豬未尋到却發現了大東！他在電筒和火把的包圍中睜開惺忪的睡眼，扯謊道：「我來找插隊的老同學，走迷了路……」

人們把他帶到了大隊部，給他張羅飯食。他心虛情怯，跑脫了……

（我插問：「你逃走了，天堂河農場不派人追捕你嗎？……」他搖搖頭：「他們沒來追我。聽老砲們說，農場只是給原在派出所打個電話，只要別回家就得啦。不少人逃出來，在社會上漂了好幾年也沒事哩……」）

大東終於進了北京城。短短幾天便嘗盡了炎涼世態。開始，他還天真地以為，那些相好的浪蕩女人會念及情份，把他收容下來。畢竟，他跟她們睡過覺，還花過大錢。沒承想，她們統統翻臉不認人。

第一個對他說：「呀！我哥在市局（即市公安局）工作，他回來一眼就能看破你……」

第二個以通知母親相威脅，干干脆脆地攆走他。

第三個留他吃中飯。一大盤炒蘿卜條，另有一小碟白斬雞。大東剛要伸箸取雞塊兒，桌

底下有人踩他的腳……那是坐在對面的一家之主——浪蕩女人的父親。他只得知趣地以蘿卜條送飯，而那幾塊白斬雞則被父女倆悉數全殲。飯後，這浪蕩女人拍打着他的肩膀說：「大東，飯量不小呀。快交鈔票糧票吧！」大東說他沒有，女人馬上用長柄條帚把他趕出家門……

野鴛鴦，何言真情？！

（我問：「你哪兒來的那麼多錢？」大東凄苦而又自豪地說：「我媽給的。」）

萬幸，這時大東的母親結束了隔離審查，回到了北京。大東走投無路，托一位可靠朋友向母親求援：「大東跑出來了，沒錢吃飯沒地方睡覺。」大東母親憐子心切，竟從補發工資中提出巨款交予來人。

有了錢，大東的境況大為改善。三餐不成問題，找住處也較前容易。通常是他住在誰家，就帶上那家男女老少下館子，還包下居家過日子的日常開支。算算帳，比住中級旅店還貴。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近來，爲了迎接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各地風聲都緊。那些黑了心的房主們趁機抬高房錢，吸大東的血。更糟的是，前晚他在一個老相好的閨房裡刷夜，趕上了派出所分片查戶口，他跳了後窗戶，忙亂中穿錯了長褲……

這兩天，他只得去龍潭湖公園刷夜。園中有棵大槐樹，內中是空的。他就在傍晚時分爬進去，卷着身子睡覺……白天，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自我麻醉。

（我說：「這不是長久之計啊。以後你打算怎麼辦呢？」他聾聲聾氣地說：「不知道，越想越發愁。我先這麼拖着，拖到我老爹解放……再說其它話。」）

這天，我們與大東談到很晚才分手。表弟

的身量和他差不多，別前他們還去公共廁所裡交換了長褲。

大東昔日的神氣和威風到哪兒去了呢？

我記得有一年盛夏，大東倚着機關大院游泳池的柵欄，和幾個公子哥兒一起戲弄司機老關（綽號「阿巴巴」）的六歲的兒子。他們說只要小阿巴巴將那黑黝黝的皮球似的肚子挺凸一次，便可以得一分錢。於是司機的兒子便在驕陽下賣命地表演，供他們取樂……最後，小阿巴巴兜着沉甸甸的一堆硬幣打算回家時，大東攔住了他，把那些硬幣全數扔進了游泳池。小阿巴巴便在少爺們暢快的大笑聲中哭着跑開了……

誰說冥冥之中沒有報應呢？

別時容易見時難。一晃十年，我和大東沒再見面。表弟曾在街上撞見過他幾次，一起吃過飯，還陪他刷夜……我因而得知大東後來的遭遇。

這位浪子落難時得到一位善良女子相助，雙雙墜入情網——新言情小說。

某日，大東坐在餛飩店裡吃中飯。由於飯後無處可去，他有意吃得慢慢，消磨時間。一個面色蒼白、形容憔悴的姑娘沒有一點聲音地走近他：「同志，可以在你這兒坐一會兒嗎？」那聲音是虛弱的，底氣不足。

大東瞟了她一眼，點點頭，沒有在意。突然，這姑娘腦袋一晃，沉重地倒在大東身上，一張賣血單據飄了出來：五百西西。

大東動了惻隱之心——他就是這麼個人：半是天使，半是魔鬼——扶住姑娘，詢問她的地址；對方呻吟着告訴了他。

大東僱了輛出租汽車將姑娘送回家。她的身世是這樣的：父母久病後雙雙亡故，遺下一間破屋和一堆債務。她是一家糧店的開票員。

單靠這點工資不夠還債，就常常賣血……

「……我爸媽得的是癌症，拖了好幾年。他們街道工廠沒公費醫療，都是街坊的大爺大叔叔幫着湊的錢，到現在還沒還清，真對不住大家伙兒……」姑娘恢復常態後，細聲細氣地說。

大東爲之鼻酸。這是他落難後開始熟悉的社會底層的艱辛。他要贈十元錢給姑娘，她非但不受，還執意要還清車資……大東肅然起敬了。

她對他說：「你是好人。」  
他——昔日大少爺、今日潛逃犯——泫然流涕。

他們洒淚相別……

夏日多淫雨，樹洞裡積水過多，無法藏身。大東遷至橋下刷夜，不幾日發起高燒……

他勉力支撐着病體，央告那些老相好收容他幾天，待高燒退去便走人，房錢好商量……不巧，南也門主席魯巴伊訪問北京，北京市公安局借着這個由頭清查外地入京的「盲流」，一時間搞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因此無人肯收留大東。

惡言惡語，灌滿了他的耳朵——  
「病了？病了更不能在我這兒住……我怕傳染！」  
「出去出去！給錢？給金子也不留你！」

「兩個山字攤一塊兒，大胖子，您哪，給我請出……」

許多地址和姓名在大東那高熱的腦袋裡閃出，并幻化爲男人女人的面孔，只是個個都像惡神兇魔，令人心悸……

最後，大東決定去開票員姑娘家碰碰運氣。當他精疲力盡地倚着朽裂的門框，呼叫着姑

娘的名字時，看到了一張熱情的笑臉……從此，這裡便成了他的家。

姑娘送大東去醫院看急診，精心照料他。早晨上班前把早點煨在爐旁；下午歸家途中買些細菜，給大東一個人包小餃子，自己則用殘湯剩飯裹腹……入睡以前，她給大東講童話：「從前，森林裡有個獅王……」

大東脫鈎後在人海中飄泊，受盡了屈辱和痛苦，一顆心早已變得冷硬而絕望；而姑娘的百般愛撫，彷彿將他引入了溫暖如春的全新境界，以致大東在意識介於清醒與混沌之間時破口呼出「姐姐！」「媽媽！」……

兩個苦命人相擁抱哭……

當姑娘得知他是一名逃犯時，並沒有表示意外，猶如知道他有那樣的背景時并不感到驚奇。她用雙手捧着大東的臉頰，溫柔地說：「你是好人。」

大東躲在姑娘家裡，白日晚間都不敢出門。姑娘在街坊鄰里之間人緣極好，雖然屋裡有些尋常的動靜，鄰居們也都裝聾做啞。

這間小小斗室，於大東如同萬里荒漠之中的綠洲。只是，他的錢越來越少，無以爲繼。姑娘爲還債從街道縫紉社攬來活計，每晚在燈下挑補綉花枕頭（大東不許她再去賣血），每個一角二分。特別複雜的圖案，則是一角六分或者一角七分。

爲了節省電費，家裡只有一盞小瓦數的電燈，昏黃如燭。半個月後，姑娘生了針眼，且流膿，眼睫也朝上翻去。大東見狀於心不忍，再度冒險與母親取得聯係。他打電話給母親，母親囑他按月去×老伯家取生活費。

這×老伯是個延安幹部，因文化低，脾氣倔，屢屢觸怒上峰。革命年頭越長，職位反倒越小。四清運動中，他不知怎的觸霉頭被開除

了公職，現在是一家浴池的鍋爐工。老婆離了婚，兒女如路人，一根光棍。

從此，大東每月八號（這是母親發薪的日子）都去×老伯家取錢。有了這筆固定的生活費，他才能與姑娘共享小家庭的溫馨。

一個初冬的早晨，雪花飄飛。大東趕早去取錢，腹內空空。×老伯看他樣子可憐，就給了他一塊烤紅薯，嘆息道：「親生的娘兒倆楞是不能見面。慘吶……你媽剛打這兒走。」

大東啃着紅薯追了出去，果然看見了那最爲熟悉的母親的背影：背已經有些駝了，步子也邁得不似從前那樣穩健，顯見出老態……

母親前邊走，兒子後邊隨。大東跟着，直到機關大院附近，怕被熟人看見，才停下脚步，目送母親的身影遠去……

下一個月八號，大東起了絕早趕到×老伯家，央求老伯讓他看看母親；×老伯無法，便把他藏在床板底下。

母親準時到了。她是趕在上班前來做這件事的。撩起床單的邊角，大東看見母親抖抖索索地從懷中掏出一個信封，交給×老伯：「這是東兒這個月的生活費。」

大東緊咬嘴唇，雙手摀住泉涌般的淚水：「聽到母親又說：『告訴他好好注意身體，說不定他以後見不到媽媽了。』」

大東失去了控制力，頂翻了床板，與母親抱作一團痛哭！……

母親淚如雨下，抽咽着說：「你被送走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這事。隔離審查結束後，組織上對我說：『請你鎮靜一些，有件事情要通知你。我以為是你爸爸提出離婚，就咬咬牙，準備接受這一事實……不料竟是：『你的兒子被公安局逮捕送去強制勞動了。』我一下從椅子上跌下來，喃喃地說：『那，就把他交給政府

吧……」我的心碎了。我原以為你會跑回家來，所以每天夜裡都不鎖家門。我現在三餐很簡單，什麼好東西也咽不下去……」

大東哭得更響了。

母親抹着淚珠又說：「你走後，我聽不到不少冷言冷語，甚至有人當面刺激我。這些還能忍受，最痛苦的，莫過於看到街上的那些母子了……最近我心臟不好，要是我不行了，就把你召回家來，政府會寬大的，減輕對你的處罰……」

母子相對痛哭，大東「媽媽」、「媽媽」地喊個不休，×老伯亦覺得悲切，躲入內室……

突然，母親止住哭泣，驚醒了似地說：「啊，我得走了，還有個會……」

大東哭得更兇了：「媽媽媽媽你不要走……嗚嗚……我有女朋友了，媽媽咱們三個人一起住在小屋裡……嗚嗚……」

母親像被尖刀刺中似地慘叫一聲，推開大東，頭也不回地開門走了……

大東四肢癱軟地倒在地上，左一把右一把地擦着苦淚，眼前晃動着母親那驟然增多的白髮和縱橫交錯的皺紋……

轉過年來，大東在姑娘家藏不住了。原因是張春橋、姚文元相繼發表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宏文，提出「打土圍子」之說。於是社會上各個角落都開始打土圍子，大東順理成章地被街道積極分子盯上了。好在，有人事先把消息透給了姑娘。

大東與姑娘拋淚相別，重又踏上充滿艱險的漫漫途程。他留下二百元錢，姑娘推辭不掉，就收下了，說：「我用這錢買些碎磚、木板，在院裡搭個棚屋。記着：無論你走到哪裡，這兒都是你溫暖可靠的家。我等着你……」

大東背着破書包出了門，走在路上時覺得裡面溫熱，打開來，見有二十個煮熟的雞蛋。他心中陣陣激動，捂着臉孔，嘴裡親昵地呼喚着姑娘的名字……

——然而，人世間的許多山誓海盟都是要落空的。大東與姑娘最終未能結為夫妻，命運為他們各自安排了另外的配偶。

這以後大東又流浪了兩年之久。除了西藏及港澳台，全中國各省、市、自治區均留下了他的足跡。偶然從母親那裡得些接濟，主要還是靠自己做工糊口。他幹過各種卑賤的臨時性工作，始終在社會最底層打滾。

在河北的一個縣城裡，大東被引到一個幾次下馬復又上馬的街道工廠裡。他臉上掛着誠懇的笑容，心裡翻騰着怨氣和不满，接連向幾位同事——滿面煙容的瘦鬼、徐娘半老的矮女人、胸無點墨的粗野漢子以及其他不值一提的零碎角色——點頭哈腰，人家却哄然嘩笑，拿他那「鬼剃頭」的腦袋尋開心……

在寧夏的一個小鎮上，在大風卷起的塵沙中，大東像一匹馬似地拉車、運磚；他的幫手是個小鬍子。他倆日同做，夜同栖，儼如難兄難弟……

在長白山村區，大東加入了人手不足的伐木隊，出沒於林海雪原。工間政治學習時，他看到中共中央轉發的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最新補充材料，內有其父×敬棠書寫的揭發陳伯達的親筆影印件……大東把這份材料珍藏起來——他有了回家的希望。

四人幫倒台後，颯起了平反之風。大東重返京華，往昔種種坎坷皆可以堂哉皇哉地歸之為林彪、四人幫對老幹部及其子弟的打擊迫害，歸之為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錯誤」（當時官方認為文革成績錯誤為三七開）。

大東之父與北京市公安局的新任局長素有交情。新局長照顧故人之子，理所當然。區區小事，何足掛齒。

於是，大東作為清白人回到了正常社會。只是，長期飄泊、流浪的生活摧垮了他的健康，他患有多種慢性疾病。這以後，大東居家休養，無所用心，很快，他成了一個胖頭大耳的「巨無霸」。朋友們送給他一個耐人尋味的雅號：「毛澤東」。

再後來，大東母親給他安排了一門親事。對象是個普普通通的女工。他們生了一個女孩，小日子過得不好也不壞。一般。

出國前的一個晚上，我們這幫紅男綠女在建國門外新開張的「鳳凰餐廳」聚餐。酒過三巡，一個好事之徒提議邀請大東來此同樂。眾人大悅。電話打過去後，大東聾聲聾氣地道：「謝謝大家的好意，我去不了，我媽媽不許我晚上出門……」

哦，他媽媽不許他晚上出門！是年，大東不是三歲，不是五歲……而是整整三十五歲。

註：(1)：土話。即「吃」。  
(2)：土話。順手牽羊之意。

土話。不顧一切之意。  
黑話。橫刀奪愛之意。  
黑話。指「一次」。  
土話。意即「我們」。  
土話。即「一陣子」。  
黑話。即「打群架」。  
黑話。各種不正派女子的統稱。

(10)：黑話。指鈔票。  
(11)：黑話。意即邀對方擇地打架。  
(12)：黑話。意即挑釁。  
(13)：黑話。指在自家之外的地方過夜。  
(14)：黑話。指資深流氓。

- ▲中國人喜歡把錢存入銀行，但您知道存入保險儲蓄帳號的好處嗎？
- ▲在美國，人壽儲蓄保險是每個人生活的必須品。
- ▲美國人、日本人投保率很高；華人投保率却較低，乃不知其好處之故。
- ▲人壽儲蓄保險，或早或晚一定要辦。但晚辦不如早辦。

# 王炳章保險儲蓄服務

( 中國之春創辦人 ) ( 擁有美國各大州營業執照 )

## 專辦高盈利人壽保險儲蓄

目前利率7.5%—12%，高於銀行存款 也做個人和集體醫療保險

**原理** ● 投保人把錢定期存入保險公司，保險公司集中分散資本進行大規模長遠投資，獲得高額利潤，再回饋於投保人。

● 這是一項人們互相幫助，分散個人風險的社會計劃。

**公司** □ 您將投保的公司是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

□ 大都會公司有一百多年歷史，分公司遍佈全球。僅美、加兩國計有四千四百萬人投保，總資產一仟多億，平均每分鐘付給投保人和受益人的現金達四萬多元。

□ 大都會公司不是私人擁有的賺錢公司，它是投保人共同擁有的集體所有制公司。每個投保人有投票權選舉董事會。公司盈餘將以紅利方式分給每個投保人。您投保(投資)越多，紅利就愈多。

□ 保險公司業務由聯邦和州政府立法保障。

**手續** ● 類似長期定期存款。先填寫申請，批准後，即可開辦保險儲蓄。

**好處** □ 開戶投保後，保值立即有效，全家福利即刻受到保障。

□ 急用款時，可隨時退保取出存款和利息(但要扣除行政消耗)，或是貸出存款(保險仍有效)。

□ 每年有紅利(紅利不付稅)。

□ 向銀行貸款時，人壽儲蓄保險可做為信譽和抵押財產。

□ 給兒女大學教育經費提供保障。

□ 補充退休金。

請您撥個電話，或寄此單至下述地址；

由王炳章博士給您親自解釋和辦理：

請寄：

DR. WANG BINGZHANG  
80-50 Baxter Ave., # 777  
Elmhurst, NY 11373

電話：718-639-0624 ( 24 小時 )

申請辦理人：姓名 \_\_\_\_\_

地址 \_\_\_\_\_

電話 \_\_\_\_\_



**舉例** 張先生，男性，卅一歲，不吸烟。開辦100,000美元人壽儲蓄保險帳號

**項 目 解 釋**

每月固定存入帳號：117 美元  
(存金)  
(也可一年存一次)

●開戶後立即生效。投保人在今後以任何原因亡故(二年内不准自殺)，受益人可獲至少100,000美元現金(免稅)。  
這是保險帳號的一大好處。

付清期限：六年

●如果中途每年取出紅利，則六年後仍要按月存入117美元，直至付清。  
●六年內不取紅利，其利滾利可付清今後一生的保金。

開戶二年後，如有急用，可隨時退保，取出存金、紅利和利息。但一般不必退保，急用款時，可貸出自己的存款，保險仍然有效。

如果你一直存款下去，到65歲清算的話

●淨拿紅利加利息約達170,000美元  
●退保可取出現金約達210,000美元  
●如六十五歲亡故，受益人可領約466,300美元

八十歲時

各項已達天文數字

※男性保金較女性為高，年歲愈大，保金愈高。吸烟者適當加價。

※可開辦10,000—5,000,000元保險(或更高)。投保值愈大，每月應放存金就越多。

※紅利和利率像銀行一樣隨時浮動，但有最低保障值。

※在美國、加拿大投保，可在世界各地付款和提款。

# 承辦保險儲蓄 支援中國之春

請您撥個電話，或寄此單至下述地址；

由王炳草博士給您親自解釋和辦理：

請寄：

DR. WANG BINGZHANG  
80-50 Baxter Ave., # 777  
Elmhurst, NY 11373

申請辦理人：姓名

地址

電話

紐約市：(718)639-0624

外地請打免費電話：1-800-666-WANG 即 666-9264 兩電話均24小時服務。

## 進入美國社會

# 至少應辦一個保險儲蓄

### 高盈利人壽保險儲蓄簡介

編者按：為緩解中國之春的財務困難，王炳章先生開始經營保險業。經過學習、考試和培訓，王炳章先生已拿到營業執照，正式開業。為什麼從事保險代理工作？他認為，保險代理工作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人際關係。中國之春有廣泛的社會關係，給保險業的拓展提供了方便。此外，保險代理工作的時間安排比較靈活，王炳章先生仍可騰出相當多的時間參與民運活動。王炳章還指出，這幾年從大陸來美的新移民和留學生人數很多，但大家對保險業非常陌生，辦保險的人相對較少，因而吃了不少虧。入境隨俗，要打入美國社會，必須了解保險事業，把各種保險辦好。所以，王炳章先生認為，這項工作具有服務性質和知識普及性質。

這項工作能夠籌到錢嗎？能！只要熱心人士都支持王炳章的工作，沒有投保的，積極投保；已有人壽儲蓄保險的，可以再辦一個；每個人都主動為王炳章介紹客戶（包括團體客戶）。那麼，案例累積多了，王炳章先生的保險代理業就可以作大。

王炳章先生在營業之初，由於各方熱心人士的支持，成績不錯。他表示，除了自己家庭生活費用之外，他將把全部所得捐給民運事業。

辦個人壽儲蓄保險，對己有利，對民運事業有利。既然早辦晚辦，反正您都要辦，那麼，就請您早辦一下吧！既然您找誰辦都是辦，那麼，就請找王炳章先生辦，以實際行動支持他的義舉！

王炳章先生表示，他將以自己的書法小品回贈每位支持者，以感謝在民運經費困難的時刻大家雪中送炭的精神。

每個人都在抱怨汽車保險費用昂貴。每年您都要交一筆錢，汽車不出事，這筆錢就不歸你了。您每年都要交一筆錢保自己的房子，房子未出事，這筆錢也就收不回來了。您每年可能也交一筆醫療保險費，如果您未生病，這筆錢也就白交了。

但是，人壽儲蓄保險却不然，它使您有得無失。您存入所有的錢永遠屬於您，而且不斷以比銀行還要高的利率增值。辦一個人壽儲蓄保險，還相當於置了一份產業，而且是比房地產還要穩固的產業。

### 起源於人道主義

俗話講，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保險業所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不測和風險，不一定落在誰的頭上。早在十九世紀，瘟疫流行，暴亂疊起，一家之長一旦有難，全家立即陷入困境，生意也會垮台。這樣，反過來又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於是，有人想到，如果一家落難而他人群起捐助，社會問題就會大為減少。因此，平時每人都貢獻出一點錢，積在

一起，給那些發生不幸的家庭急用。這就是保險業的雛型，帶有人道主義的互助精神。

### 定期人壽保險

最早的人壽保險——定期保險，就是在「每人平時貢獻一點錢」的概念下產生的。辦法是：每月（或每年）交一點錢（如卅一歲男性，每月交九元，保十萬元）投保一年，一年以後再續。如果在一年內投保人發生不測，受益人則拿一大筆錢。如果一年內安然無恙，交的錢就取不回來了。第二年再保再交。

定期人壽保險仍然很有功用。比如，外出旅遊、野外作業和山區探險等，發生意外的基率較平時高得多，若無終身人壽儲蓄保險，則應在外出前辦一個定期人壽保險。

很多美國人仍喜歡這種傳統式的保險方式。他們每月固定撥出小量的存款給保險公司，就像每月付房租和電話單一樣。

中國人一般不喜歡定期人壽保險，因為在大多數正常情況下，這些錢都是白交的。

## 人壽儲蓄 ( 終身儲蓄 ) 保險

中國人最喜歡的是人壽儲蓄保險，又稱終身儲蓄保險。它和定期保險最大區別在於，一切存款都歸於投保人。如不發生意外，所存入的錢用於投資，以高利率增值。如萬一不測，受益人則領取巨額保金。

儲蓄保險的原理是：保險公司收到存金後，除小部份現金儲存，做為應急外，其餘立即投資於房地產，向外貸款或購買大公司股票等，以賺取高額利潤（如美國最大房地產公司——CENTURY 21就是大都會保險公司的子公司）。賺得的利潤用來支付投保人的紅利、利息和受益人領取的投保金。因此，人壽儲蓄保險既有保險的功能，又有銀行儲蓄的功能。

人壽儲蓄保險的長處及特點有：

●開戶投保後立即生效，直至終生。存第一筆錢後任何時候發生意外，受益人都可領取巨額保金。保金免稅。

●每年有紅利，紅利可以免稅。

●應急需現金時，可退保取出存款（扣除一些手續費）。但一般不需要退保，可以向保險公司低息（不超過2%）貸出存款。此時，保值仍然有效。

●不小心拖欠定額存款時，積累的紅利自動補足。積累的紅利用竭後三十一日內，保值仍有效。保值失效後，今後有錢時再補足拖欠款項，保值即刻恢復。

●退休時可領取一大筆累積的紅利。補充退休金

，並給子女提供教育經費。

當然，人壽儲蓄保險也有其不便之處，如投保的前兩年不准提款（相當於二年固定存款）。

## 影响存金 ( Premium ) 的因素

開辦保險帳戶，每月或每年固定存入的現金，叫存金 ( PREMIUM )。影響存金的因素有：

一、年齡。這是最大的影響因素。年齡越大，每年自然亡故率越高，存金也就越高。例如，投保十萬元，廿五歲男性每月只交存七十六元，而六十五歲男性每月要交五—三元。但年長者投保也有好處，因亡故時保金不交遺產稅。

二、性別。女性壽命（平均七十八歲）較男性（平均七十二歲）為長，故存金較小。

三、吸烟及投保時健康情況。吸烟者壽命短，存金高。疾病越多，所需存金越高，直至不夠格投保。

此外，職業、愛好等因素，對存金也有影響。

## 爲什麼早保爲好

投保越早越好。這不僅因爲存金需要小，更重要的是，投保後立刻就有了戶頭，以後萬一生了重病，保險公司也不能退保。但是，如果沒有戶頭而生了重病並失去投保資格，交再多的存金，保險公司都不會接保。因此，經濟條件不佳時，可以先保小值以開上戶頭，今後再加保。 ( 王炳章供稿 )

# 專辦高盈利人壽儲蓄保險

請您撥個電話，或寄此單至下述地址；

由王炳章博士給您親自解釋和辦理；

請寄：

DR. WANG BINGZHANG  
80-50 Baxter Ave., # 777  
Elmhurst, NY 11373

申請辦理人：姓名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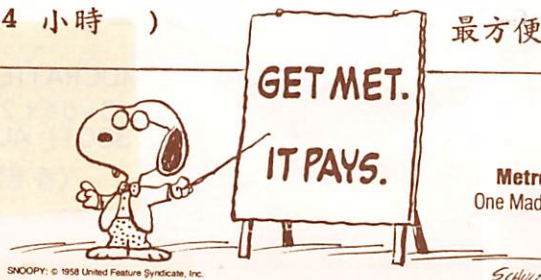
地址 \_\_\_\_\_

電話 \_\_\_\_\_

電話：718-639-0624 ( 24 小時 )

最方便打電話時間 \_\_\_\_\_

 Metropolitan Life  
AND AFFILIATED COMPANIES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ne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0-3690

SNOOPY: © 1958 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Inc.

Schulz

## 紀念中國之春創刊六週年

# 徵求名譽定戶出售全套雜誌

尊敬的各界讀者：

「中國之春」自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以來，經各界人士及廣大留學生的大力支持，已經堅持了六年。在此，「中國之春」編輯部謹向各界讀者和訂戶致以衷心的謝意。為了紀念「中國之春」創刊六週年，「中國之春」編輯部決定征求特別榮譽訂戶，並向廣大讀者和研究機構出售自創刊號至六十五期全套「中國之春」雜誌合訂本。

一、凡捐助二百美金以上者，均列為「中國之春特別榮譽訂戶」。本刊除永遠寄送「中國之春」雜誌之外，還將呈送一份「中國之春特別榮譽訂戶證書」一份，以誌存念。

二、為了滿足廣大讀者和研究機構的需要，我們決定出售在本編輯部資料室存有部分自創刊號至最新六十五期全套歷史性合訂檔案雜誌。包括郵費在內，北美地區五百美元；港澳地區五千港元（空運）；世界其它地區六百美元（空運）。數量有限，請速來函。

三、如您已擁有部分雜誌，您只需要個別期雜誌，包括郵費我們的零售價格在北美為三美元一本；港澳地區三十港元一本（空運）；世界其它地區均為四美元一本（空運）。紐約地區的購買者可直接電話聯繫（718）429 6777 到「中國之春」編輯部購買，零售價格為二點五美元一本。

「中國之春」過去需要您的支持，現在也需要您的支持，將來更需要您的支持。歷史將會記下您為民主和自由所做的一切！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一九八八年八月廿日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1 號萬隆大廈 1206 室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

B. 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é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電 話：(美洲) (718)429-6777；

■零售價：(美)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8.00 港幣

SECOND CLAS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 Y.

ISSN 0735-8237

T. P. Lee #6251 64-69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